

蘇友鵬 有期徒刑十年

胡寶珍 有期徒刑十年

郭琇琮 死刑
許強 死刑

「我以顫慄的心，向那無限豐富地教育了我的、荒塚中的歷史，以及那些二度那麼勇敢、純潔、無私且熱烈地活過的、台灣最優秀的靈魂合十祈謝。」

——藍博洲

現代人多感慨醫德淪喪，卻鮮少有人知道，在台灣曾經有一群年輕秀異的醫師，以他們的生命和自由為代價，追求人民的福祉與國家美好的未來。他們從抗日而熱情迎向台灣的光復、到對陳儀體制的腐敗和獨占憤然抗議、繼之參與一九四七年台灣二月蜂起、再經蜂起的全面潰敗，他們徬徨、幻滅，掙扎著尋求思想的出路及所謂祖國的圖像。然而一九五〇年，一場全面的、堅定的、徹底的政治肅清在台灣靜靜地展開，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作者尋訪探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倖存者與受難者之親友，細細刻錄四名年輕醫師的一生及其言行思想，翔實地記述下這些醫界俊彥如何為他們的理想付諸行動，也為當代青年留下一頁鮮活的圖像。

ISBN 986-7420-39-X



9 789867 420398

00280



INK

好讀網

<http://www.gdud.cc>



藍博洲

1960年生於台灣苗栗。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

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現專事寫作。

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

1985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

1989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旅行者》。

2002年出版長篇小說《藤纏樹》，獲當年《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獎、《聯合報》年度最佳書獎。

著有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報導文學《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幌馬車之歌》等；歷史報導《紅色客家人》、《台灣好女人》、《麥浪歌詠隊》、《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白色恐怖》、《沉屍、流亡、二二八》、《紅色客家庄》等。

時間太久了。

不義的殺戮

已消失在歷史的煙霧裡，

但它卻在人類的良心上

留下可恥的記憶，

……

——艾青



【目次】

前言

007

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

郭琇琮醫師（一九一八～一九五〇）

011

他們沒走完的路我們一定要繼續

蘇友鵬醫師（一九二六～）

105

我對貧窮的聲音特別敏感！

胡寶珍醫師（一九二四～）

141

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

許強醫師（一九一三～一九五〇）

167

大事年表（一九一三～一九五〇）

253

後記

268

前言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到三月中旬，台灣民眾反抗陳儀長官公署接收體制的全面蜂起，不只涉及廣泛的市井民眾，也涉及光復當時一些極為年輕秀異的台灣知識分子。

民眾蜂起在強大的暴力鎮壓下歸於悲慘的失敗。許多倖存的知識分子徬徨、幻滅，卻很快地掙扎著尋求思想的出路。他們在因事變而一度破滅的祖國像中重新探索，不旋踵即投入當時整個內戰的思想與政治漩渦，勇敢地投入為了探索祖國的新生的艱難戰鬥。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這看似與民眾生活距離遙遠的國際事件，在背地裡卻對台灣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星條旗於亞洲「自由世界」的遍插下，一場全面的、堅定的、徹底的政治肅清，在台灣靜靜地展開。

出身台南佳里，台北帝大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二十七歲獲得博士，被日本人期為「亞洲第一個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的許強醫師；出身台南白河，日本京都帝大醫學部

肄業，迫不及待地潛赴中國大陸投身抗日工作，回到台灣後捨醫而從事勞動運動的吳思漢，都以不同的關係和深度介入了一九四七年的民眾蜂起，也都在一九五〇年的政治肅清中被殺。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許強、吳思漢等人結束了在保密局「南所」漫長的拷問，送到當時的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聽候宣判。

數日後，他們十四個人被判處死刑。和他們一起從南所送來，一樣被判決死刑的，是這裡初步採集了一些生命史，差可描述成形的郭琇琮……

我跌入被刻意掩埋的歷史荒塚

一九八七年三月，隨著《人間》編輯部展開台灣「民眾史」的企畫，一九六〇年初葉出生的我，頓時跌入一個被刻意掩埋的歷史的荒塚……

那兩個月來，我在這孤寂的荒塚中摸索。我找到了破碎的、噤抑的、餘悸猶存的歷史的碎簡殘篇。我具體地感覺到，在一個湮埋的時代，歷史怎樣被分成「廟堂」和「民眾」兩個分野。前者枯弱、欺瞞；後者生猛而令人悸動地真實。

我懷著虔誠，含著羞赧和悔恨的熱淚，跪向這被噤殺的歷史，一步一匍匐，虛心地聆聽民眾史的，寬宏而智慧的聲音。

由於幸運的偶然，我找到了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光復當時，台北幾個最秀異的青年的足蹤。他們全是台北帝大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和日本名大學醫學部的高材生；他們也全部從抗日而

熱情迎向台灣的光復、到對陳儀體制的腐敗和獨占忿然抗議、繼之參與一九四七年台灣二月蜂起，再經蜂起全面潰敗的絕望、幻滅與苦悶，然後在當時中國全面內戰的激越的歷史中，重新找到國家的認同。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東西對峙之勢儼然而成。這些熱血的一世代的台灣秀俊、在五〇年堅定而廣泛的肅清（*Partisan hunting*）中破家亡身。這激越的青春和狂飆的歷史，在嗣後的恐怖、怯懦和高成長社會的飽嗝中，長埋地下，任歲月不斷沖刷、湮滅。

我找到了充滿希望的身分認同

對於當時尚不滿三十歲的我而言，他們的抗日；他們在日政下祕密學習中國白話文和普通話；他們對台灣因日本戰敗而重獲自由的狂喜；對祖國中國的堅定嚮往；他們對陳儀惡政的怒聲，以至崛起抗議，也是出於「本是同根」這個意識所爆發出來的忿慨。二二八事變被暴力鎮壓之後，他們一度徬徨了。中國是什麼？祖國是什麼？台灣要往哪裡去？這些沉重的問題，在他們心中成爲千鈞重壓，等待著解答。一九四七年起，中國內戰形勢急轉直下，他們於是在激盪複雜的中國現代史中沉思台灣的意義。陰靈廓清，在他們的眼前，因著身分認同的新的解決，開展著遼闊的工作和希望。台灣往何處去的問題，在中國往何處去的質問和實踐中，他們取得了明白、堅強的解答。

然而，一九五〇年的全球性冷戰架構的形成，使他們在一場世界性的肅清中被捕、被殺。在漫天飄揚的「自由」的旗幟下，噤默、腐朽、消滅了。

一九四八年，台灣二二八事變的次年，韓國濟州島居民蜂起。美國和李承晚當局斷然鎮壓，造成七萬人上下的死亡。

對我而言，匍匐在這段荒廢的歷史上，忽然間，「自由」和「奴役」，「解放者」和「虐殺者」這些曾經一度「明確」無疑的概念，產生了混淆。而鮮活的思想與歷史，卻在這混淆中產生。

從這歷史的廢塚中回顧，我驚異地發現另一種力量，正在企圖噤殺那掩埋地下，卻生猛真實的民眾史。

那些大聲控訴別人在二二八事變中殺了人的人們，原來只在那被掩埋的歷史的荒塚上加封厚重的泥土，只想在別人的舊塚上插上適合自己需要的、不實的墓碑，卻從來不肯走進民眾，採掘生動地活在民眾記憶中的、現代台灣的「民眾史」。

我以顫慄的心，向那無限豐富地教育了我的、荒塚中的歷史，以及那些一度那麼勇敢、純潔、無私且熱烈地活過的、台灣最優秀的靈魂合十祈謝。我彷彿感覺到，透過這歷史的調查，我勝過了絕望，超越了恐懼，在一個又一個從歷史的煙塵中洗滌而重現出來的他們的名字，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得以把已經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找到充滿著希望與活力的、新的身分認同。

一九八七年六月

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



郭琇琮

醫師

一九二八—一九五〇

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將骨灰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郭琇琮遺言

曬衣場

一九五〇年五月，林雪嬌與先生郭琇琮在嘉義同時被捕，然後同被輾轉送到台北軍法處看守所，分別關押在男犯和女犯的不同押房。

按規定，在軍法處看守所傳遞紙條，被抓到了是要槍斃的！可林雪嬌和郭琇琮卻冒著生命危險，以紙條傳遞彼此的信息。林雪嬌利用每一天的放封時間，假藉傾倒馬桶的機會，溜到男犯的曬衣場，然後很快認出郭琇琮的衣物，迅速地從晾曬著的衣服取出郭琇琮傳遞出來的紙條。

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林雪嬌又從郭琇琮晾曬的內褲褲帶縫裡，取出郭琇琮預藏的紙條。她看到紙條上只簡單地寫著：二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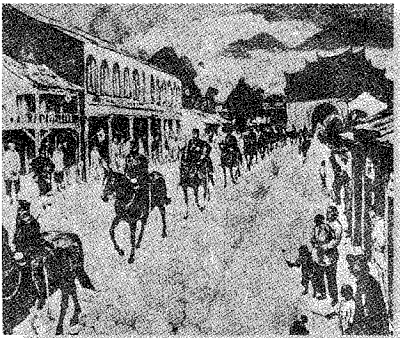
郭琇琮的意思是說，他已經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在當時，這是絕無活路之條款。林雪嬌捏緊紙條，心中悲痛，不能站穩；但她還是警覺地離開曬衣場。①

芝山巖事件

「據我所知，」一九八七年四月，林雪嬌女士在第一次接受採訪時說：「郭琇琮家是舊舉人出身。士林一帶還有何、潘兩家也是舉人出身的地方望族。日本人剛剛占領台灣的時候，郭琇琮的祖父便會率領不願受日本人奴役的三姓壯丁，潛赴芝山巖，殺了在那裡教書的六個日本老師。之後，郭家全家便暫時到艋舺避禍。」

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日軍在辜顯榮「先導」之下，進占台北城，並於六月十七日舉行始政式，從此展開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

據台之初，殖民當局台灣總督府一切設施都以軍事為前提，只設總督府官房、陸軍局、海軍局及民政局；而在民政局之下設學務部，掌理全台的教育行政。據《台灣教育沿革誌》所載，學務部原設於台北大稻埕；但是，因為當時台北人士紛紛逃往廈門一帶避難，教育工作無法推進，於是接受大稻埕鉅商李春生（台北保良局總理）建議，轉往一向文風較盛、人才輩出的士林設校。九月二十日，總督府學務部在台北市近郊士林附近的芝山巖學務部設立學堂，先後招收廿一名台胞為日本語練習生，按照入學先後次序，分為甲、乙、丙三組。甲組計有柯秋潔等六名「略



1895年6月，日軍進入台北城。

解日語」的學生。乙組計有朱俊英等八名「年齡均較長，於漢文有相當素養，準備出任官吏及教師」的學生。丙組計有林隆壽等七名「年齡尚幼，漢文無根基」的學生。學務部預備就這些學童的學習，作為實驗，以作日後普及日語教育的參考。

這所芝山巖學務部學堂，可以說是日據時代台灣國民教育的濫觴。^②然而，對「久沐祖國教化，義不附秦」的台胞而言，它卻可以說是「日本奴化台胞之第一聲」。^③

這年年底，台北一帶盛傳：新竹之胡阿錦、宜蘭之林李成與文山堡之陳秋菊、詹振等義軍，將以陽曆新年為期，奪回台北、宜蘭、基隆，驅逐各地之日本人，收復台灣。^④

到了除夕那天，「陰晦無雨」，陳秋菊密約士林當地義民，翌日協攻台北。^⑤另一方面，日本憲警也於當日下午起，攜帶槍枝，不斷在台北城內外加強警戒巡邏。晚上八點，義軍果然於大屯山舉火；並於夜半十二點，進襲城內。一八九六年元旦凌晨，義軍先後於觀音山頂與紗帽山嶺點燃烽火，並於四時二十分逼近城門。^⑥

就在義軍大舉襲擊台北城同時，芝山巖學務部部員揖取道明等六人正率領該學堂學生，前往總督府賀年；近午時分，他們走到圓山下，卻見「基隆河中，渺無舟影；徘徊間，遙聞對岸吶喊



殖民當局在芝山巖為被殺的日本學務官立碑。
(藍博洲／攝)

聲砲火聲雜起，知有變，遑返。」當他們走到芝山巖下時，恰好遇到正撲向芝山巖的士林街義民。對這所侵略性的學堂懷抱極端憤慨和仇恨心情的當地義民，於是將揖取道明等六名學務部部員和一名軍夫斬殺，並將學堂內的奴化設施全部搗毀……第二天，「日軍百餘，向士林搜索前進，擬屠士林」；一時之間，學生及學生家長紛紛他避。^⑦

郭坤木發家

關於林雪嬌「郭琇琮家是舊舉人出身」的證言，與郭琇琮同一時代士林出身的歷史學者曹永和有不同的說法，他說：「何家、曹家、潘家，都是士林大家族。士林郭家是郭坤木一代才興旺起來，不是很大家族。……」^⑧

郭坤木即是郭琇琮的父親。

日據末期，台北市坊間出版的《台灣官紳年鑑》載稱，郭坤木「從小好學超群，及長努力往企業界發展」，「以企業界的活躍人物而廣為人知」。^⑨

那麼，郭坤木又是如何讓士林郭家興旺起來的呢？看來，話，還得回頭說起。

自從一八九六年元旦，士林街義民發動反奴化教育的「芝山巖事件」後，芝山巖學務部學堂的業務便停擺了，一直到同年四月，台灣總督府公布直轄學校官制，在全台各重要城市設國語傳習所，殖民地台灣的國民教育才又恢復。國語傳習所分甲、乙兩科。甲科招收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已略有普通知識的學生，專習日語以及初步的讀書作文，期限半年。乙科招收八歲以上十

郭坤木

彰化銀行經理



1937年9月，台灣新民報社編輯出版的《台灣人士鑑》有關郭坤木的記事。

說：「後來，日本政府爲了招收學生就規定：凡是去讀的學生，每個月有三・五台元可以拿。我想，可能就是爲了賺那三・五台元吧！我爸爸當時頭上雖然還留著辮子，就去報名了；讀到後來，他竟然越讀越有興趣。」^①

郭坤木後來又進入國語學校實業部農業科就讀。一九〇七年，「鑽研不倦」的郭坤木以優異成績畢業，隨即直接進入台北廳殖產科及農會就職。^②

「學校畢業後，」郭琇琳說，「我爸爸曾經當過檢驗甘蔗的書記。當時，還沒有檢測甘蔗所含糖分的儀器，檢驗員必須實際試吃，才能判定甘蔗含糖量的等級。」

郭坤木在台北廳殖產科及農會一直工作到一九一四年。在職期間，「專精業務，將其學識及

機敏手腕發揮無遺，其事蹟大受肯定，爲上司所重用。」^③

就在這段期間的一九〇五年，中部地方以吳汝祥（一八六六—一九二七）爲首的幾位士紳發起，以大租權補償公債二十二萬日圓，充當資本，創立彰化銀行；六月六日，於彰化廳舉開發起人總會，確認全部股款繳納清楚後選舉董事及監察人；十月一日，開始營業。一九一四年二月，「爲適應時代的進步，圖謀事業的擴展」，該行股東臨時會決議：第一次增資爲一百一十萬日圓。這次增資，總股數維持不變，仍然是一萬一千股；每股面額則由廿二日圓，改爲一百日圓。一九一五年七月一日，該行將一九一二年九月設置的台北出張所升格，改稱台北支店（分行）。^④

郭坤木後來也進入彰化銀行台北支店工作，「以其多年鍛鍊出來的手腕及清晰的頭腦，爲銀行業務盡力。」^⑤

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彰化銀行開始在「林本源家」所在的台北廳枋橋街（板橋），辦理存款業務。一九一九年七月，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經濟事情之發達與業務擴張之需要」，該行第二十八次股東常會決議：再次增資四百九十萬日圓，湊成總資本金六百萬日圓。另外，每股面額由一百日圓，改爲五十日圓；總股數也由一萬一千股，增加爲十二萬股。增資後，日人股東人數，由股東總數的二・七%激增爲二七・八%；股份總數由二〇・六%增加爲二五・九%。由於第二次增資使得日人的股東人數和股份數，大約都占該行總股東數和總股份數的四分之一強，板橋「林本源家」自然就成爲該行「民族資本」吸金的主要對象之一了。爲此，該行先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將板橋出張所會計，劃歸台北分行管轄。接著又於一九三〇年元旦，在板橋街三七五號，設立板橋支店，開始營業。^⑥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郭坤木也因為他在台北支店工作期間所表現的「手腕力量，受到賞識」，榮升為板橋支店長。^⑩

「我爸爸也曾當過『林本源家』的家長。」郭琇琳說：「所以，我想，我爸爸可以當上彰化銀行板橋支店長，就是因為彰化銀行想吸引林本源家的錢存進彰化銀行吧！因為林本源家的財產似乎是他去向日本政府登記的。」

問題是，郭坤木究竟是如何與「林本源家」有所關聯的呢？退一步說，「林本源家」與士林街有何聯繫呢？

早在前清中葉，士林舊街（八芝蘭街）就因為「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成為台灣北部物資集中地。^⑪清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十月十五日，因為漳泉分類械鬥，士林舊街燒燬殆盡。當地富紳廩生潘永清（一八二〇～一八七三），於是集結地方富豪出資，選擇當時仍為一片田圃，土名「霞樹林」的原福德洋庄，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開始興建士林新街。^⑫潘永清曾與「林本源家」合作，在北部原住民居住的馬武督等山地，辦造林、製腦、撫「蕃」、墾田等龐大事業。^⑬因為這樣，「林本源家」也參與了興建士林新街的投資，在大北街蓋了「幾間厝」。^⑭

士林新街建成後，舊街居民紛紛喬遷於此，原位於舊街的市場也跟著遷移新街，並以慈誠宮為中心，形成新的市場。其中，大東、大西兩街是肉市，大南街是瓜、花市，大北街是藥市，廟前則有菜市和魚市。大東街也隨著買賣之熱絡而成為商業之中心。^⑮

郭坤木家恰恰就在原福德洋庄的大東街五十四號。因為這樣的地利之便，郭坤木應該會與「林本源家」在大北街的投資有所關聯吧！

隨著善於理財的郭坤木擔任彰化銀行板橋支店長，郭家家境也逐漸富有、興旺。日據末期，當郭坤木將位於大東街上的郭家古厝翻修成士林第一棟三層樓洋房之後，郭坤木家也就成為地方人士不可忽視的、新興的士林望族之一了。

除了銀行的工作之外，郭坤木也對地方的公共事務頗為熱心。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士林地方士紳們「有鑑於慈誠宮及舊街之神農宮有重修之必要」，組成兩廟改建籌備委員會，郭坤木被推舉為會計委員之一。^⑯顯然，此時的郭坤木已經因為「理財才能」而受到地方士紳的重視了。後來，他又歷任過「士林同風會副會長、台北州州稅調查委員、士林青年團團長、士林庄協議會議員、士林信用購買組合理事、士林庄教化聯合會教化委員」等職，盡力「教養青年」、「啓蒙庄民」、「振興產業」；此外，他又曾組織體育協會，推廣運動，對地方貢獻良多。^⑰

「總而言之，」《台灣官紳年鑑》這樣寫道，郭坤木「不愧為士林的代表人物」。

叛逆的老一

從另一個角度看，郭坤木基本上不過是一個通過專業的努力，逐步往上爬升為一個親日的地方士紳吧。

郭坤木當上彰化銀行板橋支店長以後，社會地位提高了，他那新蓋的三層樓洋房的會客室，也經常接待包括林獻堂在內的彰化銀行的董事或監察人等台灣士紳，尤其是曾經明白表示「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民」的「台灣第一號御用紳士」辜顯榮。

從彰化銀行設立開始，辜顯榮便一直擔任該行的監察人，一九〇八年起改任董事，直到一九三七年逝世為止。^⑤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九日，辜顯榮與板橋「林本源家」的林熊徵及高木友枝，由台灣總督府派任為所謂「民間代表」，前往東京，拜見天皇。^⑥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為了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和「日中和睦」，日本政府又任命辜顯榮為殖民地台灣第一位毫無實權的貴族院議員。^⑦

對此，常和辜顯榮等士紳來往的郭坤木，毫不掩飾地表現了「與有榮焉」的態度。然而，他那民族意識強烈的母親卻表現出嗤之以鼻的不屑。有一天，母子兩個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

「辜顯榮實在很能幹！」郭坤木欣羨地說：「不但見過天皇，現在還做到貴族院議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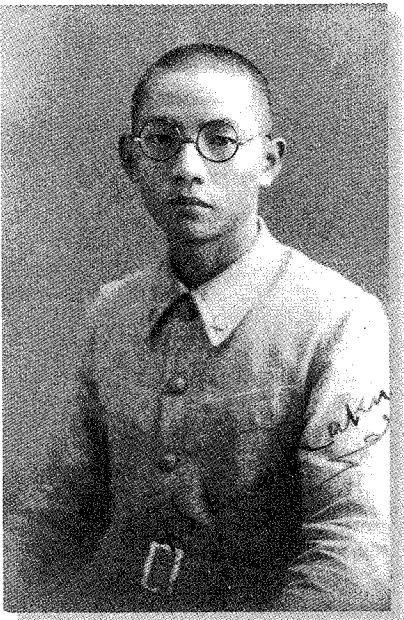
「人，地位高，不一定是能人啦！」母親聽了沒多說什麼，只是冷冷地這樣回了一句。

「你在說甚麼？」郭坤木感到訝異地說：「人家今天能做到這種地位，不是能幹的人，難道可以嗎？」

「像他那種娶大某細姨的人，到底哪裡能幹？」母親語帶諷刺說：「又不是不會看過人好額？」^⑧

就是因為有一個民族意識強烈，道德性又高的阿嬤，一九一八年出生於親日士紳家庭的郭家老二郭琇琮，儘管從小就進入主要是日人子弟就讀的樺山小學校和台北一中（今建國中學），接受皇民化教育的洗禮，日後卻仍然具有那麼強烈的反日民族感情罷。

一九三八年，郭琇琮繼大哥郭琇瑩之後，考入集全台灣青年菁英於一堂的台北高等學校第十四屆理科甲類。當時全班共有廿八名學生，其中日本人廿四名，台灣人只有四名；另外一人即是



就讀台北一中（今建中）的郭琇琮。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台北二中畢業的蔡忠恕。^⑨

郭坤木的幾個孩子都很會讀書。尤其是老大郭琇瑩，從小就很乖，是讓他最感到驕傲的一個兒子；他按照郭坤木的意思，一步一步，順順地從小學校、台北一中、台北高等學校，走進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二屆）。對於老二郭琇琮，郭坤木並沒有期望他像自己一樣從事商業活動；他期望，至少，郭琇琮能跟老大一樣學醫，

日後當個生活無憂的開業醫生。^⑩

但是，因為受到祖國五四運動流傳到台灣的思想影響，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台北高校畢業後，郭琇琮便懷抱著「科學救國」的決心，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東京工業大學。郭坤木反對他念工科，於是親自迢迢地跑到日本，要他回台灣。

「你給我讀工科，將來要幹什麼？」郭坤木難以理解地問說。

「我要回大陸建設，」郭琇琮豪氣地回答說，「讓中國的科學發達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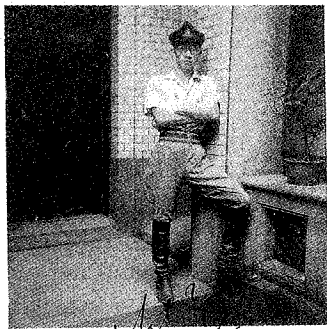
郭坤木於是威脅說：「你要是不同回台灣學醫，我就不供給你學費。」

「我就是學醫，」郭琇琮笑了笑，「也不會為你賺錢的！」

「隨你便，」郭坤木退一步說，「你只要給我回台灣念醫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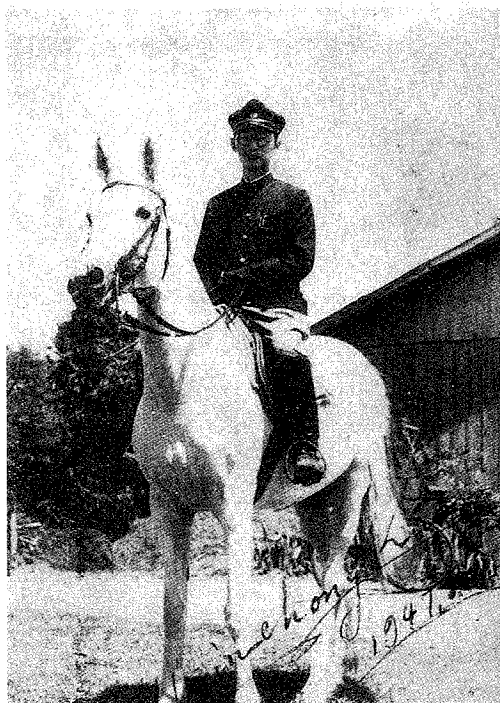


郭琇琮（右一）與台北帝大醫學部同學的燦爛笑容。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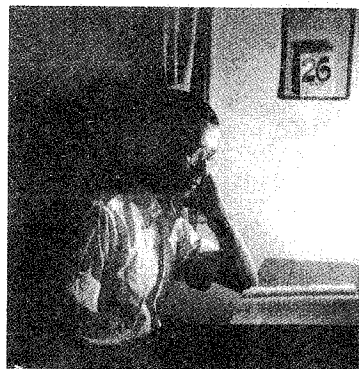


*Knight
The days of
University
Stud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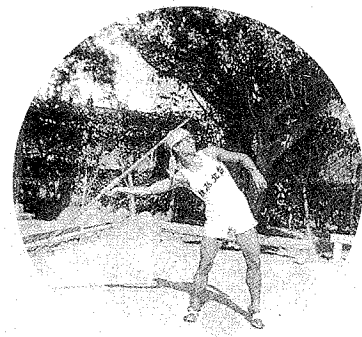
台北帝大醫學部的騎士——郭琇琮。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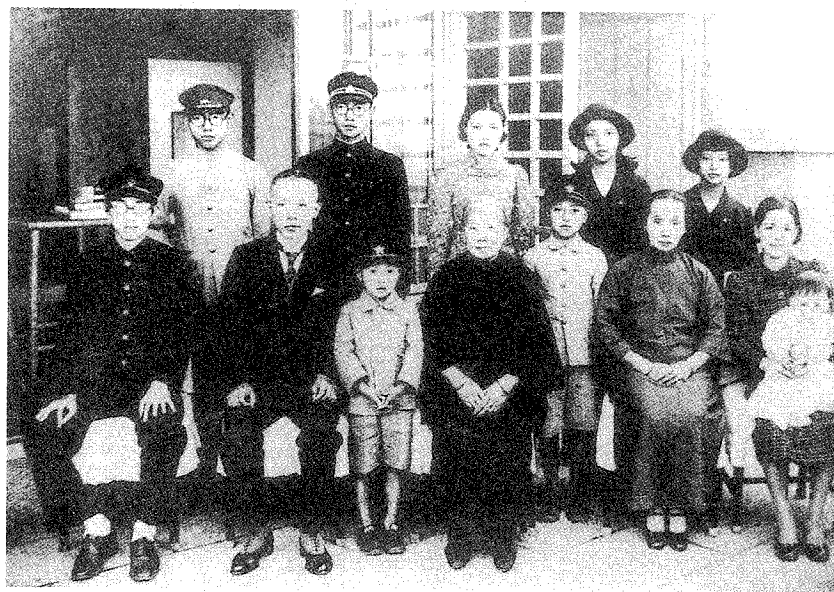
1941年，郭琇琮在馬場町騎馬的英姿。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郭琇琮讀書的神態。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郭琇琮代表台北高校參加田徑賽的擲標槍。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就讀台北高校的郭琇琮（後排左二）與祖母（前左四）、父親（前左二）、母親（前右二）及兄弟姊妹們。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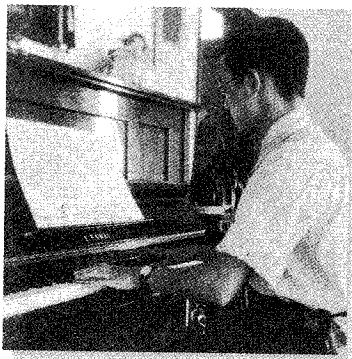
其實，郭坤木真正的目的，只是要資質聰慧過人的郭琇琮留在身邊而已。因為經濟困難，郭琇琮在東京工業大學只念了一個月，就只好束裝回台灣，然後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第六屆）就學。^①

祖國旅行

就讀台北帝大醫學部期間，每天早上，郭琇琮都會帶著他那就讀第三高女的妹妹，從家裡走到不遠處的士林火車站，等車上學。每當他戴著帝大那頂四角帽，走過士林街上時，都要引起鄰居與路人的側目與誇讚。^②

郭坤木的興趣是：音樂、旅行和打網球。^③

「我父親不論是打網球、射箭或吟詩，樣樣精通；而且，就在一般人的生活都還普遍貧窮的當時，他已經買了一架鋼琴，擺在二樓的會客廳裡。」郭琇琳說：「當時，士林街只有三架鋼琴，學校一架、教會一架、我家一架。我們家，整日都叮叮咚咚地響著悅耳的琴聲。但是，父親認為，彈琴不是男孩子的事；我們男孩子，與其去學琴，不如去運動場跑一跑，或去學柔道、劍道。所以，我如果偷摸琴被他碰到，他就會說，這是你姊姊的。我不知道，父親買琴的動



日據時代，郭琇琮家裡就已經有自己的鋼琴了；他因此善於彈琴。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1996年12月25日，林雪嬌女士重返郭家廢園，追敘她與郭琇琮一起走過的革命歲月。（藍博洲攝）

機，究竟是真的爲了姊姊？還是因爲家裡有錢，買來炫耀或擺著好看？也許，他的確真心想要吸收西洋文化吧？可我想，如果真要吸收西洋文化，就不能買來擺著好看。所以，他越是禁止，我越是偷偷地學。……」

就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薰陶下，不同於「只會讀書、研究醫學」的大哥郭琇瑩，生性叛逆的郭琇琮，在就讀台北帝大醫學部期間，不論在騎馬、游泳、田徑、音樂和思想上都展現了超出同儕的傑出才華，而且因爲認識了一位從北京來的教授徐征，成爲一個具有強烈中國人意識的民族主義者。^④

「認識郭琇琮以後，有機會去他家，在會客廳聽音樂、聊天。」林雪嬌說，「聊著聊著，他卻批評我說：『妳喜歡打扮、愛漂亮，又有小姐脾氣；我覺得妳有很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我聽了當然不高興，隨即反擊他說：『你自己也一樣！你喜歡騎馬、聽古典音樂，還有彈鋼琴；這些嗜好不也是小資產階級的趣味嗎？』『沒錯！我們的出身都一樣；』他沒有因爲這樣而生氣，反而笑著說：『可是，我跟你有一點不一樣哦！你聽聽看。』然後，他就一邊彈奏蕭邦的〈革命進行曲〉給我聽，一邊解釋說，『我跟你不一樣，就是我愛自己的祖國！妳卻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樣的感情。』……」

一九四一年，徐征應日人三菱、三井企業之聘，來台擔任台北高等商業學校講師，訓練派赴大陸的商務人員中文和北京話。^⑤後來，徐征也到台北帝大開課；除了在課堂上教學生中文和北京話之外，下了課，徐教授還暗地帶領郭琇琮、蔡忠恕、陳國珍、許強、郭宗波等幾個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帝大醫學部前後期同學，研讀三〇年代的作家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⑥這段期間，爲了對祖國大陸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學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話的郭琇琮，還經常到港町（今西寧北路、貴德街、保安街、涼州街、歸綏街、民生西路及南京西路之一部）廣東留學生宿舍「興亞寮」，找那些大陸學生聊天。^⑦

在此之前的一九三九年，當時就讀台北帝大醫學部第四屆的士林何家秀異子弟何斌（一九一八—一九八八），利用暑假，自己一個人偷渡到中國大陸旅行，參觀了北京故宮等地。何斌雖然學醫，但他不讀死書，興趣廣泛，思想開闊，關心政治，具有反日愛國主義思想，而且是個領袖型的人物，經常把士林地區中專學生團結在自己周圍。回台後，他特別向這些青年學生介紹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和燦爛的民族文化。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發動侵華戰爭，對內實行法西斯鎮壓的年代。對殖民地台灣，日本帝國的控制尤其嚴厲，對內實行皇民化政策，對外則採取隔離台灣與大陸的政策，台灣人赴大陸需要取得「渡航許可」。因此，何斌的大陸行，在



1941年，郭琇琮與祖國來的徐征教授學習中文；這年暑假，渡海對岸，旅行、考察，堅定了反帝的立場。（林雲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當時可說是少見的勇敢行爲，並且對身邊的年輕人起到一定的示範作用。^⑧

一九四一年暑假，與何斌同年，但在台北高等學校與台北帝大醫學部都晚了兩期的郭琇琮，也在學了北京話和中文之後，渡海到對岸的祖國旅行考察。他到過上海、廈門和廣州等城市，實際了解了祖國抗戰的艱苦狀況，也更認識了日帝侵略的本質，堅定了他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立場。^⑨

士林協志會

如果以人口比例來算，當時，士林地區就讀中等學校以上（包括中等學校、醫專和大學）的人口比例，可以說是全台灣第一。大約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何斌團結了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同班同學蔡滋涇（彰化溪湖人）和張鈺（大稻埕圓環人），組織了一個推動「地方文化啓蒙活動」的青年團體——士林協志會。除了這三位「最初組織者」，後來參加的主幹還有郭琇琮、曹永和、曹永裕（曹永和的弟弟）、潘迺楨（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五屆）、潘迺均及潘淵靜等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再後來，又有更多的青年學生陸續參加，主要以士林人爲主，也有少數外地人。起初，協志會對外公開活動，純粹是青年的文化活動。漸漸地，包括何斌、郭琇琮、張鈺、潘迺楨、曹永和、曹永裕等較具有抗日思想的人，又在郭琇琮手寫的國父遺囑上蓋印，結拜兄弟，成爲協志會裡頭的反日核心分子，並組織讀書會，一起研讀《孫文學說》。^⑩

一九四一年六月，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各地成立「皇民奉公會」分會，全面推動皇民化運動。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帶有反日性質的士林協志會，爲了取得日本統治當局的許可，於是以文化團體的名義正式申請，並獲批准，由何斌擔任首屆會長。^④

八月廿三日至廿五日，士林協志會借用士林公學校校舍舉辦的「士林文化展」，可以說是協志會成立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士林文化展的內容包括：防諜展（台北州出品）、防犯展（台北州出品）、鄉土展（台北帝國大學土俗學教室、台北圖書館和博物館後援）、產業展（士林園藝試驗所士林支所和台灣製紙株式會社）、無線展（放送局）、醫學展（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後援）、攝影展（台北寫真同志會）和放電影與娛樂晚會等幾個部分。由於協志會的核心成員，包括何斌、郭琇琮、張鈺、潘迺楨等人，都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學生，因此特別舉辦醫學展，向地方民眾介紹「西洋醫學與漢方醫學比較，西洋醫學史與漢方醫學史，腸、赤痢、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肺

結核、肺炎、梅毒、淋病、癩、甲狀腺腫等」，以及「生理實驗和理學的療法」。另外，由曹永和和潘迺楨負責鄉土展，並請楊雲萍當顧問指導，展出內容包括：「第一部／鄉土歷史」、「第二部／鄉土地理、風俗」和「第三部／鄉土風俗、文化」。該會成員一般認爲，在彼時彼地，士林協志會通過「鄉土展」介紹台灣的鄉土文化，也就是不同於日本文化的漢民族文化，起到了抗拒日本殖民當局皇民化政策的作用。而且，因爲它表面不談政治只談文化，所以沒有引起日本殖民當局的注意。^⑤

這次展覽會的規模很大，也吸引了許多台北市民前往參觀，轟動一時，傳爲奇聞。爲了籌辦這個展覽會，何斌、郭琇琮等幾個大學生會四處募捐，並做了大量的籌備工作；其他中學生或者跑跑腿，或者當會場的警衛。就在大家分工合作下，偌大的展覽會終於圓滿落幕了。何斌是個在



1941年8月23~25日，士林協志會舉辦「士林文化展」，迂迴抵抗殖民當局的皇民化運動；學醫的郭琇琮等人特辦「醫學展」，向民眾介紹基本的醫學衛生常識。（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文學、哲學和藝術上的教養都很深邃、思想進步的醫學生；士林文化展覽會後，他與郭琇琮等人又利用協志會這個陣地，開展許多有益的文化活動，來聚合士林一帶的學生與社會青年。譬如：何斌爲了號召大家追求真理，於是組織大專學生，研讀哲學，由他親自輔導學習會。此外，他們經常邀請著名文人，其中包括文學家楊雲萍、在台北帝大任教的北京人徐征教授等，來協志會演講或座談。^⑥



郭琇琮（前左二）與士林協志會的青年們經常運動健身。（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另外，因為在展覽會期間的娛樂晚會，曾經邀請大稻埕教會合唱團及大正町教會合唱團唱歌，促成協志會愛唱歌的少年男女，在展覽會後組織了一個男女混聲合唱團，並請士林長老教會的傳道師陳泗治指導。⁴⁴

陳泗治（一九一〇—一九九二），也是土林人，一九三四年，台北神學校畢業後，赴日本東京神學大學深造，並跟隨上野大學教授木崗英三郎學習作曲。一九三六年，完成畢業作，也是他第一部正式發表的作品——《上帝的羔羊》清唱劇。⁴⁵

協志會的音樂活動主要都在士林車站附近的基督教長老教會進行。合唱團主要是練唱各種世界名曲，然後到廣播電台或台北公會堂，舉辦演唱會。郭琇琮與當時就讀台北帝大預科的蘇友鵬及目前人在北京的黃辛潘唱高音部。由於郭琇琮家有鋼琴，因此，有時候也會在郭琇琮家舉行發表會。⁴⁶

「日據末期，在協志會唱歌的那些日子，現在想來仍然是充滿著溫暖啊！」多年以後，蘇友鵬提起年輕時候的歌唱歲月，仍然充滿懷念。「郭琇琮經常在聚會中用北京話唱〈滿江紅〉、〈蘇武牧羊〉。起初，我不知道他從那裡學來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後來，我才知道，他早就跟隨徐征教授學習祖國的語言和文字了。」

蔡忠恕事件

郭琇琮活動力強，除了士林協志會外，也與台北帝大醫學部同學蔡忠恕，籌組祕密的反日團

體。就在大學畢業前不久的一九四四年，因為在台北帝大發展漢民族意識的反日學生組織，郭琇琮與同學蔡忠恕等人被日本憲兵逮捕，判刑五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郭琇琮與蔡忠恕預料，隨著戰爭的發展，祖國軍終會登陸台灣；於是企圖糾集同志，發動武裝起義，密謀響應祖國，並煽動台灣人民共起反日。

自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來，蔡忠恕先後兩次勸服同班同學陳國興，加入他們的行列；但陳國興並沒有答應。後來，陳國興由於經濟拮据，將蔡忠恕的密謀出賣給充當日人密探的倪克祥。倪克祥隨即通過日本憲兵候補江萬達，將此密謀傳到日本憲兵思想股股長——桑畑准尉的耳裡。在桑畑准尉的利誘之下，陳國興允諾潛入抗日學生結社，充當日本憲兵的細胞，暗中調查蔡忠恕與郭琇琮等人的言行舉動，定時報告。

一九四三年，日軍在東南亞戰場節節敗退；侵略戰爭的敗象開始呈現。台灣因而被編入日本的絕對國防圈內，進入「決戰期」，同時也開始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兵源供應地。

這時，日本憲警當局接獲陳國興的密報說，蔡忠恕曾經預言：「一九四三年，義大利一定會戰敗。一九四四年冬天，盟軍將大舉襲擊德國；一九四五年春天，德國就會屈服。那時候，日本就不得不投降了。……」因此就更加緊密地注意蔡忠恕等人的動靜。

接著，陳國興又向日憲密報說，日前，蔡忠恕煽動其他同志說：「祖國軍就要來了。當祖國軍登陸時，台灣人要準備隨時起來，灑熱血。……」這時候，日本憲兵隊感到事態嚴重，於是直接接在北部一帶的校園內，安置大量的日本學生，著手調查、蒐集台灣學生反日計畫的內容及證

據。此後，每當美機轟炸的空襲警報響起時，這些充當日本憲兵隊細胞的日本大學生，立刻跑到憲兵隊，報告本省學生的調查狀況。

當時，帝大醫學部主管學生訓導事宜的「學生課」候補學生主任天士，同時也是日本憲兵少尉；因此，「學生課」也經常有日本憲兵出入。除此之外，日本學生間還有個擁護日本侵略主義的祕密團體——「興亞會」，負責暗中調查抗日學生的行動；該會的內部核心把所有激進的台灣學生看成民族主義者，對他們採取武力彈壓的態度；並且處心積慮想把台灣學生全部趕出帝大醫學部。另外，帝國大學醫學部內還有個同窗會性質的「東寧會」；該會的日本學生委員們經常公然壓迫台灣學生，煞費苦心地設法讓台灣學生臣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因為這樣，校園內，偶爾因台灣與日本學生間的敬禮問題而爆發糾紛、爭鬥時，往往就助長日本學生的氣燄。

一九四四年一月，台灣總督府公布了鼓勵台灣人民改用日本人姓名的辦法，「皇民化運動」的推展達到極致。與此同時，因為盟軍飛機經常轟炸台灣各地，人心惶惶。

這一年，先是日本學生間諜西山光世向憲兵隊報告：「帝大醫學部學生候客室內日本天皇及皇太子的照片，被台灣學生故意從頭部切斷，然後丟掉。」以及「台灣學生輪流在每個人的家裡，祕密舉行結社集會。」接著，另外的日本學生又報告說：「謝娥等幾名醫生，在河石外科的地下室，與英、美軍祕密會面，互通聲息。」

日本憲兵隊學生課的監視，因此更加嚴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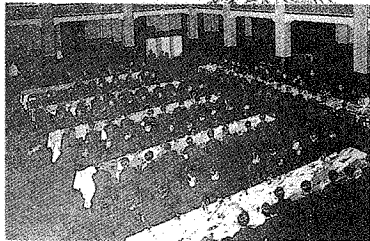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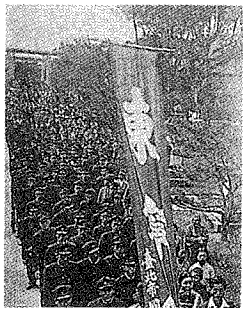
同年四月十五日起，憲兵隊於是在興亞會、東寧會與陳國興、江萬達、倪克祥等人內外配合策動下，以「研讀漢文、習國語、抗日」的名義，在北部一帶的校園，展開連續三天的檢舉行

動。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徐征教授和台籍學生蔡忠恕、郭琇琮等，以及其他高校具有抗日民族意識的台灣學生近千人，先後被捕。一時之間，監獄人滿為患；日本憲兵隊還不得不大量增建拘留所。^⑦

郭琇琮被捕入獄時，日本憲兵曾經百思不得其解地問他：「像你這種在台灣社會受惠的菁英分子，何以還會走上抗日之途？」郭琇琮毫不猶豫地告訴日本人：「身為一個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人，儘管個人的生活比別的台灣人安定，家境富裕；但這種個人與日本人的『平等』，不過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恥辱罷了！」^⑧

其實，不解的何止是日本憲兵而已！就是郭琇琮的家人顯然也對他的反日行動感到訝異。

「因為皇民化的關係，基本上，二哥和我都算是吃日本人奶水長大的。」郭琇琳說：「像二哥還會抗日，我也覺得奇怪。我知道，他具有民族性，性格也很勇敢。他常常帶著我一起練腕力，幾乎是每天練；我以為，他練腕力只是爲了要和日本人打架用的。就在他被捕前，有一天，他穿



1944年4月15日起，日本憲兵隊在台北帝大醫學部「東寧會」日本學生和少數幾名台籍學生內應下，發動一起反日學生大檢舉的行動。郭琇琮與同學蔡忠恕，以及徐征教授等多人被捕入獄。（取自《邱仕榮先生紀念專輯》，蕭開平／提供）

著被撕破又沾了血的襯衫回家，我問他怎麼回事？他笑了笑，騙我說是在圓山山上，被四五個日本人圍攻，但沒有受傷。可是，過沒幾天，日本憲兵就來家裡抓他。我才知道他其實是在從事抗日活動……。」

為了儘速完成台灣要塞化，大檢舉後，日本憲兵對這批學生進行非人道的刑求、拷問。其中，以「大學內抗日民族運動首領」之名被捕的帝大生蔡忠恕和郭琇琮等人，雖經嚴刑拷打，依然頑強抵抗。郭琇琮的肋骨甚至被打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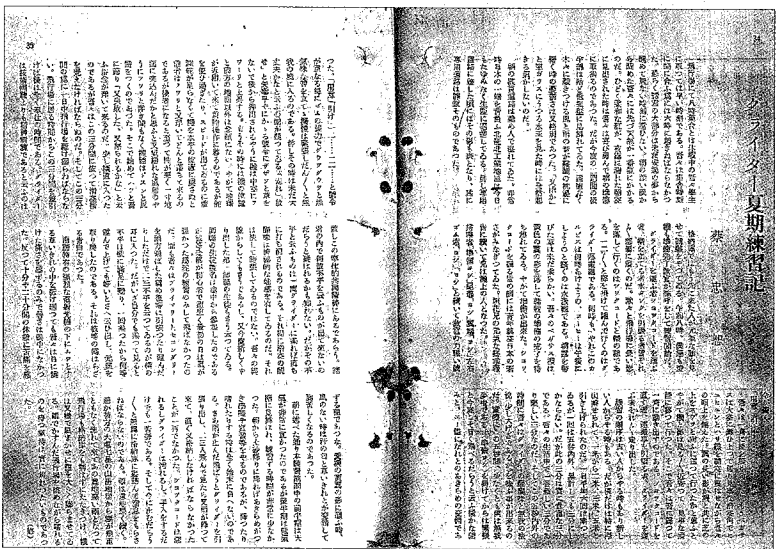
據在校期間與蔡忠恕和郭琇琮形影不離，被同學稱為「三隻烏鴉」之一的高蒼樹醫師回憶：蔡忠恕在獄中罹患了喉頭結核。就在台灣光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五月卅一日，盟軍飛機空襲台北的炸彈，恰巧落在台北監獄；郭琇琮利用盟軍飛機的轟炸，打破監獄的牢門，然後找到蔡忠恕的押房，把他拖救出來。然而，此時蔡忠恕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了，郭琇琮雖然學醫，卻因手邊無藥，終究無能挽救他的生命。六月初，無緣再見耀眼光的蔡忠恕在獄中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

光復第二年，也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的《台灣新生報》以「民族純血的脈動」為題，揭露了這場事件的真相。接著，在七月七日的抗戰紀念日，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特地在醫學院大講堂，為蔡忠恕舉行一場紀念追悼會。會場中央懸掛著一幅蔡忠恕遺像，英靈兩側的輓聯分別寫著：

甘以天下為己任，是真革命！
光我民族而流血，不愧英雄。



1946年4月15日，《台灣新生報》揭露兩年前北部學生大檢舉的真相。



1939年11月，蔡忠恕發表在《台高》第14期的散文。

上午十時，追悼會正式開始，由倖免於死的郭琇琮主持，醫學院院長杜聰明代表宣讀祭文。祭文強調：

「……如今本省同胞，重歸祖國懷抱，河山光復，人物翻新，隔絕聲教五十年，復見漢官威儀，君之英魂有知，亦可含笑於九泉耳，且君之大志，雖屈於生前，而獲伸乎身後，雖重壓其生前，而弗能湮沒於身後，雖折翻於生前，而獲收功乎身後；則君生雖不幸，而死可謂有幸，君之不昧英靈，差堪告慰矣，君之愛民族心，可無遺憾矣，君之奮鬥精神，庶幾不泯矣……」^⑩

光復初期的青年領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

九月三日，黃埔二期出身的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將軍（台北蘆洲人）特派副總隊長張克敏，攜帶「中華民國國旗」一面，搭乘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克上將的飛機，飛抵台灣。九月四日，張克敏將這一面象徵收復台灣的國旗，在當今的台北賓館，冉冉升起。台灣光復後的第一面「中華民國國旗」於是在中國的領土台灣，飛揚飄盪。^⑪

張克敏，又名張士德，黃埔四期，上校。^⑫據說是前台灣農民組合中堅分子，日據時代，因為日警的通緝而逃亡大陸，參加抗戰。

台灣義勇隊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在浙江金華成立的抗日組織。一九四二年，台灣義勇隊奉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命令開始籌組三青團組織，並於福建龍岩正式成立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以幹事會為領導機構，李友邦為主任幹事。^⑬一九四五年三月，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呈准中央，籌設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李友邦任籌備處主任。^⑭

以國民黨上校軍官的身分首先返台的張士德，所負的使命就是籌組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但是，因為台灣人仍然怕日本人，沒有人敢去他下榻的梅屋敷旅館（今國父史蹟紀念館），找他這個「國軍」。他於是主動找陳逸松律師面談，希望他擔任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台北區團部主任，把青年組織起來，以防止日本人在撤退前破壞財產。^⑮

為了拉攏台灣的青年學生，張士德又親自到台北監獄的牢房裡，把學生領袖郭琇琮等人接出來；同時，極力想拉攏對台北知識青年有號召力的郭琇琮加入三青團。

郭琇琮在坐牢之前就已經與協志會的核心分子一起研讀過三民主義，並且成為三民主義的信徒。

「日據末期，」後來成為郭琇琮妻子的林雪嬌曾經問他。「時局這麼壞，你怎麼會信三民主義呢？」

「我很贊成三民主義的兩種主張，」郭琇琮回答她說：「第一是聯合弱小民族抵抗強權和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我們台灣人就是沒有民族主義的觀念……第二是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像我家這麼大、這麼有錢，就應該要節制一點。雖然我爸爸每到七月普渡就會散財給整條街乞討的窮人，可我認為，這樣的救濟只是部分救濟；只有把整個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改造，大家才都可以過上幸福的日子……」

然而，認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理念，並且以實際行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實際的政治權力卻沒有什麼野心的郭琇琮，最終還是以學業未完成的理由，婉拒了張士德要他加入三青團的邀請。

出獄後，郭琇琮先是入院手術，切掉因為刑求被打斷而化膿的肋骨，住院兩個星期後才康復。^⑦

這時候，日據末期，日本帝國主義針對台北地區中等學校以上反日學生所展開的大檢舉事件，不但使得出獄後的郭琇琮成爲青年學生心目中的英雄典範，而且也爲這些組織分散、不同學校的學生，提供了擴大串連與團結的條件。因爲這樣，戰後台灣第一個自發性的學生組織——「台灣學生聯盟」，很快就以郭琇琮及同時繫獄的幾個學生爲中心，經過幾次的學生幹部會議之後，於十月初在台北市公會堂^⑧正式成立；原來各校的學生組織則改爲該聯盟的支部。

「台灣學生聯盟」組成以後，隨即積極主辦以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爲主題的宣傳、演講及教育等活動。

士林協志會的活動也在這段時期達到空前的高潮。他們借用士林信用合作社禮堂辦了一個「國語學習班」，一面



1945年10月，出獄後的郭琇琮（右）組織台灣學生聯盟，推動迎接祖國的各種活動。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學國語，一面研讀三民主義，努力了解祖國大陸的情況；同時也在士林慈誠宮廟口，通過郭琇琮的教唱，學會了第一首中國的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以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⑨

郭琇琮帝大醫學部的同學高蒼樹醫師說，這段期間，郭琇琮還應在台灣廣播電台主持音樂放送節目的呂泉生之請，每天從士林走到新公園的電台，教唱國歌。^⑩

這個說法，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廿七日，在天母採訪呂泉生先生時，得到確認。

「光復初期，台灣民眾熱烈要求我在電台教唱國歌。」呂泉生說：「我於是去找當時正在瘋三青團的陳逸松。我記得，當時呂赫若與張冬芳也在場。我把民眾的反應告訴陳逸松，並問他有沒有歌譜？他就拿了一本趙元任編的中學音樂課本，打開第一頁給我看說，這就是。我看到上頭寫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就懷疑地說，這是黨歌嘛！他笑笑說，大家都唱這條……：我只好接受。但是，我接著又提出一個難題；我說，那些歌詞，我雖然會看，卻不會唸，要怎麼教？這時，呂赫若就說，士林有個叫郭琇琮的青年，正在教國語……：我於是就去請郭琇琮到電台，教唱國歌。但是，教到第三天，就有人反應說，他的國語不標準……：」

十月十日，台灣光復後的第一次國慶。郭琇琮與士林協志會的成員們，又將士林一帶的學生與社會人士集合起來，公開慶祝。

「那時候，台灣雖然光復了，但日軍還足以控制整個台灣。」蘇友鵬追憶當時的情況說：「儘管如此，由於這是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以來，台灣同胞第一次能夠公開慶祝國慶，大家都很興奮。在會場上，郭琇琮以一口流利標準的北京話，帶領全體與會者唱〈國歌〉和〈國旗歌〉，恭讀

〈國父遺囑〉，最後，再高唱〈國父紀念歌〉與〈義勇軍進行曲〉……。」

十月十七日，台灣民眾期待了五十年的祖國，終於以國軍第七十軍及部分長官公署官員為代表，分乘四十餘艘美軍艦艇，抵達基隆。「台灣學生聯盟」也與其他人民團體一般，抱著「歡天喜地」的心情，大力動員各校學生，前往基隆碼頭、台北火車站前或各個交通要道，大聲唱著剛剛學會不久的「歡迎歌」，熱烈迎接。當人們因為目睹一個個挑著鍋子、食器，背著雨傘、被褥的國軍，秩序凌亂地從夾道歡迎的民眾前面走過而感到失望時，這些青年學生立刻替祖國來的軍隊辯解說：「經過了八年的辛苦抗戰，祖國當然是窮困的；也因此，祖國的軍隊才會這樣啊！……。」^⑩

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五日，郭琇琮與十幾名本省青年，在台北市中山堂開了一場文化問題懇談會，決議發行啟蒙本省青年男女的青年文化雜誌《夏風》。^⑪然而，這本《夏風》終究因為這樣那樣的因素，似乎未見出刊。隨著來台接收官僚為了爭奪權利而表現出越來越嚴重的專制腐化作風，熱愛祖國的郭琇琮及其領導的學生聯盟的積極成員，終於看不過去而走上了反抗之路。就在二二八事變之前，郭琇琮先是帶隊前往台北市警察總局靜坐抗議，並用粉筆在牆上書寫反對官僚腐化的標語；接著他又率領群眾，包圍正在中山堂開會的台灣省參議會會場，要求取締官僚貪污，起用台灣人才……。^⑫

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相

在郭琇琳眼裡看來，他的二哥郭琇琮是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

「我知道，他當年之所以順從父親的意思學醫，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救世。」郭琇琳說，「他甚至立志要當台灣的『史懷哲』呢！」

郭琇琮入學台北帝大醫學部時是第六屆學生，原來應於一九四四年九月畢業；因為反日坐牢，出獄後，他才通過補考，於一九四五年九月畢業，成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七屆畢業生。^⑬

「聽說他本來要當臨床醫師，後來（卻）到衛生署（局）防疫課當技士，」同是士林人的同學柯德三醫師說，「他那種人不是可以安安靜靜當醫生的。」^⑭

當時就讀台大醫學院的顏世鴻醫師說，郭琇琮畢業後，曾經在台大附屬醫院第一外科服務。

「日據末期，我在芝山巖東麓的台大預科就讀，賃居士林街上時，就已經聽過郭琇琮的大名。」顏世鴻以一種敬仰的心情追憶他所知道的郭琇琮。「光復後，我經常在醫學院的走廊遇見他。他人不高，戴著眼鏡，眼神如刀，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自我肯定型的突出人物。」^⑮

那麼，如果說得更完整一點的話，光復後的郭琇琮，應該是在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先到台大醫院第一外科服務，然後才到衛生局防疫課任職。

台灣光復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將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改制為民政處衛生局，並指



1945年9月，郭琇琮（左在）通過補考畢業後，曾經進入台大醫院外科服務。



1946年，郭琇琮進入經利彬博士領導的衛生局，從事防疫工作。
(取自《台灣時人誌》)

派浙江上虞籍的著名醫藥、生理學家經利彬博士為首任局長。^①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衛生局完成全省衛生機構的接收工作，隨即在經費困難、日籍公衛人員離去的條件下，負責推動全省的衛生行政工作。

除了郭琇琮之外，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出身，當時在衛生局工作的年輕醫師還包括：第二屆的詹湧泉博士（技正），第三屆的賴肇東（技正兼技術室主任），第四屆的何斌、許夢蘭（技正）等人。^②士林協志會主要發起人何斌，原在台大附屬醫院皮膚科當醫生，可他認為醫生的主要職責應是使人不生大病，而不是看病；台灣光復後，於是毅然離開台大附屬醫院，轉到長官公署民政處衛生局任職，從事防疫工作。^③

那麼，郭琇琮為什麼也選擇從事防疫工作呢？

現實是這樣的：因為戰爭的破壞，光復後的台灣，到處可見殘垣斷壁和堆積如山的垃圾。一九四六年，由於環境衛生太差，再加上外省軍民陸續來台，港口檢疫失去管制等等因素，天花、霍亂、鼠疫等傳染疫病，於是在台灣各地流行起來。一時之間，人心惶惶。^④

郭琇琮認為：光復以後，「台灣從祖國的手中取得不少東西。渴望卻遙不可及的東西終能自由地獲得，但遺憾的是，不想要的東西同時也緊握在手中。天花、鼠疫、霍亂就是屬於不想要的東西之類。」然而，面對天花、鼠疫、霍亂，就像在激變的條件下，對台灣的一切建設一樣，「需要全體同心協力」，「付出更多的耐心、努力與勇氣。」就像黃河氾濫時，老百姓為了防止堤防的崩潰，只有將一個一個沙包投入激流中一樣。

因為這樣的認識，在疫病流行的彼時，郭琇琮選擇從事防疫工作。他以衛生局工作幹部的身分，領導由少數剛離開台灣大學醫學院校門的醫生，以及大學生組成的青年學生隊，在基隆、台南、彌陀、頂茄荳、宜蘭等地，展開巡迴治療和公共衛生的推廣工作。

在「光復以後最先受到霍亂侵襲的基隆」，郭琇琮和那些青年學生們，奮力推展霍亂防疫工作，並「在十日間奏起凱歌」^⑤。因為海外來的船隻不准入港，當時，基隆港停了一艘滿載蝦米的廈門來的帆船，久久不肯離去。為了隔離防疫的需要，郭琇琮隻身上船，好言勸船長把船開走卻沒被接受；他於是要給船上所有人員打預防針，可船長還是不願配合；郭琇琮下了船，隨即拿了一把日本刀，果斷地把繫船的繩索砍斷……^⑥

在南部，四月廿六日，霍亂菌首先從環境衛生很差的台南市灣裡入侵，然後在貧民居住地帶的西區及北區猖獗。郭琇琮



1946年5月3日，《台灣新生報》有關霍亂流行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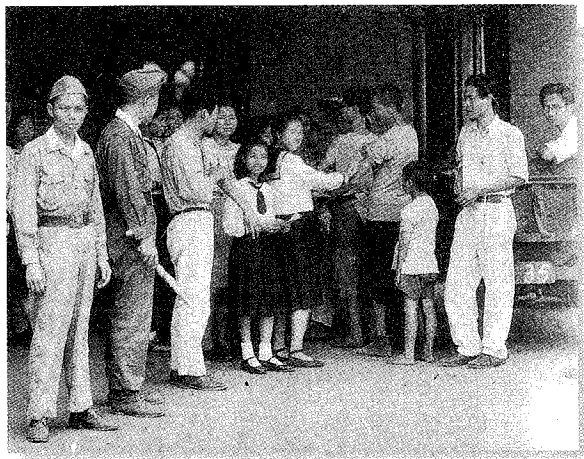
在進行預防注射的過程中認識到，由於這些窮苦的居民無法使用自來水，而且將近兩百個人共用一個廁所，廁所與水井便成了感染源，造成居民一個接一個死於霍亂的悲劇。^⑦據統計，到了五月三日，台南地區已經有十八人因霍亂死亡；六月五日，台南地區的霍亂患者已達一百一十二人。^⑧爲了避免疫情繼續擴大，政府當局訂定了各種防疫禁令，例如禁止那些窮人家的孩童販賣檸檬汽水；因爲這樣，這三面對霍亂威脅生命安全的窮人，在經濟上又首先遭到打擊而陷入生活的悲慘困境。基於憐憫心，郭琇琮及其他防疫工作人員紛紛慷慨解囊，捐助這些可愛的失學孩童。然而，面對現實，郭琇琮既無奈而又沉痛地知道，這樣的捐贈只是杯水車薪，它只能減輕他們自己精神上的負擔而已；如果，政府當局只知一味徹底地強行防疫禁令，卻不能有完善配套的經濟救濟辦法，那麼，對這些窮苦民眾來說，還是等於宣告他們的死刑。^⑨

果然，七月一日，台南市灣裡村又再出現霍亂；^⑩並且如預料中的以台南爲根據地，向南部一帶蔓延；^⑪到七月十二日爲止的統計，南部地區因霍亂流行已有三百多人死亡。^⑫

八月廿五日，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午元節，台南縣警察局以避免傳染霍亂的理由，禁止新營民眾開演廟戲，因而爆發了激烈的警民衝突事件。^⑬

相對於新營的血腥衝突事件，郭琇琮與防疫工作隊的青年學生們在彌陀的防疫工作，卻是一片和氣靄靄的氣氛。因爲這樣，郭琇琮深深體認到「想要發動強權的方式與真心爲民眾而融入民眾間的方式差異」。

高雄縣濱海的貧窮漁村——彌陀及高雄縣與台南縣交界附近的頂茄荳，也難逃霍亂的無情襲擊。當郭琇琮與那批年輕的防疫工作人員進入頂茄荳時，他們首先看到，就像電影《漁光曲》^⑭那



1946年夏季，郭琇琮（右一）在南部從事防疫工作。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般，在那裡所展開的竟是都市人無法想像的、徹底陷於貧困的生活——他們平均四天只吃三餐，而且只是摻入一點白米的雜穀飯；大部分的村民，不管男女，只穿條簡陋的褲子，共同過著赤身露體的生活……。

一句話，與滿足沉醉於酒色狂亂的溫柔鄉的台北及其他大都市比起來，根本是天壤之別。因此，不難理解，當這些貧窮無知的貧窮村民面對凶惡的虎疫侵襲時，也就只能求助於神祇了。

通過先前防疫工作的經驗總結，郭琇琮深刻地認識到：沒有人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概仰賴神祇，只是封建性尚未打破的必然現象而已。因此，爲了遏止如此猖獗的霍亂，首先還是要先使得民眾對科學有所理解與認識，幫助他們打破對神祇的迷信，進而信賴科學，自覺地與防疫工作隊協力，一起向霍亂菌戰鬥。

郭琇琮與防疫工作隊的青年學生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改變村民「進入隔離醫院就是邁向墳場的第一步」的錯誤觀念。爲此，他們隨即展開不分晝夜、不屈不撓的啓蒙工作，並積極整頓隔離醫院，更新醫療方法。同時也救濟入院患者的家屬生活。漸漸地，一部分村民被他們誠懇真摯的工作態度感動了，於是接受工作隊的指導，一起投入防疫工作；當其他村民違反防疫禁令時，他

們就會加以責問、開導。這樣，隨著治癒出院的人越來越多的事實，到後來，那些不懂科學的一般村民自然就完全信賴科學了；當他們發現自己有可疑的症狀時，立刻就自動到醫院求診。因為這樣，彌陀的防疫工作，不但在短時間內便奏起凱歌，而且通過防疫工作完成了堅固的自治體制。

「在強調一定要地方自治的今日，我們見到在此僻村也締建了堅固的自治基礎，於是對台灣的將來抱持無限的希望。」郭琇琮激動地總結了這樣的防疫工作的經驗。

學生的崇高身影

總的來說，在這次全省巡迴的防疫工作中，郭琇琮最大的收穫是：通過防疫面，看到了台灣在光復一年間所顯現的種種社會相罷。

一方面是科學退步、迷信復活的現象。郭琇琮看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群人，拒絕預防注射，卻又要求立著青條的民權。」因此，他憂心忡忡地說：「在西服的漂亮與對科學認識程度成反比的今日之社會相，告訴了我們什麼？」

另一方面，在防疫工作隊所到達的地方，郭琇琮不但看到了青年學生們在防疫工作中所展現的令人敬佩的崇高的身影，而且聽到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爲了建設台灣，學生應該團結起來。」聽到這樣的呼聲，郭琇琮在感動之餘，忍不住向全省各地的台灣青年學生們大聲疾呼：「拿出自信，認識自己的力量，不要忘了自己的使命。」

郭琇琮斷言，「如果沒有學生的協助就無法撲滅這次的霍亂。」

在基隆，郭琇琮看到當地女學生奮力推展霍亂防疫工作的高貴倩影。在宜蘭、頂茄荳、彌陀的防疫工作，除了少數像他這種剛開校門的年輕醫生外，其餘工作都由還在就學的年輕學生們來推展。在整個分層負責下，他們親手建立隔離醫院；設立檢驗室，作培養基並進行檢驗工作；檢查廁所、水井的衛生，然後編號，每天消毒……。爲了表現與民眾一起向霍亂進行持續艱苦鬥爭的決心，他們跟民眾吃同樣粗糙的食物，在狹窄的房間裡擠同一條毯子睡覺，而且常常不分晝夜地通宵工作……。他們因此取得民眾的信賴，終於遏止住難纏的霍亂，默默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台南市，郭琇琮認爲，如果沒有當地年輕學生們的協助，防疫工作隊就無法完成預防注射的工作。初抵台南時，他們聽說，在當局防疫體制未完備前，台南工學院的學生已經在努力進行檢病的戶



1946年夏季，郭琇琮（立左五）與從事防疫工作的年輕醫師及青年學生。（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口清查工作了；另外，台南一中的學生們眼見市政府的工作進展遲緩，也自動地組織起來，進行防疫工作。後來，郭琇琮更目睹，將近兩百名男女學生，無視於炎熱的天氣，在街頭默默地進行勸導民眾注意飲食衛生或協助交通管制的工作。有一天，郭琇琮和一群女學生、護士及警察，搭乘防疫專車，花了近兩個鐘頭的車程，來到進行預防注射的某村落。當時，天正下著豪雨。他看到，那些負責執行交通管制的警察們，雖然都帶著雨具，卻以天雨的理由，拒絕下車執勤；相反地，那些沒帶雨具的女學生和護士們，卻二話不說，一個個捨著便當，默默下車，在大雨中，進行協助交通管制與預防注射的工作。

郭琇琮說，當他以感激的目光注視著這些被淋成落湯雞的女學生們美麗的身影的同時，心中自然產生「凡是吃台灣米的其他地方的人都要對台灣懷有深刻的愛情」的強烈要求。

最後，郭琇琮對未來感到樂觀地說，「一想到將來學生在台灣社會所占有的地位時，就覺得胸中充滿希望。」因為「從學生們這種強烈的責任感與崇高的精神當中，可以找到台灣及中國強而有力的指導者與建設者。」因此，他「祈禱這些為保護自己所愛之地而努力的學生們及民眾純真、勇敢的風氣，永遠都不會消失。」⁸²

戀愛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郭琇琮認識了一個「傲慢的」文藝少女林雪嬌。

「因為自己戰前在日本學的是醫護營養，對於當時全省流行的霍亂，也就特別關心和憂心

了。」林雪嬌以一種戀愛般的心情談到自己和郭琇琮認識的因緣。「當時，我不時在報上看到郭琇琮撰寫呼籲民眾注意公共衛生、接受預防注射的文章，自然就從心裡尊敬和仰慕他的專業和人品。我於是透過在衛生局工作的高女同學張月鳳，認識了郭琇琮。」

有一天，林雪嬌和張月鳳見面聊天時，聊著聊著，她們就聊到郭琇琮及其所發表的有關防疫問題的文章。

「最近，衛生局有個叫郭琇琮的人，經常在報上發表有關防疫問題的文章，蠻出風頭的；」林雪嬌刻意繞了一圈，然後問張月鳳：「妳也在衛生局工作，這個人妳認識嗎？」

「認識啊！他是我的上司，當然認識。」張月鳳然後改口問林雪嬌：「妳在日本學過醫護營養，妳覺得他寫的東西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人蠻有英雄主義的作風！」林雪嬌直接批評說，「還有，我不太滿意他寫的論調；因為他都沒有關心婦女的問題，沒有談到婦女。我想，這個人大概還是希望能夠支配女孩子的封建男人吧！」

張月鳳於是把林雪嬌的批評，轉達給郭琇琮。

「這個女孩真傲慢！」聽了張月鳳的傳話，向來受到年輕女孩尊敬與崇拜的郭琇琮，用日文笑笑地說：「妳幫我們安排，我要見見這個女孩子。」

幾天後，張月鳳便陪著林雪嬌，前往新公園，與郭琇琮見面。他們聊了許多彼此對台灣流行的霍亂和公共衛生的看法。聊到後來，林雪嬌針對男女關係不平等的問題提出意見，郭琇琮也不爭辯，只是約她到藝日間（妓院）看看。

「星期六，」郭琇琮說，「妳和張月鳳，妳們兩個跟我一起到紅磚仔厝的藝旦間看看，妳就知道我有沒有關心婦女了。……」

郭琇琮所說的紅磚仔厝藝旦間，就是現在保安街一帶的江山樓。林雪嬌不知道郭琇琮約她們到那種地方要做什麼？但是，雖然心裡很害怕，不服輸的她還是在張月鳳陪伴下，抱著探險的心情，按時前往那個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

到了那裡，郭琇琮正和幾個醫生在藝旦間的地下室，給一個女病人治療。一走進地下室，林雪嬌就聞到一股難聞的臭味；接著，她看到一個穿短褲、背心的年輕女孩子，躺在床上；郭琇琮正在用雙氧水，替她清洗臉上那一朵朵像梅花一般的面皰；然後，她又看到，郭琇琮給那個看起來只有十六、七歲的女孩注射「六〇六」。郭琇琮一直很細心地照顧病人，沒有跟林雪嬌和張月鳳說些什麼。林雪嬌知道，「六〇六」是治療梅毒的藥；但是，她站在一旁，不敢隨便多問；同時，心裡不好意思地想：「原來，他也是關心婦女的啊！」

診療完畢，走出地下室後，郭琇琮故意問林雪嬌：「怎麼樣，妳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那個女孩好可憐！」林雪嬌說：「她還那麼年輕，怎麼就得了這種病？」

「妳是有錢人家的小姐，」郭琇琮語重心長地跟林雪嬌說，「像妳這樣生活過得好的人，社會上並不多；所以，妳是不會知道，她們窮苦女孩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的！……像這樣的可憐女孩，台灣社會還有很多；我們要做的工作還有好多好多。」

林雪嬌無語地走著。

「我的想法是，只有社會得到改造，婦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等地位。」郭琇琮進一步邀請林

雪嬌說，「妳願意跟我一起工作嗎？」

林雪嬌答應了。

後來，郭琇琮就開始和林雪嬌約會。

「當時，我們約會的地方就在新公園，也就是現在的二二八紀念公園。」林雪嬌說：「那時候，我們連咖啡廳都沒有進去過。郭琇琮說，咖啡那麼貴，太浪費錢了！起初，我還抱怨他小氣，當醫生又不是沒有錢！後來，我才知道，他的錢都拿去接濟人了！……」

當時，她們約會的時候是不談感情的，只談社會或婦女方面的問題。郭琇琮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試著改變林雪嬌的觀念，要把小姐身段放下來。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以後，」林雪嬌說。

「我看到郭琇琮那種家庭出身的人，卻能放下身段，為勞苦大眾服務；也因為欽佩郭琇琮人道主義的人格和觀念，於是也開始試著從生活上自我改造。」



第三高女出身的林雪嬌（立右二），因為批評郭琇琮的防疫工作沒有關心婦女問題而與他相識，進而相戀。（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少女時候，林雪嬌就很喜歡文學。她跟郭琇琮說，小時候，她就已經讀過父親書架上的《茶花女》、《簡愛》等世界名著。因此，每次約會的時候，郭琇琮總會拿一本書給她看；等到下次見面的時候，他就像個指導老師似地，耐心地與她討論讀書的心得。因為這樣，林雪嬌陸續讀了魯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中國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郭琇琮跟林雪嬌說，這些書，裡頭寫出了社會不公平的現象，看這些書可以讓我們知道社會的真實一面。

「像我這樣的大小姐，從小所受的教育只曉得要做個賢妻良母。」林雪嬌自我分析。「老實說，剛開始，我覺得那些書所描寫的那些人的生活，與我距離太遠了；不過，經由這些書的閱讀與討論，我的民族主義思想與社會意識，也就漸漸地被他培育起來了。」

後來，林雪嬌也曾跟隨郭琇琮，深入山地部落，為原住民同胞治病，並且教他們讀書識字，深得山地朋友的信任。

「記得有一天，」林雪嬌回憶說：「工作結束後，郭琇琮忽然感慨地對做他助手的我說，真希望能夠留在山地，做史懷哲在非洲所做的工作呀！但是，時代亂成這樣子，我們得先改造社會，為全台灣的人民謀求生存尊嚴，然後，才能到山地完成我獻身偏遠地區醫療工作的心願啊！」^⑧



郭琇琮（右二）告訴林雪嬌，他希望日後能夠到山地或偏遠鄉村，從事史懷哲在非洲做的工作。
（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二二八

戰後，士林望族不會運用本身既有的資產，往往決定家族命運的走向。^⑨

郭琇琮的父親郭坤木，顯然是個「既聰明又善於理財」的實業家。郭琇琳說，在日據末期，他認為，都已經在戰爭了，要土地做什麼！於是就將所有的土地賣出去，改做其他投資。

這樣，光復後，郭坤木所擁有的資產已經足夠讓他成為改稱彰化商業銀行的重要股東之一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長嚴家淦令派林獻堂為彰化商業銀行籌備處主任，並飭自同月十六日起，接收原有彰化銀行，照常營業。十月十九日，彰化商業銀行奉行政長官公署西篠署財字第三四八一三號訓令，派郭坤木等人為籌備處委員，輔助該處主任辦理籌備事宜。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下午二時半，彰化商業銀行創立股東大會於台中市總行會議廳召開，郭坤木與林獻堂同被選為六名商股董事之一；接著，郭坤木又被第一屆董事會指定為三名常務董事之一。三月一日，上午九時，彰化商業銀行在總行會議廳舉行成立典禮。由於前日台北市因警察取締香菸攤販與市民發生衝突，惹起所謂「二二八事件」，台中市民也在銀行附近的台中戲院舉開市民大會；典禮於是在沉重的氣氛下匆匆結束。^⑩

郭坤木擔心家裡出事，典禮一結束，便憂心忡忡地設法趕回台北。

在此之前，因為長子郭琇瑩在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不久，就罹患肺病病逝之故，郭坤木自然

就對老二郭琇琮更加期待了。然而，郭琇琮不但不能順從他的意願，老老實實地做個賺錢的醫生，還因為反日而被關進日本人的大牢裡頭。光復以後，郭琇琮仍然不肯安分地當個醫生，到衛生局搞防疫工作；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可是，當郭琇琮在報上發表的防疫文章，對貪污無能的接收官僚提出批評的時候，社會地位已經逐漸爬上頂峰的郭坤木於是開始擔憂：這個滿腦子充滿理想主義的兒子的政治言論，終將要為整個家族帶來無限的禍患。因為這樣，父子之間時常發生劇烈的爭執。

「我怎麼也搞不懂，」有一次，郭坤木無法理解地質問郭琇琮說：「我們家有錢，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麼就會生出你這個老是反政府的兒子？」

「我們郭家，本來就具有反抗惡政的優良家風。」郭琇琮理直氣壯地批評郭坤木。「但是，您卻保守、馴服，只顧慮到自己身家的安危與榮華富貴，卻全然看不到人民被強權欺壓的痛苦！……」接著，郭琇琮進一步對他父親說：「您不是從小就要我做一個有出息、能幹的人嗎？我不是也順從您的意思學醫了嗎？爸爸，醫生有三種。第一種是只給人治病的醫生；第二種醫生不但治病，並且還找出病因；第三種是像孫中山那樣的醫生，他看的是國家、民族的病，是救國的醫生。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去完成這第三種醫生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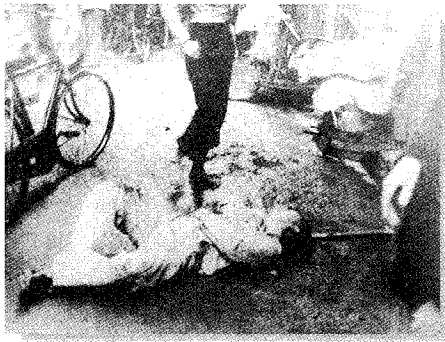
在回家的路上，郭坤木想起郭琇琮給自己講過的這些話，於是就更加憂心地想到：「這次，這個兒子恐怕就要給家裡惹來一場難以避免的麻煩吧！」

果不其然，當郭坤木的私人座車回到士林家裡時，家人便告訴他，早在事件初起後，郭琇琮便已經在外頭跑來跑去，不知去向了。

「事情終於發生了。」林雪嬌追憶二二八事件當時，她所知道的郭琇琮的行蹤說：「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晚上，壓抑了一年的民怨，終於被專賣局的查緝員點燃而爆發了。那時候，我和郭琇琮正在熱戀中；外面雖然亂糟糟的，他卻突然在我家出現，告訴我外頭的狀況，叫我不出去亂走；但他自己卻在外頭到處奔走。我聽說，大概是二月廿八日當天罷！他立即以巡迴醫療時打下的群眾基礎，迅速召集了新店烏來的高山族同胞，社子一帶的蕉農、工人，以及在淡水河域捕魚的居民，會合士林一帶的學生隊，加入民眾的行列，準備到市郊的軍火庫，奪取武器，作長期的戰鬥。」

三月一日，上午十時，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台籍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在中山堂召開大會，組成「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決議推派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台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台灣省參議員王添灯、國民參政員林忠等為代表，晉見行政長官陳儀，提出解除戒嚴令、釋放被捕市民、軍警不許開槍、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並由陳儀向全省廣播等數項要求。陳儀全部接受，並認為官民共組的處理委員會應定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三月一日，我興奮而緊張地跟著郭琇琮到石橋頭（今延平北路一段與長安西路交叉口），與王添灯、林茂生等會合，準備前往長官公署抗議。我還記得，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特地以師長的身分告誡郭琇琮，絕對不能傷害無辜的外省同胞。下午，我們到廣播電台找播音員宋非我，通過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郭琇琮隨即投入鬥爭的行列。

廣播，號召全省人民：團結起來戰鬥！」林雪嬌追憶當天的情況說：「這一天，台北市到處都是軍隊、憲兵治安警察隊與武裝的巡邏車來來往往，到處都聽得到槍聲，馬路上灑灑著鮮紅的血。學校停課了，工廠停工了，商店關門了，一切交通都斷絕了。台北幾乎變成一座死城了。我看到市街牆壁上貼滿了各種口號傳單——打倒陳儀王國！台灣同胞趕快起來，爭取麵包，爭取自由，爭取民主！不願坐視同胞同學被槍殺、被逮捕！……等等。」

三月二日，上午十時，台大、延平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各中等學校的高年級生，大約數千人，在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會上抨擊陳儀接收政權的腐敗政治，要求政治民主、教育自由，並立即製作傳單，散發市民，鼓勵民眾團結鬥爭。

「郭琇琮認清，陳儀的一切措施，只是他狡詐的緩兵之計。」林雪嬌說：「他認為，只有把自己武裝起來，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於是暗地裡糾合學生與工、農組織，彼此確保聯絡，並加緊奪取武器。這時候，他還特別叮嚀我，隨時準備動員女學生，組成醫護隊，加入戰鬥的行列。然而，我父親擔心我的安危，說什麼也不讓我再跑到外面。郭琇琮他們戰鬥的情形我就不很清楚了。」

具體來說，三月一日起，台北的「二二八」鬥爭分別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條戰線是以地方士紳和民意代表為主，部分群眾團體代表參加組成，整天在中山堂開會的「處理委員會」。另一條戰線是看到「處理委員會」的複雜性與妥協性，不能解決問題，而準備武裝鬥爭的群眾。這時候，中共地下黨「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站在群眾中間，擔負起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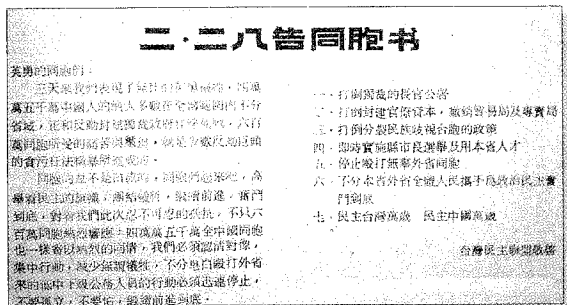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派彰化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九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後，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中共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幹部張志忠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四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七月，蔡孝乾潛台，領導組織，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任書記，張志忠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後，隨即「緊密團結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號召「全省各階級人士（包括外省人與高山族同胞），組織廣泛的愛國愛鄉民主自治統一戰線」。

基本上，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期間，是中共「省工委」的立足時期，當時，只建立了「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台中縣工作委員會」及台南市、嘉義市、高雄市三個支部，所屬黨員只有七十餘人。

三月四日，中共地下黨通過黨人李中志，團結了日據末期因為抗日而坐過牢的學生領袖郭琇琮、陳炳基，以及延平學院的葉紀東等人，然後再通過台大校本部、師範學院、台大法商學院和延平學院等各校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動員學生，準備發動武裝進攻。李中志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由陳炳基



台北學生武裝計畫總指揮李中志 (1916-1950)。(李水清/提供)



這些學生分成幾個小隊，然後由各隊分幾路去劫南機場的彈藥倉庫，解除國軍的武裝。……到了深夜十一、二點，天空仍然下著毛毛雨，我跟隨其他隊員，沿著萬華到新店的鐵道（今汀州路），前往中正橋下待命，準備與由萬華方向過來的烏來山胞會合。我聽說他們身上握有武器。……結果，我們一直等到凌晨兩、三點，他們還是沒有來。……」

「當天晚上，入夜以後就下著大雨。」在建中集結的第一大隊領隊陳炳基說，「我們一直等不到武器的支援。後來，我眼看著著第一大隊的聯絡員始終沒有回來，於是就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冒著傾盆大雨，探聽今晚的計畫是不是一定要執行？當我在師範學院找到郭琇琮時，我看到他蒙著臉在給學生講話；我於是走上前問他，今晚的起義到底幹不幹？郭琇琮馬上堅定地一口回答說，幹！於是我就騎車回建中，鼓勵其他學生說，今晚的起義我們一定要幹下去！……」

「爲了聯絡全盤的作戰計畫，地下黨在警備司令部附近『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廖瑞發的家，設立總指揮部。當天晚上，蔡孝乾、林樑材和廖瑞發等幾個領導人，也都聚集在這裡，了解隨時的戰況發展。然而，三月五日的武裝鬥爭行動卻因爲種種主客觀因素，沒有落實。」做爲指揮部聯絡員的葉紀東說，「午夜兩點整，我們聽到馬場町那邊傳來了槍響聲，但狀況還搞不清楚；起初，我們以爲，也許是郭琇琮領導的第二大隊，已經按照計畫，順利起義了。但是，到了三

領隊，在建中集結；第二大隊由郭琇琮指揮，在師範學院集結；第三大隊由李中志指揮，在台大集結。李中志在日據末期當過日本砲兵，同時也是這次武裝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則是郭琇琮。具體計畫是：三月五日凌晨兩點，先由第三大隊會合烏來的泰雅族同胞，攻打戒備較鬆的景尾軍火庫；然後，再與第二大隊會攻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各隊取得充分的武裝後，再分頭負責攻取市內所有的軍、警、憲武裝據點；拂曉時，各隊總會攻台灣行政院長官公署（行政院現址）。^②

「郭琇琮很能說服人，」林雪嬌說，「他常對我們說，要向群眾學習，分享他們的快樂與痛苦，和他們融合在一起。所以，那些學生都很相信他。」

「當時，我還是台大醫學院三年級學生，住在水源路的宿舍。」多年以後，當年被動員到郭琇琮領導的第二大隊的蘇友鵬，回憶那天晚上的行動過程，仍然歷歷在目。「事件發生之後，學校也停課了，學生們都不敢隨便外出。三月四日晚上，我在宿舍接到學生聯盟的通知後，就跟著學生聯盟的聯絡人，前去集合的地點；我被帶著換了幾個地方，最後來到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大）的操場。我看到，現場已經有大概四、五百名左右的學生，坐在草地上。天空下著微雨。有的同學蒙著面，有的沒有，其中一個蒙著面的人正在講話；從他的身材和講話的手勢，我認出是郭琇琮，於是就走近他，想要跟他打個招呼；他一看到我，就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向我看了一眼，表示招呼，然後用手指在嘴巴上比了一個手勢，要我別說話。我注意到，他的腰上佩著一把武士刀要短些的刀；旁邊有好幾個同學正在把竹子削尖，準備當作武器來用；另外有些人兩手拿著已經削尖的竹子，在一旁安靜地聽郭琇琮報告作戰計畫。這些人我都不認識。郭琇琮把我們

點多時，台大方面的楊建基騎著腳踏車，冒雨從景尾回來報告；我們才知道，因為烏來的原住民沒有下山，整個行動已經完全失敗了。我於是奉命去找郭琇琮，要他取消行動計畫。我冒著滂沱的大雨，在雷聲與槍聲夾雜的寒夜裡，立刻前往馬場町附近的堤防下，找到郭琇琮，並傳達組織的指令。可是，郭琇琮還是堅持到黎明前，確定沒有起義的可能性時才解散隊伍……。」^⑧

爲了發動台北學生的第二次武裝行動，地下黨台北市工委的領導核心又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一直到國民黨軍開始大屠殺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九日早上，他們還召集學生代表開會，準備繼續鬥爭。最後，終於還是因爲大批國民黨援軍開到，全台北市實施戒嚴，一片白色恐怖而無法行動。^⑨

苦悶與再起

三月九日凌晨，憲兵第廿一團一營從基隆開抵台北。早上六點，陳儀宣布台北戒嚴，隨後通令全省，「搜捕奸暴」；並特設「別動隊」，以林頂立爲隊長，執行任務。^⑩

三月十日，陳儀對全省廣播說：「宣布戒嚴是爲了保護人民」，全面展開綏靖工作。^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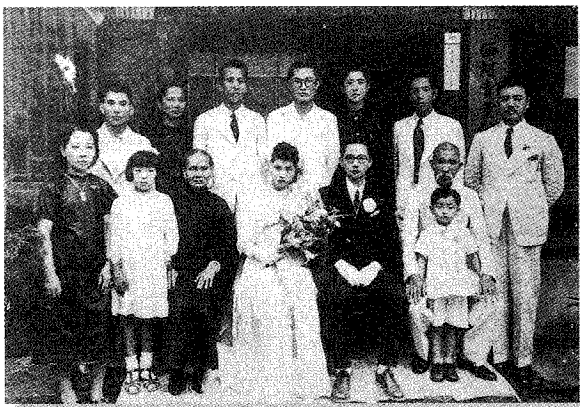
「因爲父親不讓我出門，三月二日以後，我有好幾天沒見到郭琇琮了。」林雪嬌說：「三月六日，我聽說，台北市內接連發生流氓搶劫、打人的事件，秩序紊亂；另外，『大批援軍已由上海出發』的傳說，也逐漸被證實了。我父親更加堅持不讓我出去。他說：『看這個情勢，搞不下去了！琇琮要是來了，要勸他快躲一躲鋒頭。處委會上當了！』可是，我還是一直沒有他的消息。」

後來，國軍二十一師登陸了。從九日起，台北到處都是槍聲……。廣播電台天天放送警備司令部的新命令：一切公務員必須立刻恢復上班，學生必須照常上課，工人必須照常上班等等。但是，我聽說，許多人一出門就再也沒回來過……。就在日子被這種透明而沉悶的恐怖籠罩的時候，郭琇琮終於派人來向我報平安說，他已從社子坐船，逃到三重埔去了……由於事變期間，郭琇琮一直以化名『林逸俊』活動，再加上他始終蒙面指揮；事變後，他不但倖免於被逮、被殺，而且身分似乎也沒有暴露。儘管如此，他還是在三重埔躲了一個多月。一直到接到父親病危的消息，蓄著鬍鬚的他才拿下眼鏡，一身工人裝扮，潛回士林老家。」

五月六日，郭坤木因爲肺病逝世。^⑫

郭琇琮和林雪嬌於是按照民間習俗在百日內結婚。

「郭琇琮在他父親病危的時候，特地帶我去見他老人家。他父親什麼也沒多說，只是囑託我：要好好照顧他們郭家。」林雪嬌回憶她和郭琇琮結婚的經過。「當時，我就想，郭琇琮大概是要和我結婚了。果然，出來後，他就向我求婚，並且對我說：『嫁給我的人，生活會很苦，以後要過喝稀飯配蘿蔔乾的苦日子！妳願意嗎？』回家後，我就跟我母親說了。我母親原來一直以爲他是張月鳳的男朋友，而且覺得他好好的醫生不幹，卻整天在外頭跑來跑



1947年5月，郭琇琮的父親病逝，按俗在百日內與林雪嬌結婚。
(林雪嬌/提供，藍海洲/翻拍)



革命夫妻郭琇琮與林雪嬌。(林雪嬌/提供, 藍博洲/翻拍)

去，對他印象不好，就沒有答應。可我那對政治也有興趣的爸爸卻認為這個女婿非常好，有內涵，又是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的醫生，跟我們家可以說是門當戶對。所以，他就極力促成我和郭琇琮的婚姻。」

然而，日常生活的紅喜也許可以沖淡白色的喪痛，卻不能解決思想的問題。

二二八事變後，郭琇琮的思想一度陷於無出路的苦悶。台灣往何處去？在近代的、殘暴的政治的冷牆之前，他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陷入了重大危機，台灣該往何處去呢？剛剛經歷父喪與新婚的郭琇琮，苦苦地思索著這個問題……

郭琇琮的苦悶並沒有持續太久就找到了出路。

一天下午，有一個罹患癲瘋病的中年人提了一盒蛋糕，來士林郭家找郭琇琮。

「我先生還沒回來，」林雪嬌以為對方是郭琇琮的病人就婉言辭退說，「東西請不要放在這裡。你帶回去吧。」

那人堅持說：「一點意思！放在這裡，沒關係。郭醫師知道我啦！」然後留了地址，就離開了。

到了傍晚，郭琇琮下班回家，看到家裡擺著一盒未拆封的蛋糕，就笑著問說：「怎麼會有蛋糕？為什麼不打開來吃呢？」

「這是你的一個病人送的，」林雪嬌解釋說，「我不肯收，他卻一直硬要放在家裡；他還留了地址，說是你認識他。」

做官的人收受紅包，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郭琇琮卻最痛恨這種事。因此，他看到字條，馬上提起那盒蛋糕，騎著腳踏車，前往新莊，去還那一盒蛋糕。

當時，已經五點多，差不多快六點了；可林雪嬌一直等到半夜一、兩點，郭琇琮都還沒有回來。她心裡開始著急了。她想，他究竟騎腳踏車去哪裡呢？她擔心，他會不會像許多人那樣，就這樣失蹤了……？

凌晨三、四點左右，郭琇琮終於騎著腳踏車回家了。

「我遇到一個好朋友……」郭琇琮激動地跟林雪嬌說。那天，他睡不著覺，一直跟她聊到天亮。後來，林雪嬌才知道，原來那個人並不是一般的癲瘋病人，而是日據時期的老台共廖瑞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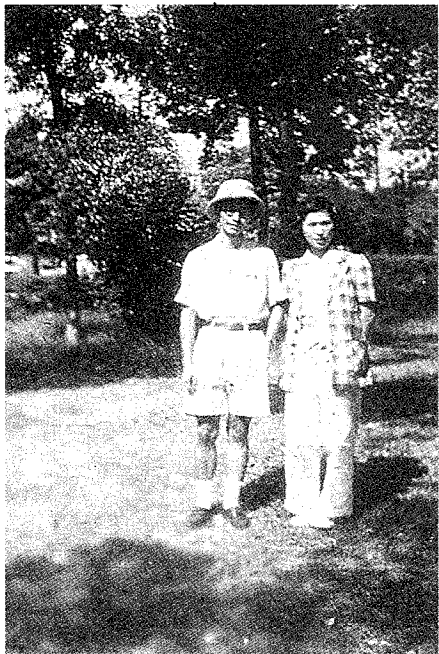
「我想，無論如何，那是郭琇琮一生命運中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多年以後，林雪嬌終於認識到決定郭琇琮未來命運的這次會面了。「雖然我不知道他們談話的細節，但我知道，因為這次會面，郭琇琮重新認識了苦難的中國的全貌，他那顆尋求國家認同的心也重新找著了新的歸宿。從此以後，他走出思想苦悶的陰影了……。」

廖瑞發當時的身分是中共地下黨「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因為罹患癲瘋病的關係，住在新莊南郊的樂生療養院。經過長期的觀察，他決定吸收郭琇琮入黨，於是刻意去找郭琇琮。那盒蛋糕，其實是一個誘餌，裡頭裝的根本不是蛋糕，而是一大疊的鈔票。廖瑞發的想法應該是以此作試探——看看郭琇琮是不是一個貪圖小利之人，如果是的話，也就放棄吸收他的想法；如果不

是的話，他自然會爲了退還「那盒蛋糕」而找上門來……。

這樣，一九四七年六月間，郭琇琮於是經由廖瑞發吸收，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組織。⑩

「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郭琇琮，一直沒有間斷地改造自己。」林雪嬌說，「對我，他也是這樣要求的。記得，剛嫁到郭家的時候，我母親擔心我不能適應大家庭的生活，於是讓一個丫鬢



婚後，林雪嬌便跟隨懷抱史懷哲之夢的郭琇琮，從事社會改造的工作。（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陪嫁。可他卻語帶諷刺地勸我，封建時代的小姐才要奴婢伺候，你有手有腳，帶個丫鬢過來要做什麼？我們應該讓她回家去嫁人。第二天，我就讓她回去了。……婚後的那段日子，他常常帶著我往台北市一些破落、陰暗的地區跑；爲了要作大稻埕九間仔街（今歸綏街）江山樓一帶的社會調查，我們幾乎天天跑這個古老的綠燈後街。也許怕人家說話吧！他要我換下小姐太太的裝扮，陪他去那種地方。我們就在那裡的小吃攤上與那些女孩聊天。長期下來，他完成了江山樓一帶的社會調查報告書，對那些淪落女孩的家庭背景、身心健康狀況，作了細密的分析報告。」

一九四七年秋季（十月間），「台北市工委會」正式成立；郭琇琮擔任「台北市工委會委員」。⑪

當時，「市工委書記」還是廖瑞發；除了郭琇琮之外，另兩位「委員」是吳克泰和孫古平。他們接著便在吳克泰住處召開「台北市工委」會議。會議確定分工後，著重討論了發展黨員的問題，也討論了黨的兩個外圍青年團體——「新民主同志會」和「愛國青年聯合會」，以及宣傳問題；同時也就黨在台北「二二八」中的工作，作了總結討論。⑫

「台北市工委」會議之後，包括李登輝在內的「新民主同志會」，改屬「台北市工委會」的支部；一直到同年十一月，這個地下黨的外圍青年團體，都由郭琇琮直接領導。⑬

一九四八年五月，郭琇琮應上級之召，前往香港，與蔡孝乾、張志忠及孫古平等島內重要幹部共十一人，參加六月召開的「台灣幹部會議」。六月底，郭琇琮返台，代理「台北市工委會書記」；不久正式擔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負責人許強）暨所屬各支部。⑭

「到香港走了一趟後，」林雪嬌回憶說：「郭琇琮不知爲什麼活得更有幹勁，更忙碌了。二二八的陰霾掃光了！我看見，他的眼眸重又燃起炯炯的火光……。」

改良歌仔戲

「據我所知，在香港開會期間，郭琇琮觀賞了一齣戲，就是《白毛女》；相當感動。」林雪嬌說，「因爲老蔡（蔡孝乾）年輕時候也是文藝青年嘛！他們覺得，戲劇可以教育民眾；尤其是在當時社會改造的革命形勢已經形成之際，只需要推動一下即可。回來以後，他們就想搞一個戲劇

運動。所以，他就忙著策畫演出一齣改良歌仔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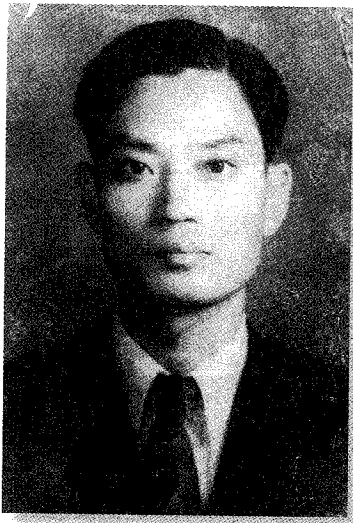
——《白蛇傳》……。」

林雪嬌所說的《白蛇傳》，是一九四九年夏天，由鄉土藝術團公演的一齣改良歌仔戲。

一九四九年三月，鄉土藝術團在當時的台北市長游彌堅鼓勵之下成立，設有音樂、戲劇、舞蹈、美術、文藝和總務等六部，由徐瓊二擔任團長。三月卅一日，台灣省教育廳發給鄉土藝術團第一六六號劇團登記證。^⑩

徐瓊二（一九二一—一九五〇），本名徐淵琛，出身台北萬華望族；日據下一九三二年三月，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學）第五屆畢業；歷任《台灣新民報》社會部記者，《興南新聞》基隆支局局長。台灣光復後，任《台灣新報》、《自由報》記者及《中外日報》專員；一九四七年春，任農林廳林產管理局八仙山林場副場長；一九四八年，先後創設建昌行及台北市第六倉庫合作社；一九四九年，補選為台北市第二屆臨時市參議員。^⑪另外，早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徐淵琛就已經是地下黨員了。一九四六年十月中旬，「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將吳克泰、孫萬枝及徐淵琛三位在《自由報》工作的同仁組成直屬的「新聞記者小組」，並由徐淵琛擔任小組長。^⑫

一九四九年七月，鄉土藝術團領有省教育廳發給歌劇《白蛇傳》上演登記證第八六號；並於七月廿二、廿三兩晚七時半，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首次公演。^⑬



鄉土藝術團團長徐淵琛（1912-1950）。
（徐守綱／提供）

七月廿二日，公演的第二天，為了觀看這齣前所未見的「改良歌仔戲」，不管是「濃妝豔抹的內地小姐」，或是「樸實整齊的本省同胞」，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從晚上六點多鐘起，已經從台北市不同的角落，「摩肩接踵」地走向那座「堂皇富麗」的中山堂。監察委員陳慶華、教育廳副廳長謝東閔、市長游彌堅、市參議員周延壽等政府官員，以及本省籍的文化界同人，也都不約而同地到場觀賞。

觀眾擠滿了整個中山堂。雖然場內沒有冷氣，也沒有電扇，空氣悶得很；可觀眾卻不以爲苦，仍然一邊猛搖扇子，一邊熱烈期待著演出的開始。

七點半，團長徐淵琛首先致開幕詞說：「鄉土藝術團在本年三月間成立，是業餘性質的，所以全團一百五十個男女團員，不是公教人員，便是醫生、學生、商人等；他們都是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或傍晚的一兩個鐘頭來排演。今天首次公演，得到這麼多人駕臨指導，我感到非常地光榮；同時，我也希望大家多多指導，讓本團能在學習中求進步。」

接著，市長游彌堅以該團顧問的身分致詞道：「本省過去雖有很多民謠，但在日人壓迫之下無法抬頭，至光復後，也因為有許多人認爲『歌仔戲』、『民謠』是不登大雅之堂、不足掛齒的東西，而不歡迎；而且對於演員也有錯誤的觀念，以爲演戲者是等於叫化子一樣的下流人而鄙視他



1949年7月27日，《公論報》「日月潭」第377期，關於鄉土藝術團公演的素描。

們，以致本省地方戲日趨落後。這次，鄉土藝術團為提倡鄉土藝術，而能夠在這裡首次公演所謂改良歌仔戲和民謠，我感到非常地高興。我希望各方都能夠多多給與鼓勵，以期提高本省的文化水準。」

七點四十五分，燈光暗了下來，隨著樂聲響起，節目終於在觀眾熱烈的期待中展開。首先上場的是該團舞蹈部李淑芬老師領銜的九人舞蹈〈台灣姑娘〉。接著由該團音樂部歌謠隊全體隊員，分成男音和女音二部，合唱〈六月田水〉、〈丟丟銅仔〉、〈水社進行曲〉和〈粟祭之歌〉等莊嚴、雄壯而又帶有濃厚鄉土色彩的民歌。第三個節目是穿著護士服裝演出的舞蹈〈白衣天使〉。接著又是民歌〈賣豆乳〉和〈車鼓調〉。然後是一個阿美族青年獨舞豪爽的〈山地舞〉。再接著，又是場面「富麗堂皇」的舞蹈〈仙女散花〉、〈阿美族舞曲〉，以及由李淑芬創作，表現插秧、除草、割稻和打穀等農事動作的〈風土舞〉。

節目前半段民歌和舞蹈部分的表演就這樣結束了。中場休息五分鐘之後，眾所期待的壓軸好戲《白蛇傳》登場。

這齣改良的《白蛇傳》的本事大略是說：

某個清明，杭州保和堂藥舖許仙到西湖遊春，邂逅了白素貞及其婢女小青；許、白兩人一見鍾情，終成眷屬。白素貞的父親是位名醫，早逝，留給她一本載有稀世祕方的藥書；時逢吐瀉瘟疫流行，白素貞據此祕方，救人無數，終而影響到吃十方的佛門香火衰落。鎮江金山寺和尚法海於是哄騙許仙，誣白素貞和小青為蛇精，最後並誘引白素貞到金山寺，將她燒死，奪取藥書……

在這裡，白素貞和小青不再是傳統舊戲裡的蛇精，而是實實在在的人物；法海也不再是力能除妖的方丈，而是一個謀害好人、奪取藥書的壞蛋。^⑩

一般認為，從來民間所流傳及舊戲裡所演出的《白蛇傳》，大都是荒唐無稽、神神怪怪的迷信的故事，這回鄉土藝術團演出的《白蛇傳》，編導卻以「新的科學觀點」解釋民間流傳口碑，把它改為「打破迷信，宣揚醫學科學性」的故事。因為這樣，「鄉土藝術團努力的改革與勇敢的嘗試」，不但使得「過去被大家輕視的歌仔戲」，「獲得了一致的重視與好評」，而且也成為「今後改編類似這個故事的一個好指針」。^⑪

從「打破迷信，宣揚醫學科學性」這個觀點看來，它顯然與郭琇琮從事防疫工作時的指導思想一致；由此可見，在這齣改良歌仔戲——《白蛇傳》的演出中，郭琇琮的確起到一定重要的作用。

據《台灣電影戲劇史》所載，《白蛇傳》的編導署名「周樹文」。^⑫然而，回顧日據以來的台灣戲劇運動史，「周樹文」此人卻是一個前所未見、後亦絕響的名字。

那麼，「周樹文」的真實身分究竟為何？

「郭琇琮是這齣新戲的編導。」曾經參加《白蛇傳》演出的林雪嬌說，「那時候，我看他經常在修改《白蛇傳》的腳本。為了發展工作，他在生活上的語言、服裝，在不斷學習中幾乎已經能與勞動者打成一片了。他喜歡唱歌，尤其喜歡盧雲生填詞、呂泉生譜曲的〈搖籃仔歌〉；我們的孩子生下來以後，他經常一邊搖孩子睡，一邊唱〈搖籃仔歌〉給小嬰兒聽。他也喜歡〈雨夜花〉、〈河邊春夢〉等等通俗的台灣流行歌。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卻盡唱這些通俗

的歌？這時，他卻嚴肅地糾正我說，這些歌，一點也不低俗；這都是勞動民眾愛唱的歌呀！我們既然要跟民眾一道工作，當然就要喜愛他們唱的歌啊！……」

這樣看來，在這樣的世界觀指導下的郭琇琮，會去注意到向來被本省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是「一般無知民眾的娛樂」、「最通俗的」，但也是「風行全省」、「擁有廣大觀眾」的歌仔戲，也就不是什麼讓人意外之事了。

「郭琇琮認為《白蛇傳》是個老少咸宜的故事，裡頭的人物也都是家喻戶曉的。」林雪嬌解釋郭琇琮改編《白蛇傳》的動機說，「他於是想通過這齣改良歌仔戲的演出來啟蒙一般民眾的階級意識。比如說，金山寺的和尚法海是統治階級的象徵；白素貞和小青則是被壓迫階級，婦女也是這種階級；他認為，大家如果團結的話，保守的統治勢力是可以打倒的。……」

除了故事內容的改良之外，就演出形式來講，這齣脫胎於歌仔戲而加以改良的《白蛇傳》，既不同於話劇，也不似西洋歌劇。跟歌仔戲比起來，它最主要的不同是：分幕、分場和用中西兩種樂器合奏。另外還有：對白採談話式；不規定台步；除歌仔戲原用的七字仔調、南管調、九絃仔調、哭調之外，同時採用白字仔調、車鼓調和其他本省流行歌曲；以及邊唱邊配



初為人母的林雪嬌（右）也參加了《白蛇傳》的演出。（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白）

合舞蹈動作等等。至於演出的重要演員則包括：張玉雲飾白素貞、施惠美飾小青、林春波飾許仙、陳漢臣飾法海及陳子民飾福伯等。④

「除了通過演戲啟蒙一般民眾的階級意識之外，郭琇琮還想藉此團結他所發展的同志。」林雪嬌說，「所以，他就把後來成為他妹婿的台大學生姜文鑑帶領的台大學生，以及他在郵電工人補習學校發展的工人，作為演出的基本人員。另外，為了改良傳統歌仔戲的演出形式，他希望能用中西合璧的音樂，搭配舞蹈的方式，讓老少觀眾都能接受；所以就請江文也指導音樂。那時候，江文也並不在台灣，不過，我們還是能有討論的機會。至於舞蹈，當時就由我去找一位舞蹈老師李淑芬來教。記得，她還教我們以客家的採茶山歌伴奏，跳一種江西農民的民俗舞步。……」

總的來說，鄉土藝術團的首次公演獲得社會各界的普遍好評。任教於台大中文系的本省籍詩人張冬芳說，它「向沉默已久的本省戲劇界的水面上投了一塊石頭」⑤。《公論報》的一名外省籍記者則認為，「在整個國家遍地烽火的今日，台灣確是比較安定的一塊土地，此時此地，我們能有一個機會來介紹鄉土藝術，將它發揚光大，喚起地方人士對於地方『歌』、『舞』、『劇』的重視，並進一步作個科學的改良，也並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⑥

一個顯然也是外省籍的觀眾也肯定地說，鄉土藝術團

觀眾爭看改良歌仔戲
鄉土藝術團首次大公演
民歌舞蹈及歌劇昨順序演出
白蛇傳矯正了舊劇迷信情節
陳慶華謝東園游瀾堅周廷濤等到場參觀

【本報訊】本省鄉土藝術團，於七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晚八時，在國父紀念館舉行首次大公演。當晚觀眾踴躍，場內座無虛席，氣氛熱烈。演出節目豐富多采，包括：民歌、舞蹈、歌劇、白蛇傳等。鄉土藝術團團長郭琇琮表示，此次大公演的目的，在於向一般民眾介紹鄉土藝術，並通過改良歌仔戲，矯正舊劇中的迷信情節，使鄉土藝術更趨科學化、現代化。郭團長在演出後表示，鄉土藝術團將繼續努力，為推廣鄉土藝術、豐富民眾文化生活而奮鬥。

1949年7月23日，《公論報》關於鄉土藝術團演出的報導。

「搜出鄉土生活中的藝術成分，將它純化美化起來，再來還給鄉土老百姓，這是很有意義的，同時也是困難的。這要用非常敏慧的藝術感覺，像在農夫未開墾的處女地探搜珍貴底藝術寶藏，再用深刻的藝術力量把它純化起來，最後推廣於鄉土大眾，使之親切地領受，喚起他們的創造力量。」因此，他認為，鄉土藝術團的「這次公演，給我們許多值得研究的藝術問題，暗示台灣藝術的發展方向，既可說是一個寶貴的實驗，還可以期待它喚起台灣人底藝術的自覺。台灣鄉土藝術在整個中國藝術部門中是會有其前途的。」^⑩

演出當時，林雪嬌還背著初生的嬰兒，在後台幫忙整理戲服。

「《白蛇傳》這齣戲搞得蠻轟轟烈烈的，很成功！」林雪嬌難掩興奮地追憶當時的盛況說：「那時候，國民黨政府大概還不知道，這其實是地下黨在幕後搞的文化工作呢！」

轉入地下

一九四八年六月的「香港會議」以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很快就「遍及全省各階層各鄉鎮」；與此同時，蔡孝乾也計畫到一九四九年底前，要發展黨員兩千人，群眾五萬人。^⑪在這樣的工作指標下，郭琇琮領導的「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在一九四九年冬季，已在台北市郊建立十一個支部、一個小組，並發展了個別黨員五十餘人。^⑫

《安全局機密文件》載稱，郭琇琮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加入組織後，分別於同年七月、一九四八年二月和七月，以及一九四九年八月，親自吸收京都帝大醫學部出身的吳思漢、台大醫院第三內

科主任許強、其妻林雪嬌和台大醫院皮膚科醫師胡寶珍等人，加入「匪黨」。^⑬

胡寶珍是台南人，日據末期，就讀台大預科時，因為參與士林協志會的音樂活動，認識了郭琇琮。

「大概是一九四九年年底，或是一九五〇年年初吧！」胡寶珍就官方說法追憶事實的經過說。「有一天，郭琇琮來找我，也沒說什麼別的；因為他平常就會來找我，聊聊天。但是，突然間，他不見了，換吳思漢來；我一見這個人，就認出他是我在南二中時非常尊敬的學長吳調和。他來接觸我一、兩次而已，也沒有說些什麼，就只是話家常這樣。我和吳思漢的關係主要算是郭琇琮牽的線，因為我和他比較熟嘛！……其實也沒有人黨，就只是談談話。」^⑭

「婚後，我一直跟著郭琇琮工作；只有在生產後的幾個月沒有。」針對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林雪嬌這樣說。「我主要是參加婦女方面的工作，有空時才在家帶孩子。老蔡等人跟郭琇琮接觸，這些事，我都知道。像是老蔡說要到琉球買錫砂，做生意，就是通過郭琇琮，向我父親借了五百萬（舊台幣）；後來，這些錢都拿去做活動經費了。所以說，地下黨的組織也算是承認我吧。」

林雪嬌第三高女的校友陳勤女士，當時是福星國小的老師；她的回憶，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林雪嬌當時的活動情形。

「那時候，舞蹈家李淑芬常在福星國小舉辦教跳〈農村曲〉等活動。」陳勤女士說，「林雪嬌也向福星國小借場地，排練鄉土藝術團的公演活動；她到學校商借鋼琴，也獲得校長允諾，並要負責保管鋼琴鑰匙的我把鑰匙借給她。當她知道，除了教書以外，我也參加電台的兒童節目，常帶合唱團到電台，演唱兒童歌曲；於是向我介紹鄉土藝術團的企畫工作、舞蹈節目及歌唱隊，並

要我協助她們的演出。我因教學繁忙而推辭，她就不厭其煩地找機會，說服我加入推展婦女的社會工作。鄉土藝術團公演結束後，林雪嬌到我家敘舊。當她看到我書架上哲學系列的書刊時，就提議要與我一起研究討論，並說她先生熱衷社會改革，有關社會主義的問題，可由他加以指導。我一方面沒興趣，另一方面也沒時間，也就婉謝了。過了幾個月，林雪嬌忽然來說，也許有機會出外求學；要取我的經歷資料，作參考。此後，就斷了音訊。^⑩

事實上，就在那年十月左右，林雪嬌已經跟隨郭琇琮轉入地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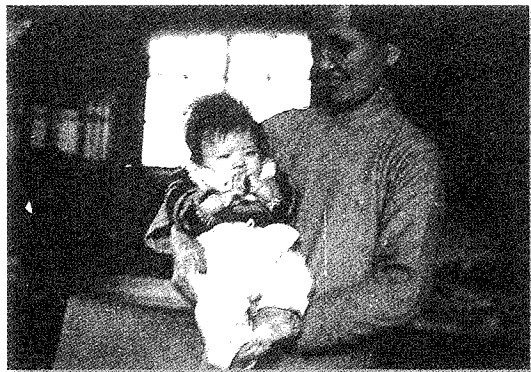
「《白蛇傳》演出後不久，九月初，我們就得知《光明報》案發生的消息；之後，形勢就愈來愈緊張了。我們於是從士林郭家搬到台北市長安東路的娘家。」林雪嬌說，「十月初，有一個晚上，入睡前，郭琇琮忽然對我說：『你要有心理準備，我們將來可能要犧牲的！』初為人母，而又對政治的殘虐渾然無知的我，懷抱著初生的嬰兒，自然不願意聽到這種話題。『即使日本統治時代，也沒有聽過誰是因為思想被殺的！』我竟這樣說。這時候，郭琇琮就到書房拿了一本賽珍珠的小說《愛國者》^⑪，然後翻開裡面一段給我看；那是描寫一百多個愛國青年在揚子江畔被槍決的文字。我這才知道，在無條理的歷史和荒蕪的政治下，人是可能隨時被歷史的胎動壓殺的……果然，沒多久，我們就因為林秋興被捕而開始逃亡了。」

林秋興是桃園人。^⑫台灣光復後，擔任某報記者；^⑬曾經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發刊的《新新》雜誌第二卷第一期，發表過中文小說〈亂愛〉。二二八期間，參與桃園地區的鬥爭，後來進入山區，擔任民眾組織「大溪武裝部隊政委」；事件後，一度流亡上海；返台後，加入地下黨組織；並成為鄉土藝術團核心之一，參與《白蛇傳》的演出工作。^⑭另外，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

日，台北市電影戲劇促進會在第一酒家舉行成立大會，林秋興被選為理事。^⑮

《安全局機密文件》載稱：一九四九年十月間，郭琇琮將台灣省地圖及「台北市工委會」工作報告書，交林秋興帶往香港；林秋興啟程前被查覺，於基隆被捕。保密局隨即循供，嚴密偵查郭琇琮等。^⑯

「十月中旬，有天晚上，三更半夜，警察和特務來家裡抓我們，外面也有好多憲兵包圍著。」林雪嬌歷歷在目地追憶第一次被圍捕當時的情景。「我立刻把孩子背起來，跟隨郭琇琮，躲到母親的房間。我們娘家是日式房子，差不多五百多坪大，母親的房間位於中間，離大廳有段距離。我母親隨手拿了一些錢和金戒指給我，要我跟郭琇琮馬上逃走。『不行啊！』我放心不下孩子，不想走。『我的囡仔這麼細漢，還未斷奶哩！我怎麼可以走？』我母親堅決地說：『你丈夫既然敢做，妳敢查某人的，就要勇敢承擔！人家謝雪紅都敢做，你怎麼不敢做？囡仔你給我放著，我會給妳餵，你緊走！不然，你若被抓去，琇琮也會被抓到；到時，看妳怎麼辦？』她一邊講，一邊就把正在熟睡中的嬰孩從我手上抱過去，把伊背起來，同時把錢和金戒指硬塞在我的口袋裡。這時候，一直站在一旁沒說話的父親就小聲地跟我弟弟說：『你出去應付一下，說他們回去士林了，不在家；如果他們說，沒回士林，



1949年10月中旬，郭琇琮在林雪嬌娘家被圍捕；林雪嬌的母親要她放下嬰兒，跟郭琇琮一起逃亡。（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就說去台中了……。」然後，他又對我們夫妻說：『趕緊！跟我來。』我和郭琇琮於是跟在父親後頭，穿越一排倉庫改建的房間，走進家裡的後花園，然後從花園裡的祕密通道，逃了出去。連夜離開台北。」

《安全局機密文件》又載：郭琇琮恐受林秋興被捕事件的波及，遂轉移至宜蘭、羅東一帶，建立「蘭陽地區工委會」。¹⁷

「我們逃亡的第一站就是宜蘭。」林雪嬌證實了官方所掌握的情報。「郭琇琮真是個有工作狂的人啊！我看他哪裡是在避難？他是走到哪，就與當地組織聯繫，繼續發展工作。在宜蘭，我們一直都在鄉下，搞農村工作。因為孩子還沒斷奶，我的胸部一直漲奶，經常流著奶水；漲得太厲害了，郭琇琮就會設法請人買些成藥，給我治療。或許是因為逃亡太久了吧！每次漲奶漲得難過的時候，我都會想念我的孩子，暗自流淚。後來，我也耐不住對於兒子的思念了，就跟郭琇琮要求說，我很想見小孩。不過，郭琇琮說，不行。我不死心，第二天，又再要求：『讓我再看一次兒子。』我跟他說：『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不會再有第二次了。』郭琇琮冷靜地勸我說：『妳要知道，我們是在革命呢！隨時隨地都會有生命危險的。你不能這樣任性啊！』我說：『我不管啦！我們走的時候，孩子都還沒有斷奶，我只想看看他，看他在吃什麼？喝什麼？……』我一直吵一直吵，吵得很厲害。最後，郭琇琮只好答應我說：『好吧！既然妳那麼想念小孩，我就設法安排你們母子見面。但是，就這一次，絕對不能有第二次。否則，我們不但沒辦法工作，還會拖累組織。』他於是就去聯絡、安排，讓我和我母親及兒子，見了一面。」

關於林雪嬌母子相會的情節，她那第三高女校友陳勤女士的回憶，恰恰提供了從另一個側面了解事情全貌的材料。

「三十八（一九四九）年暑假，」陳勤女士說：「我被派到市府主辦的草山林間學校教學。八月底回到家，接到林雪嬌寄來的包裹，是她小孩子的衣物，要我幫她轉交給她母親。我見過她母親，代轉了衣物……，也就忘了這件事。」¹⁸

除了時間的出入之外，陳勤女士的口述證言，基本上說明：基於安全的考慮，當時，郭琇琮是如何機巧地通過不了解內情的第三者，而與林雪嬌的母親聯絡的。

從常識判斷，郭琇琮當時答應讓林雪嬌母子相見的作法，的確是太過「溫情主義」了。當然，這種作法所含藏的危險性，郭琇琮顯然也不是沒有充分估計到；因此，就在林雪嬌母子相會後，他便離開了宜蘭。

「後來，我們又轉移到三星鄉。」林雪嬌說，「因為當地原住民很多，我們主要在做原住民工作；郭琇琮還替他們看病呢！不過，每當他們問郭琇琮是不是醫生時，他都回答不是，只說是學過一些醫術而已。後來，我們又再轉移到羅東；在那裡，郭琇琮主要搞工人的組織工作。據我了解，我們當時在南方澳有個游擊基地。不過，武器並不是很多；只是一些步槍和普通的手槍而已。有一次，郭琇琮要我幫忙把步槍上的刺刀片裝在甘蔗裡頭，送出去。可我的皮膚白白的啊！怎麼看也不像鄉下婦人；郭琇琮於是就要我特別化妝，然後頭戴斗笠，再將頭上的包巾遮到嘴巴那裡，打扮成鄉下女人的模樣……。據我了解，嘉義阿里山基地的軍械，也都是從南方澳基地運過去的。後來，我們也通過組織的安排，轉移到嘉義。」

逮捕

安全局的機密文件記載：「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委員，京都帝大醫學部出身，一九四七年七月，由郭琇琮親自吸收收入黨的吳思漢，因工作暴露，於一九四九年底，匿居阿里山吳鳳鄉樂野村「蕃社」，並將「潛伏黨員」，組為「逃亡幹部支部」，繼續進行活動。一九五〇年四月，郭琇琮也轉至嘉義，以雜貨商為掩護，潛伏活動。^⑩

郭琇琮南下嘉義，顯然與發展「阿里山基地」的工作有直接的關聯。

「郭琇琮實際上也是有參與原住民工作的。」林雪嬌說，「我們到了嘉義以後，就通過一個姓徐的（可能是假名）台大法律系學生，介紹房子給我們住；那名學生的一個兄弟在二二八時被槍斃，他自己後來也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殺。後來，郭琇琮也打扮成商人模樣，去了原住民的部落；每次，他都要我待在家裡……。」

與此同時，保密局特務也針對郭琇琮領導的「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所屬組織成員，展開逮捕行動。他們判定：台北市城中區公所戶籍員張秀伯，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入黨，屬於吳思漢直接領導的「和尚洲支部」黨員；「匪幹」經常利用他職務上的便利，偽造國民身分證與戶口謄本，掩護「匪徒」身分。一九五〇年一月，於是在台北市城中區公所將他逮捕；然後「據供，窮追線索，擴大偵查」；並於七月止，陸續被捕了郭琇琮、吳思漢等，一共五十一人。^⑪

一九五〇年一月廿九日，蔡孝乾也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號住處，第一次被捕。後來在

陪伴保密局情治人員追尋其他「匪徒」時，乘隙脫逃，不久又被逮獲。^⑫

對此，調查局編印，供「中上級保防幹部參考研究之用」的「機密」教材的寫法也大致如此：「蔡孝乾獲案以後，曾根據他所供的線索，將台共的高級幹部大部分予以肅清，並將城市方面的組織次第予以破獲，在這迅速破案的過程中，曾帶同蔡某分別追尋各處的線索，以期加速破獲的高潮，不幸於中途曾被其一度狡猾兔脫」；後來，情治人員逮捕了簡吉，才「輾轉發現蔡的逃匿下落，卒在嘉義竹崎，將蔡重行捕獲。」^⑬

不過，前保密局特務、白色恐怖「執行者」谷正文的口述回憶錄，卻與上述說法略有出入。據谷正文說，化名老鄭的蔡孝乾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深夜，在泉州街廿六號住處，被長期埋伏的特務張清杉（淡水人）逮捕的；後來，蔡孝乾在帶領另外四名特務一同前往博愛路電信總局指認施姓聯絡人時，「脫逃失風」；當天晚上，他又藉著帶領那些特務前往武昌街施姓聯絡人的住處抓人時，乘隙脫逃；並且在暗夜中消失蹤影。谷正文說：「直到蔡孝乾脫逃，保密局裡尚無人知道他就是台共領導人。」一直到二月廿七日天未亮的時候，張清杉才又在嘉義糞箕湖的一條泥路上巧遇老鄭；老鄭於是「自動把手伸出，讓張清杉將自己銬鎖起來。」第二天，保密局長毛人鳳打電話告訴谷正文，「老鄭真正的名字叫做蔡孝乾」，並催促他火速北上。^⑭

關於蔡孝乾被捕以後又「脫逃」的過程，在許多當年的政治受難者之間，一直流傳著「捉放曹」的說法。但是，如果國民黨情治特務的兩種說法都可信的話，那麼，關於蔡孝乾「捉放曹」的傳言就只是一種不能確定的風聲而已。但是，我們，或者說蔡孝乾本人，要如何解釋自他被捕以後的大量逮捕呢？

事情的真相如何，在蔡孝乾已死而且沒有留下歷史紀錄的情況下，我們實在很難作出定論。然而，就算蔡孝乾到今天還活在人世的話，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一個「投降」的地下黨的領導人會對當時的情形說些什麼呢？事實是，無論他怎麼說都沒有人會相信他所說的話了吧！

問題是，當年的政治受難者究竟是怎麼來理解這個「公案」的；它和郭琇琮的被捕，又有怎樣的關聯呢？

「蔡孝乾被捕後，組織的人也被牽連了。……」與郭琇琮同案被捕處刑十年的胡鑫麟醫師說。「聽說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後，跑出來，四處風聲說他曾被捕，郭琇琮問他，你不是被捕了嗎？他連聲否認，說，沒有，沒有。蔡孝乾第二次被捕時，郭琇琮也一併被捕了。」

郭琇琮轉入地下前的社會身分是台大醫學院法醫學助教，所以，保密局特務先去法醫學教室抓他，人沒捉到，於是再到台大醫院，向魏火曜院長追問他的下落。不久以後，郭琇琮還是被捕了。^⑩

「我們是五月二號，在嘉義被逮捕的。」林雪嬌說：「從蘭陽到嘉義的路上，我總是感覺到列車上有很多特務；可是郭琇琮都說我神經質。那天早上，我買菜回來，又跟郭琇琮說，好像有特務在跟蹤我！可他還是認為我太神經質了。結果，那天深夜，熄燈之後，特務就來抓我們了。因為那個房子沒有退路，我們也只能束手就擒了。」

蔡大哥，不要再說了……

郭琇琮夫婦被捕以後，隨即被扣上手銬，押上二輛貨車，連夜被移送到台北市的保密局。

「那天晚上，我們從嘉義被送到台北西門町今遠東百貨後面的一棟看守所；疲憊不堪。」林雪嬌說：「進去以後，我和郭琇琮就被分開了。我那間押房大概只有六個榻榻米大小，可是已經關了二、三十個女生。起初，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聽先來的難友說了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那就是日據時代憲兵隊的拘留所，光復後改為保密局南所。我靜靜地坐在押房的角落想著，日據時代，郭琇琮在這裡被關過，那麼，他算是舊地重遊了。想到這，我不禁啞然苦笑！與此同時，心裡便被一股莫名的苦悶籠罩著；因為這樣，也就無法入睡……。第二天，放封的時候，我又看到郭琇琮了。我注意到，他的兩腳已經被銬上一副沉重的腳鐐。我們在那裡就連放封時也不能見面。我們只能利用放封的機會，用日文唱歌的方式來聯絡。後來，我才知道，第一次偵訊，他被打得相當嚴重，是被抬回押房的！……另外，只要當天有人被送進來的話，樓下的男同學就會以腳步前進後退的方式——例如：向前走一步是『あ』，向後一步是『い』，然後兩腳擦擦地拼音。——告訴我們這些樓上的女同學，今天有人來了！……」

保密局的逮捕行動持續擴大著。

五月十三日，許強、胡寶珍、蘇友鵬和胡鑫麟等四位台大醫院的醫師，也在醫院院長室被捕。他們然後跟郭琇琮夫婦一樣，被押送到保密局南所。

「我和許強、胡鑫麟、胡寶珍從台大醫院被押送到保密局南所以後，首先是填寫各自的基本資料；」蘇友鵬醫師回憶說，「然後把衣服、皮帶、鞋子脫下來，交給衛兵檢查；檢查完後，我們四人就被分開羈押。我被推進一間擁擠的牢房，聽到背後響起一聲鐵門用力關上的聲音，隨即陷入一種陌生的驚慌；我緊貼著牢門入口處潮濕的牆壁，用眼睛默默數了數，裡頭一共關了十三個

人。忽然，我看見一個人，跛著腳，從狹窄的牢房裡頭，扶著牆，一拐一拐地走出來。我看到，那人的兩條腿已經被打得浮腫瘀血了。就在那人更靠近來時，我看到他那從眼鏡後面逼射出來的一雙炯炯的眼睛。啊！郭大哥。我不由地叫了出來。原來那人不是別人，就是郭琇琮。郭琇琮沒有說什麼，只是以一種堅強而溫暖的眼神安撫我，然後又一拐一拐地走出押房，去面對再一次嚴酷的刑訊。……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剛進去的時候，我睡在押房最裡頭放馬桶的旁邊。台灣煤炭、金礦業鉅子、原振山事業社老闆劉明先生和郭琇琮，依次睡在我的隔壁。因為擁擠，我們只能像沙丁魚罐頭那樣，一個擠一個，才能勉強躺下睡覺。」

五月卅一日晚上，「台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對本省同胞發表「懺悔」廣播，並號召其他在逃「黨員」，立刻出來「自首」。^⑤

「當革命者變成『叛徒』，人們就不再以革命者視之了。」蘇友鵬醫師感慨萬千地繼續說道。「那時候，老蔡就關在我們的斜對面押房裡。當他被提出押房受審，走過各個牢房前面時，幾乎每間牢房的人都對他唾罵。彼時彼地，郭大哥卻似乎能深一層地看待一個『轉向者』的複雜處境吧！他一直不會流露出對老蔡的一絲怨恨。郭大哥不但不咒罵老蔡，有一次還跟我說，他這一生，在做人、處事上，最欽佩的人，便是老蔡了。然而，郭大哥眼看著老蔡每次出去受審，回來沒幾天，就會送進來一批同志，也開始有點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就在老蔡再度被提出外受審，經過我們牢房時，郭大哥才走向前說：蔡大哥，不要再說了，不要再擴大下去了……我聽說，變節後的老蔡卻以情治機構極高的職位退休、老死。一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理解，郭大哥對人入骨之入骨的老蔡所抱持的諒解與尊敬……。後來，國府當局也想說服郭大哥向全省人民廣播，

以換取個人自新的機會；他們以高官厚祿利誘他，並且舉陳獨秀為例說：像你這樣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終有一天也會被批鬥的。然而，郭大哥卻始終為那純粹的信仰堅持不渝。這是怎樣的一種恢弘的人格啊！」

牽連

除了蘇友鵬等四名台大醫院的醫師之外，同一天，林雪嬌第三高女同學陳勤女士，也在任教的福星國小校長室被捕。她被送上吉普車，然後被兩名特務夾在中間，將她的頭用頂大草帽蓋著，押解到保密局南所。

「我下車後被推進玄關，裡頭一片漆黑，……」陳勤說：「我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地經過三道鐵門，隱約看到兩邊一堆鞋子。來到一個牢房門口，我被推了進去，後面的門一關，我又進到另一片幽暗之中。剛進來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待驚魂甫定，才看清楚，六尺寬十尺長的牢房中已有近二十個人。……」

幾天後，陳勤見到了老同學林雪嬌。

「第二天放封時，」陳勤繼續敘述她和林雪嬌見面的情景。「林雪嬌在另一棟樓上喊我，很驚訝地問我：『妳怎麼也來了？』正要細問，管理員的哨子又響了起來。……第四天放封時，林雪嬌說：『我又沒講妳，你沒有事。』並問我缺什麼日用品？我告訴她，我沒毛巾與換洗衣物。過了十天左右，她送給我一條毛巾、一件男人的內褲、一條牙膏與牙刷。我常高燒不退，向她要維

他命。林建議我在提審時，跟法官提出我的需求，又叮嚀絕對不能提到她先生的事，我深覺奇怪，事實上我從來沒見過她先生。」

一直到月底，陳勤女士才第一次被提審；問話重點直指她與林雪嬌的關係。

「法官問我為何而來，我說我也不知道。……」陳勤女士說，「法官並問我認不認得林雪嬌，與她有何關係？我說她是我校友，我在學校教書，她來向我借用鋼琴鑰匙，並要我幫忙教合唱團，我沒時間，沒有答應。法官一面問話一邊寫，寫好後要我捺指模。因白白書根本不是我寫的，我拒捺印，但他說不蓋也得蓋。……」

六月一日，陳勤女士移監原高砂鐵工廠的保密局北所，並且再次見到林雪嬌。

「六月初，我第二次被提訊時，與林雪嬌擦肩而過，林馬上將頭轉過去，可能是剛提訊結束。」陳勤女士透露了一段撲朔迷離的案情。「審問時，兩個衛兵押著我，見到審問官時，他拍桌大力一捶，說我沒有坦白，問我知不知道鄉土藝術團是什麼性質？我說我從沒有參加過，所以不知該團內容，我只不過是照校長交代，將禮堂的鋼琴鑰匙借給林負責人使用。法官說上次白白書要作廢，不由分說又拿一份已經寫好的白白書說：『林雪嬌交代得很清楚。』我要求與她對質，法官拒絕，並說林已經交代就夠了，無須再抗辯。當時我已知懷有身孕，恐不堪受刑，故默不作答。書記官竟強拉我的手簽名、捺指印。」^⑤

六月十三日，台北國府由總統蔣介石頒布實施〈勘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其中，第十二條：「匪諜之財產得依懲治叛亂條例沒收之。」第十四條規定：「沒收匪諜之財產，得提百分之三十作告密檢舉人之獎金，百分之三十五作承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其餘解繳國庫。無

財產沒收之匪諜案件，得由該管治安機關報請行政院酌給獎金，或其他方法獎勵之。」^⑥

在高額的獎金鼓勵下，逮捕的對象與範圍於是不斷擴大。

「不久，連我父親也被抓到保密局來了。」林雪嬌說，「其實，我父親並不清楚郭琇琮到底在外面搞些什麼政治活動？但是，他也和大多數人一樣對政府不滿，所以支持他的女婿搞反對運動。我們家，從我祖父那一代開始從事木材外銷和運輸方面的生意，做得蠻不錯的！我父親受過日本的高等教育，有很多同學在日本做大臣，所以銷往日本的木材和農產品，都銷得非常好。他對政治感興趣，第一屆台北市市長選舉，他也出來跟吳三連、高玉樹競選；因為他是台北人，聲勢當然遙遙領先。當時我和郭琇琮正在『跑路』。在此之前，福州因為市長的女婿是共產黨而和平解放。蔣介石可能因此害怕台北市以後會出現像福州一樣的情況吧！於是就在公布當選結果的前兩天，把我父親拉下來，改而指派不是台北人的吳三連。當時，國民黨提出兩個職位要我父親選，一個是合作金庫的庫長，一個是農林公司的董事長；我父親選擇了比較單純的農林公司。但是，他還是受我們連累而被捕。後來，裡頭有些特務跟父親說，只要打通三關就可以放他出來；每一關要二十條金條。父親相信了他們，就送了他們六十條金條。這樣，他在保密局關了三個月後，我們家人才把他保出去。」

沾血的金條

在保密局的偵訊告一段落後，郭琇琮及其同案便被移往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等待結案。

偵破時間：二十九年一月。
偵破地點：台灣省台北市。

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

涉案人犯處理情形

姓名	別稱	籍貫	出身	職業	參加匪黨時間	匪黨職務	處理情形
郭琇琮	男	33	台北	日本帝國大學	台大醫學院助教	黨務	意圖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而實行處死刑
吳恩漢	男	27	台南	日本帝國大學	無	黨務	同上
謝清輝	男	31	台北	日本帝國大學	台大熱帶醫學系主任	黨務	同上
鄧水生	男	31	國校	畢業	台大熱帶醫學系主任	黨務	同上
王耀勳	男	29	業	日本明治大學	台北市第六倉庫	黨務	同上
朱錫麟	男	30	業	日本帝國大學	自設朱內外科醫院	黨務	同上
許強	男	38	業	日本帝國大學	台大醫學院助教	黨務	同上
高泰丁	男	51	業	國校	茶廠、小工	黨務	同上
張國雄	男	30	台中	日本帝國大學	無	黨務	同上
戚志彬	男	31	台北	日本東京政法大学	無	黨務	同上
楊松齡	男	28	台中	台北一中畢業	開設文明堂商店	黨務	同上
劉永福	男	34	新竹	國校	台旅酒吧招待	黨務	同上
蘇炳	男	28	台北	國校	台北火車站食堂	黨務	同上
李東益	男	30	業	國校	小販	黨務	同上
謝桂林	男	31	高雄	日本千葉醫科大學	自設醫院	黨務	同上
陳宇	男	32	台北	國校	自設商店	黨務	同上
呂聰明	男	26	業	國校	華南銀行存款課	黨務	同上
謝新傑	男	31	新竹	新竹中學畢業	華南銀行存款課	黨務	同上
林俊周	男	23	台北	台大法學院畢業	辦事員會計室	黨務	同上
張秀伯	男	23	台北	台北工業技術學校	辦事員會計室	黨務	同上
蘇芳宗	男	22	高雄	成所畢業	所戶籍局中區公	黨務	同上
林義旭	男	28	台北	師範工業專修學	高雄民政局戶政	黨務	同上
曾清根	男	27	新竹	業	三南國校教員	黨務	同上
傅來會	男	28	業	專科學校畢業	省漁會指導員	黨務	同上
林麗清	女	20	台中	業	地質調查所技佐	黨務	同上

(安全局機密文件) 有關「郭琇琮案」的處刑檔案。

蔡意誠	男	24	台北	中興業	化學工業製藥廠	黨務	同上
沈道禧	男	27	國校	畢業	林電工廠工人	黨務	同上
高明和	男	21	台北	延平補習學校	台北稅捐處職員	黨務	同上
楊成晃	男	24	國校	畢業	業	黨務	同上
林雪嬌	女	25	台北	第二師範	無	黨務	同上
鄭振北	男	27	高雄	廈門大學肄業	衛生署醫務分組	黨務	同上
顏東明	男	27	台南	長榮中學畢業	員	黨務	同上
李德輝	男	33	台北	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專門部畢業	漆工廠公司松山	黨務	同上
何明泉	男	23	台南	福星初中畢業	木工	黨務	同上
許文輝	男	26	台北	國校	小販	黨務	同上
胡登輝	男	27	台南	日本帝國大學	台大醫院醫師	黨務	同上
胡寶珍	女	27	屏東	台大醫學院畢業	台大醫院醫師	黨務	同上
潘水限	男	26	台北	國校	業	黨務	同上
鄭振泰	男	29	台中	泰北中學畢業	台北醫院圖書管	黨務	同上
黃兆銘	男	26	台北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畢業	台旅服務組辦事	黨務	同上
邵水木	男	28	台南	台南商業專科畢業	公總編會計課課	黨務	同上
劉均堂	男	28	業	台大法學院肄業	新莊初中教員	黨務	同上
蘇女鵬	女	24	業	台大醫學院畢業	台大醫師	黨務	同上
陳海清	男	30	台北	台北工業學校	酒廠技士	黨務	同上
蔡世揚	男	25	台北	二中畢業	財政廳一科辦事	黨務	同上
陳新得	男	31	業	成淵中學畢業	財政廳一科科員	黨務	同上
吳定國	男	30	國校	畢業	酒廠工人	黨務	同上
陳勤	女	23	台北	第二師範	小學教員	黨務	同上
吳振源	男	23	國校	畢業	士林電工廠工人	黨務	同上
陸茂東	男	22	台北	工業學校	棉蘭局工廠技師	黨務	同上
林本侯	男	28	業	國校	化學工業製藥廠	黨務	同上
陳潤澤	男	41	業	東京神戶大學	新莊初中校長	黨務	同上

判決文號日期：本案經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於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勳助字第一〇三九號代電核定。
死刑執行日期：三十九年十二月三日。
檔案文號：(傳)3784016

如果按照陳勤與另一同案林義旭的回憶，日期應該是八月十五日。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中午，在任教的三重國小宿舍被捕的林義旭說，在軍法處看守所時，過去與他僅有「一面之緣」的郭琇琮，還會透過外役，寄給他三枝香菸。^⑩

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郭琇琮及其同案被提審開庭。^⑪

「提訊時，我與林雪嬌銜在一起，她說她要翻供，我不知她要跟法官說什麼，但她要我放心。」陳勤回憶開庭當天的情形說，「庭訊時，輕輕鬆鬆問兩句，我告訴法官，僅借鑰匙給林雪嬌。……」^⑫

結果，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裁定：陳勤和林雪嬌以「參加叛亂之組織」罪名，分別處刑五年和十年；郭琇琮與許強、吳思漢等十五人「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死刑」。^⑬

大學時代，郭琇琮在讀過一本《腦神經解剖生理》的翻譯書後，曾經預言似地在扉頁寫著：「如此致密銳利的大腦，也敵不過一粒子彈。」^⑭

那麼，對人體的脆弱清楚理解的郭琇琮，一旦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的命運，又會是怎麼樣的「一種態度呢？」

「在保密局同房時，」同案處刑十年的蘇友鵬醫師見證說：「有一天，郭大哥突然笑著對我說，我是徹底覺悟，這次再也難逃一死了！你們只是讀了幾本書，大概只要感訓幾個月就會放你們出去罷！其實，我已經多活了七年。早在日本憲兵抓去那一回就該死了；運氣好，還是多活了這七年。只可惜，沒讓我再多活幾年，多做些工作；我有很多事還沒做完呢！……」

曾經在保密局與郭琇琮同房的難友劉明也說，在軍法處看守所，有一天放封，他走過郭琇琮

的囚房時關切地問說：「你需要什麼？」郭琇琮的回答卻是：「借我一件潔白的襯衣。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⑮

在軍法處，入獄快半年的林雪嬌已經習於天天看見許多愛國青年被判死刑了。這段日子來，每天凌晨，聽著其他政治受難者被帶出去槍斃時，用悲壯的聲音高喊口號，其實她早已不存在郭琇琮能夠存活的妄想了。然而，當她從曬衣場取出郭琇琮預藏在晾曬的內褲褲帶縫裡的紙條，看到紙條上只簡單地寫著「二條一」的死訊時，她還是承受不住一旦面臨殘酷的事實時內心尖銳無比的痛苦。那一夜，她在同房四十七個人的鼾聲中失眠了。

天亮時，林雪嬌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密密麻麻的字：「如果我活下來，我一定會把你的一生寫下來；你在這短短三十三年的一生，做了他人五十年、一百年都做不完的事。題目我已經想好了：美好的世紀。但這題目好俗氣，怕你會不喜歡。」她用日文這樣寫。

第二天，林雪嬌又從曬衣場上取得郭琇琮的回條：「題目『俗氣』沒關係，只要你能把我這短暫一生所信仰的理想和所做的事寫下來，我就感到非常安慰了！」^⑯

與此同時，林雪嬌的父親仍然盡其所能地四處奔走，努力想要挽回郭琇琮的死局。

「我至愛的丈夫郭琇琮判決死刑確定後，」林雪嬌說，「那些肖小又來向父親詐騙，說什麼只要八十條金條就可以救琇琮一命。父親明知是個騙局，但他還是買了四棟樓房以供訛索，想救琇琮出來。但，年僅卅三歲的琇琮終究免不了一死！」

勇敢地活下去

一九五〇年九月廿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所謂「郭琇琮案」的「39」安潔字第二二〇四號判決書，報奉國防部審核。十一月廿五日，國防部以「39」勁助字第一〇三九號代電，核定軍法處的判決；並擬定死刑執行日期是十二月三日。④

但是，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槍決的執行卻選在郭琇琮生日那天；比預定的日期提前了幾天。⑤

十一月廿八日，清晨四點半，郭琇琮、許強和吳思漢等十五人，一個個被點名出列了。軍法處男監牢房裡隨即響起一連串呼喊震烈的政治口號的聲音。餘音在寂如墓塚的押房甬道上迴盪，久久不息。

林雪嬌知道，那是郭琇琮和他的同志們赴死前最後的吶喊。她奮力爬到關了一半的窗口，朝著樓下，嘶聲叫喚著郭琇琮的名字。就在此時，她看到，穿著雪白襯衫的郭琇琮，一邊呼喊口號，一邊壯烈地走出去的背影……。

餘音漸息，押房又恢復一片死寂。



1949年11月29日，《新南華報》披露郭琇琮等十四人槍決的消息。

林雪嬌坐在擁擠污穢的押房裡的地板上，久久地凝視著高牆上的小窗口。窗外，欲明未明的天色漸漸地亮了起來，可她已然完全崩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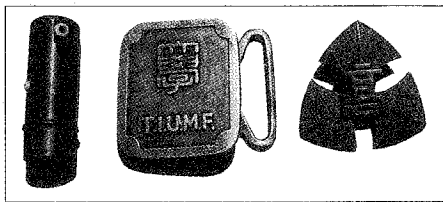
臨刑前一天，林雪嬌從曬衣場收到郭琇琮給她的最後一張小紙條。小紙條上只寫了簡單的幾個字：

雪嬌，請交代爸爸媽媽：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將骨灰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請勇敢地生活下去……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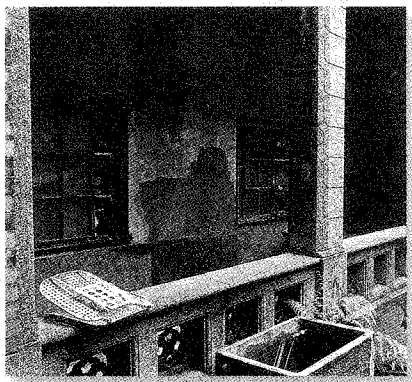
——原載一九八七年七月《人間》雜誌第廿一期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廿一日修訂



郭琇琮說：「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將骨灰灑在我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廖嘉展／攝影）



高校的帽徽、帶大的皮帶扣與手刻的印章，是郭琇琮三十三年短促的一生，僅存的遺物。（廖嘉展／攝影）



五〇年代政治整肅後，家毀人散的士林郭家。（廖嘉展／攝影）



刑期十年的林雪嬌（左二）與難友在土城生教所。（林雪嬌／提供，藍博洲／翻拍）



林雪嬌（前右）與難友許月里（後右）等人在土城生教所。（許月里／提供，藍博洲／翻拍）

注釋：

① 〈林雪嬌證言〉：第一次採訪，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二次，一九九三年四月廿九日；第三次，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七、十八日；第四次，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廿五日。以下林雪嬌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②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台北市：台灣書店，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增訂再版），頁二四、五三及四〇。

③ 楊卻俗《記芝山巖事件——一樁反奴化教育史》，原載《台灣風物》月刊第四卷第五期（台北市：一九五四年五月卅一日），頁二二。

④ 台灣總督府警察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王洛林總監譯《台灣抗日運動史（二）》（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八月初版），頁四八五。

⑤ 前引楊卻俗《記芝山巖事件——一樁反奴化教育史》，頁二二。

⑥ 前引王洛林總監譯《台灣抗日運動史（二）》頁四九二、四九三。

⑦ 前引楊卻俗《記芝山巖事件——一樁反奴化教育史》，頁二二、二三。王洛林總監譯《台灣抗日運動史（二）》頁四九七。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四〇。

⑧ 張炎憲、高淑媛〈曹永和訪談錄〉，收錄於《衝擊年代的經驗——台北縣地主與土地改革》（板橋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一九九六初版），頁一一三、一一四。

⑨ 林進發編《台灣官紳年鑑》（台北市：民眾公論社，一九四二年八月），頁八五；曾健民中譯。

⑩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四一。

⑪ 〈郭琇琳證言〉：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士林郭宅。以下郭琇琳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⑫ 前引林進發編《台灣官紳年鑑》，頁八五。台灣新民報編《台灣人士鑑》（台北市：一九三七年九月），

頁五一；曾健民中譯。

⑬ 前引林進發編《台灣官紳年鑑》，頁八五。台灣新民報編《台灣人士鑑》，頁五一。

⑭ 葉榮鐘《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台中市：晨星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三月卅一日初版），頁九九、一二五、一二九。

⑮ 前引林進發編《台灣官紳年鑑》，頁八五。

⑯ 前引葉榮鐘《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頁一二九、一二六、二四七、二四九。

⑰ 前引台灣新民報編《台灣人士鑑》，頁五一。

⑱ 潘光楷〈芝蘭新街移建記及其他〉，原載前引《台灣風物》月刊第四卷第五期，頁二〇。

⑲ 楊雲萍〈士林先哲傳記資料初輯〉，原載《民俗台灣》第一期，頁二一一。

⑳ 前引潘光楷〈芝蘭新街移建記及其他〉，頁二一。

㉑ 前引張炎憲、高淑媛〈曹永和訪談錄〉，頁一〇七。

㉒ 潘迺楨〈士林市場記實〉，前引《民俗台灣》第一期，頁一九六—一九九。

㉓ 曹永和〈士林寺廟志〉，前引《民俗台灣》第一期，頁一九四。

㉔ 前引林進發編《台灣官紳年鑑》，頁八五；台灣新民報編《台灣人士鑑》，頁五一。

㉕ 前引葉榮鐘《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頁二二二、二二六、二五五。

㉖ 楊碧川編《台灣歷史年表》（台北市：台灣文藝，一九八三年），頁一四六。

㉗ 尹章義、陳宗仁《台灣發展史》（台北市：觀光局，二〇〇〇年），頁一八九。

㉘ 前引〈郭琇琳證言〉。

- 29 吳建堂編《台高會名錄》(台北：台高會，一九八二年)，頁二〇。
- 30 前引〈郭琇琮證言〉。
- 31 前引〈林雪嬌證言〉。
- 32 〈蘇友鵬證言〉：第一次採訪，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二次採訪，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廿四日；第三次採訪，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以下蘇友鵬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33 前引台灣新民報編《台灣人士鑑》，頁五一。
- 34 前引〈林雪嬌證言〉。張炎憲、高淑媛〈曹永和訪談錄〉，頁一〇八。
- 35 〈徐吳品嫻(徐征夫人)證言〉，一九九三年一月三日採訪，台北市徐宅。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一三七、一三八。
- 36 前引〈林雪嬌證言〉。張炎憲、高淑媛〈柯德三訪談錄〉，前引《衝擊年代的經驗——台北縣地主與土地改革》，頁一二五。
- 37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市：人間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八月初版)，頁九九。
- 38 〈潘淵靜證言〉：第一次採訪，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第二次採訪，一九九七年一月廿九日；北京。
- 39 前引〈林雪嬌證言〉。
- 40 前引張炎憲、高淑媛〈曹永和訪談錄〉，頁一〇七、一〇八、一一〇。
- 41 前引〈潘淵靜證言〉。
- 42 士林協志會主催〈士林文化展覽會目錄(鄉土展之部)〉，一九四一年。前引張炎憲、高淑媛〈曹永和訪談錄〉，頁一〇九、一一一。前引〈潘淵靜證言〉。
- 43 前引〈潘淵靜證言〉。
- 44 前引張炎憲、高淑媛〈曹永和訪談錄〉，頁一〇九。
- 45 觀子〈台灣光復節歌——台灣第一代本土音樂家〉，一九九五年十月卅一日，《中國時報》寶島版。
- 46 前引〈蘇友鵬證言〉。
- 47 〈民族純血的脈動〉，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台灣新生報》。另見：陳碧笙《台灣地方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七月增訂本)，頁二八七。莊永明〈蔡忠恕事件〉，收錄於《台灣紀事》(台北市：時報文化，一九八九)，頁二四八。
- 48 前引〈林雪嬌證言〉。
- 49 轉引謝聰敏〈反對運動的領導者〉，原載美國《太平洋時報》，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
- 50 前引莊永明〈蔡忠恕事件〉，頁二四九。
- 51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民報》。
- 52 嚴秀峰〈台灣義勇隊與抗戰〉，收錄於嚴秀峰編《紀念李友邦先生論文集》(台北市：世界綜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一七四。
- 53 陳希聖〈一個曾在日帝統治下被迫徵召反正投誠勇敢的鬥士〉，收錄於嚴秀峰編《李友邦先生紀念文集》(台北市：世界綜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一三七。
- 54 三青團福建支部檔案：「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第二屆團員大會工作報告」。轉引林真〈台灣義勇隊的籌組及在福建的活動〉，收錄於前引嚴秀峰編《紀念李友邦先生論文集》，頁一二八。
- 55 龍岩縣政府檔案：「台灣義勇隊關於奉派李友邦為台灣區團部籌備主任函」。轉引前林真〈台灣義勇隊

- 的籌組及在福建的活動》，頁一三〇。
- ⑤⑥ 葉芸芸〈山水亭舊事——陳逸松談二·二八前後的蘇新、李友邦、王添灯和呂赫若〉，收錄於葉芸芸編·寫《證言二·二八》（台北市：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增訂新版），頁一一一、一一二。
- ⑤⑦ 前引〈林雪嬌證言〉。
- ⑤⑧ 十二月十二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才通令本省各地公會堂改為中山堂。
- ⑤⑨ 前引〈潘淵靜證言〉。張炎憲、高淑媛〈柯德三訪談錄〉，頁一二九。
- ⑥⑩ 前引謝聰敏〈反對運動的領導者〉。
- ⑥⑪ 前引〈蘇友鵬證言〉。
- ⑥⑫ 一九四六年二月廿六日，《人民導報》。
- ⑥⑬ 高蒼樹與劉明證言，前引謝聰敏〈反對運動的領導者〉。
- ⑥⑭ 八木俊一《東寧會會員名簿》第十八號（東京：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同窗會，一九七三年十月卅一日），頁四〇。邱仕榮編《國立台灣大學校友通訊錄——醫學院之部》（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一九七四年），頁九。
- ⑥⑮ 前引張炎憲、高淑媛〈柯德三訪談錄〉，頁一二九。另外，據林雪嬌說，郭琇琮在防疫課的職位是課長。
- ⑥⑯ 〈顏世鴻證言〉，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台南市。
- ⑥⑰ 章子慧編《台灣時人誌——第一集》（台北市：國光出版社，一九四七年三月），頁一四六。
- ⑥⑱ 前引章子慧編《台灣時人誌——第一集》，頁一四八、一七二、一一〇。
- ⑥⑹ 前引〈潘淵靜證言〉。
- ⑦⑰ 吳國興〈地方衛生行政與軍隊衛生勤務之我見〉，《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 ⑦⑱ 郭琇琮〈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相〉（林至潔中譯），一九八九年九月二、三日，《民眾日報》副刊；原載《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十月一、三日。
- ⑦⑲ 李曾碧麗女士（原基隆市警察局女職員）證言，一九八八年九月四日，台北市李宅。前引張炎憲、高淑媛〈柯德三訪談錄〉，頁一二九。
- ⑦⑳ 《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社論：〈加緊防疫〉。前引郭琇琮〈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相〉。
- ⑦㉑ 《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六月五日。
- ⑦㉒ 前引郭琇琮〈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相〉。
- ⑦㉓ 《民報》晚刊，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
- ⑦㉔ 《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七月廿八日。
- ⑦㉕ 《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
- ⑦㉖ 〈談台南警民衝突事件〉，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台灣新生報》社論。
- ⑧⑰ 一九三四年聯華影業公司攝製，蔡楚生編導的一部描繪貧苦漁民生活辛酸，充滿血淚控訴的現實主義電影故事片。
- ⑧⑱ 前引郭琇琮〈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相〉。
- ⑧⑲ 前引郭琇琮〈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相〉。
- ⑧⑳ 前引〈林雪嬌證言〉。

84 前引張炎憲、高淑媛〈曹永和訪談錄〉，頁一一四。

85 前引葉榮鐘《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頁二〇五、二〇七、二〇八、二一一、二一二、二六五、二六六、二六七。

86 前引林雪嬌及郭琇琮證言。

87 《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88 林木順編《台灣二月革命》（台北市：前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初版三刷），頁二一、二二。

89 〈吳克泰證言〉，一九九〇年四月十日，北京。

90 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頁一四；轉引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台北市：李敖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91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伍，中共特務對台工作》（香港：阿爾泰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頁三三〇、三三一。

92 〈陳炳基證言〉，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北京。

93 前引陳炳基證言。

94 〈葉紀東證言〉，一九九〇年四月九日，北京。

95 前引〈吳克泰證言〉。

96 柯遠芬〈事變十日記〉，《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

97 〈陳長官對二二八事件講話〉，調查局檔案，頁一；轉引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市：時報文化，一九九四年），頁二一一。

98 前引葉榮鐘《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頁二六七。

99 前引〈林雪嬌證言〉。

100 前引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四。

101 前引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四、一七。

102 前引《吳克泰回憶錄》，頁二四五、二四六。

103 〈李薰山證言〉，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台北市。

104 前引《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伍，中共特務對台工作》，頁三三二。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四。

105 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台北市：銀華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九月），頁三六七。

106 徐守綱〈追悼先父徐瓊二先生〉，收錄於蕭友山／徐瓊二《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談談台灣的現狀》（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

107 前引《吳克泰回憶錄》，頁一七九。

108 前引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頁三六八。

109 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三日，《公論報》，「鄉土藝術團首次大公演」相關報導及該報記者羅瑣〈記鄉土藝術團第一次公演〉。

110 李觀〈改良歌仔戲的先聲——有感鄉土藝術團公演〉，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七日，《公論報》——「日月潭」第三七七期。張冬芳〈「白蛇傳」與「風土舞」〉，一九四九年七月卅一日，《公論報》——「藝術」

- 第十七期。玉枕〈可愛的鄉土藝術〉，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公論報》——「日月潭」第三八〇期。
- ⑪ 前引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頁三六八。
- ⑫ 前引羅璜〈記鄉土藝術團第一次公演〉。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頁三六八。
- ⑬ 前引張冬芳〈「白蛇傳」與「風土舞」〉。
- ⑭ 前引羅璜〈記鄉土藝術團第一次公演〉。
- ⑮ 前引玉枕〈可愛的鄉土藝術〉。
- ⑯ 前引《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伍，中共特務對台工作》，頁三三二。
- ⑰ 前引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七。
- ⑱ 前引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四。
- ⑲ 〈胡寶珍證言〉，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台南新營。
- ⑳ 沈懷玉、曹如君〈陳勤女士訪問紀錄〉，收錄於呂芳上計畫主持《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台北市：北市文獻會，一九九九年），頁二七。
- ㉑ 據查，賽珍珠似乎沒有寫過題為《愛國者》的小說；反倒是《台灣新生報》的「橋藝叢書」，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出版了美國劇作家席勒·金士來的劇作《愛國者》（萬仞翻譯）。
- ㉒ 〈林秋興妹妹證言〉，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台北市西華飯店咖啡廳。
- ㉓ 〈周青證言〉，一九九〇年四月，北京。
- ㉔ 〈呂華暉證言〉，一九九二年元月八日，台北市三省堂書店。
- ㉕ 前引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頁三五七。
- ⑳ 前引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五。
- ㉑ 前引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五。
- ㉒ 前引〈陳勤女士訪問紀錄〉，頁二七。
- ㉓ 前引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五、一四。
- ㉔ 前引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五、一八、二〇。
- ㉕ 前引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第一輯，頁一八。
- ㉖ 郭乾輝《台共叛亂史》（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一九五四年四月），頁五八。
- ㉗ 谷正文口述《白色恐怖祕密檔案》（獨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頁八二、九一及一三二、一三五。
- ㉘ 胡鑫麟口述、胡慧玲整理〈醫者之路〉（三、六），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二、廿五日，《自立晚報》本報副刊。
- ㉙ 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中央日報》。
- ㉚ 前引〈陳勤女士訪問紀錄〉，頁廿七、卅一。
- ㉛ 李宣鋒等編《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附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八年六月），頁二二一、二二二。
- ㉜ 沈懷玉、王玉蘭〈林義旭先生訪問紀錄〉，前引呂芳上計畫主持《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

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一九。

⑬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39)安潔字第二二〇四號」判決書。

⑭ 前引〈陳勤女士訪問紀錄〉，頁卅一。

⑮ 前引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一八～二二。

⑯ 前引〈顏世鴻證言〉。

⑰ 前引謝聰敏〈反對運動的領導者〉。

⑱ 前引〈林雪嬌證言〉。

⑲ 前引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頁二二。

⑳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九日，《中央日報》第二版刊載一則「潛台匪諜十四名昨晨被執行槍決」的新

聞，同時也披露了郭琇琮、許強、吳思漢等所謂「潛台匪諜」的名單。

㉑ 前引〈林雪嬌證言〉。



蘇友鵬

醫師

一九二六～

他們沒走完的路我們一定要繼續

爲了採集郭琇琮醫師的歷史材料，一九八七年四月，某個春雨稍歇的午後，通過繫獄卅四年又七個月的老政治犯林書揚先生的介紹，我在台北市廈門街一家耳鼻喉科診所，第一次採訪了原來任職台大醫院耳鼻喉科的五〇年代政治受難人——蘇友鵬醫師。

同年七月，關於郭琇琮醫師的報導〈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在《人間》雜誌第廿一期刊出。當時，戒嚴令還未解除，「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正在不同立場的民間文化團體推動下逐步展開；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還是當時台灣社會最敏感的政治禁忌。因此，蘇醫師的證言，在當時就不得不用化名呈現。

雜誌出刊後的某個黃昏，我再度前往廈門街那家耳鼻喉科診所，給蘇醫師送上那本刊載著被湮滅近四十年的郭琇琮醫師生命史的雜誌。蘇醫師從我手中接過那本新出刊的雜誌，然後就著桌上的一盞檯燈映照的昏黃的亮光，靜靜地翻閱著那一幀幀作爲插圖的泛黃的老照片，久久不語。我安靜地坐在一旁問診病人坐的椅子上，不敢打斷他彷彿回到年輕歲月的思緒。

「照片裡的這些人，許多人都已經在那場政治風暴中消失不見了。」蘇醫師從往事的回憶中回過神來，抬起頭，對我說，「他們這些人真的是台灣社會的良心啊！」

蘇醫師戴著一副老式的、黑色塑膠鏡框的近視眼鏡。我永遠記得，當他說著話的時候，從他那對明亮的鏡片所閃現的晶瑩的光。

一兩個星期後的七月十五日，實施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令宣布解除了。

爲了進一步理解以郭琇琮爲代表的那一代台灣醫師的「良心」，十幾年來，我又在台北市廈門街蘇醫師的診所，陸陸續續給蘇醫師作了好幾次的採訪。這樣，我終於能夠理解蘇友鵬先生是通

過怎樣的刻苦學習而成爲一個醫師，後來又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被指控爲一個「叛亂」醫師的！

前清舉人的沒落子孫

「我的家族現在已經算是沒落了！」

蘇友鵬先生在我問起他的家庭背景時，首先帶著一種沒有什麼好惋惜的心情感慨地說；然後，他就按照他所知道的情況，向我介紹他的家世背景。

蘇家，在台南善化原本是一個很有名望的封建家族。清朝舉人出身的蘇友鵬的曾祖父——蘇登燕，據說當過知縣，最早從大陸過來台灣，開拓出一片家業。祖父蘇源泉也是清朝秀才，精通儒、醫，除了在家鄉設私塾、教授漢文之外，同時也是善化一帶有名的骨科醫生；此外，他還開設了一家「裕順行」，往來鹿港、台北、廈門、泉州等地，經營麻油、花生等生意，賺了不少錢，成爲善化一帶的大地主。可是，隨著日本帝國的



蘇友鵬（左二）出身台南善化前清舉人的沒落家庭。（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占領台灣，蘇家的家道很快就中落了。到了蘇友鵬父親那一代的時候，經濟條件就不如前了。因為這樣，蘇友鵬的父親僅僅畢業於日據初期台灣總督府在台南農事試驗場設置的農業講習所，未能繼續深造。

蘇友鵬的母親是台南市人，在日據時期算是少數的女性知識分子；她原本是關廟一所公學校的教員；婚後，又再考取「州立台南醫院產婆講習所」，也就是助產士訓練所，後來就轉任助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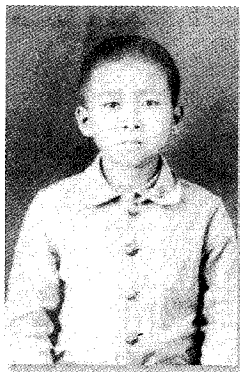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六年，蘇友鵬在台南市出生。不久，父親調派白河農會，母親也在白河庄役場（今之鄉公所）擔任助產士。他也就在白河度過了一段無憂無慮的童年。

蘇友鵬從小就跟隨精通儒學的祖父念書，上幼稚園以前，已經讀過《三字經》、《千家詩》、《大學》和《論語》；因為記憶力好，這些讀過的書，他也大都背得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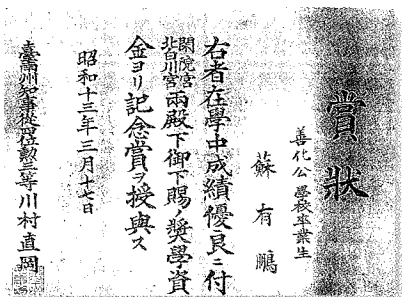
「有一天，父親下班回家，看到家裡門口圍著一群人；起初，他以為家裡是不是發生什麼意外？等到走近一看，他才看到，原來是我正在背全本的《三字經》讓那些鄰人聽……。」蘇友鵬醫師得意地笑了。

在白河念了兩年幼稚園後，蘇友鵬進入白河公學校就讀。升二年級時，因為父親調派善化農會，他於是又回到故鄉善化，轉學善化公學校。

在學期間，蘇友鵬的成績一直是第一名，表現非常突出。其中，有兩件事特別值得一提。一九三七年，他代表學



1937年的蘇友鵬。
(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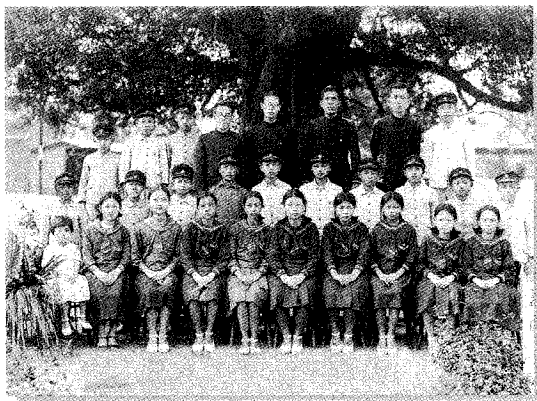
蘇友鵬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畢業，並獲得「宮殿下賞」。

校參加台南州公學校六年級兒童即席演講比賽，獲得第一名。其次，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他在三月十七日的畢業典禮上，因為一直維持第一名的優秀成績，而獲得台南州知事頒發的「宮殿下賞」。

所謂「宮殿下」指的是北白川宮和閑院宮兩殿下。其中，北白川宮就是馬關條約簽訂後第一個登陸台灣，後來死在台南的日本最高司令官——明治天皇的弟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台南神社和台北神社都是為了奉祀他而建的。

在當時，「宮殿下賞」可以說是日本皇室獎勵在學中成績優良的台灣學童所頒發的最高獎項。因此，當「宮殿下賞」的獎狀送到學校的時候，校長要親自到校門口迎接，然後恭敬地放在學校奉置「教育敕語」的保管塔中，等到畢業典禮時才拿出來頒發。

善化公學校畢業典禮那天，蘇友鵬成了善化庄的風雲人物。當天，幾乎所有善化庄的地方名人都出席了這場畢業典禮；在蘇友鵬代表畢業生致答詞，並領取「宮殿下賞」的賞狀後，他們都一一跟他父親握手道賀！



1938年，蘇友鵬（二排左一）公學校畢業紀念照。
(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台南二中的資優生

一八九八年三月，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附設五年制尋常中學科。一般認為，這是日據時期台灣男子中學教育的濫觴。

一九一四年，一部分台籍士紳聯名向殖民當局請求，為台灣青年單獨設置一所中學校，以示公平，台中的公立中學校於是才在第二年（一九一五年）正式成立。儘管如此，它在修業年限、入學資格、學習科目、生活管理等教育內容上，卻與日本人所進的中學校有著民族歧視的雲泥之別。

一九二二年，台灣總督府教育當局公布〈台灣新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台共學」制；表面上，日台學生之間的差別，大致撤除；但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殖民地台灣的學生進入中等以上學校的機會還是遠遠不及日本學生。首先，殖民當局對於新生的錄取名額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凡是日本人所進的中學校（如各地的一中），台灣學生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但是，台灣人就讀的學校（如二中），日本學生卻可以不受任何比率上的限制。其次，那些會到二中就讀的日本學生，大體上都是成績較差、考不上一中的人；為了方便這些日本學生，入學考試的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的教科書，然而，在日本帝國「差別待遇」的教育政策下，日人小學校與台灣人公學校所使用的卻是兩種不同的教科書——日本人小學校五年級念的，台灣人公學校要六年級才念；一般台灣學生不知道有這樣的差別，入學考試時自然要吃虧。此外，除了筆試以外，日



1939年12月9日，蘇友鵬（三排右一）參加善化公學校第十四屆畢業生送別紀念。（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語口試的成績又占有相當分量，而主持所謂「錄取會議」的校長和教員又大多數是日本人。因此，在這樣的客觀條件限制下，一般說來，能夠考取中學校的台灣學生，大多是小學校或規模較大、師資較好的公學校畢業生。

然而，在競爭激烈的升學考試中，善化公學校的升學率卻還蠻蠻高的；在報考人數七、八百人卻只錄取一百五十人的情況下，每年都會有六、七人上榜。善化公學校畢業的那年，蘇友鵬更以第二名的入學成績考進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在地方上造成一定的轟動。

台南二中的全名是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創立於公布〈台灣新教育令〉的一九二二年。蘇友鵬是第十七屆的學生。後來，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蒙難的同屆同學，至少包括李瑞東（槍決）、胡寶珍、邱奎壁、邱媽貢、葉石濤等人。

在南二中求學期間，蘇友鵬最喜歡的是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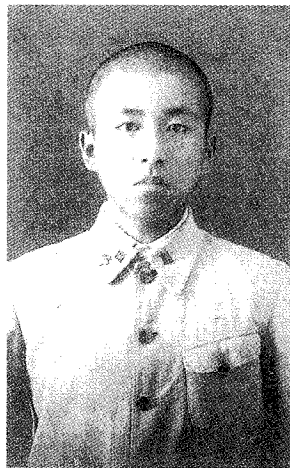
語、幾何和化學三個科目，而且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其中，第一學年的英語科，全學年就只有他一個人拿到滿分；以後的幾個學年，也都保持九十分以上的成績。他對英語作文尤其有興趣，每次考完學期考試，老師總要把他的作文試卷貼在教室後頭的公布欄上，一方面讓其他同學參考，一方面鼓勵他。

「有一次，老師要我們用equal造句：「蘇友鵬醫師略帶羞澀地笑著說。「結果，大部分的同學都寫道：One plus one equals to two。可我自視甚高，敢於創新地將equal當作「匹敵」的意思，寫道：No one can equal him in English composition...!」

那時候，蘇友鵬醫師才十三歲。對他來講，未來的前途應該是光明的。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後來的歷史進程以及他個人的人生旅途，竟然會走得那樣曲折坎坷吧！

當時的中學課程除了包括國文、漢文、英文、數學、理科、生物、社會、生理衛生、美術、音樂等學科之外，還包括武道（柔道、劍道任選一項）、體操（體育）、教練（軍事訓練）和作業（勞動服務）等科目；至於它的成績計算方式則是：國文（正、副各一百分）、漢文（正、副各一百分）、英文（翻譯一百分、作文一百分）、數學（代數一百分、幾何一百分）、理科（物理、化學各一百分）、生物（動物、植物各一百分）、社會（歷史、地理各一百分）；生理衛生、美術和音樂，每科一百分；武道、體操、教練和作業都是每科兩百分為滿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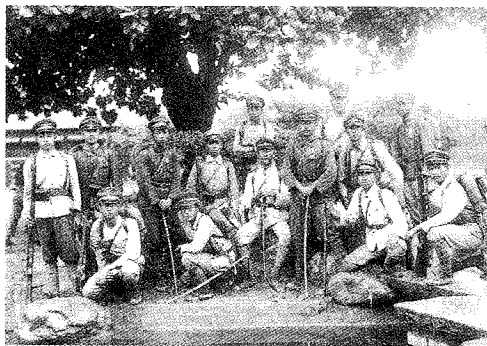
因為這樣的遊戲規則，儘管台灣學生的學科成績往往勝過日本學生；可在成績計算上通常都是日本學生占便宜。所以，蘇友鵬在南二中期間的成績始終在第二名至第五名之間徘徊，一直無法勝過日本學生而取得第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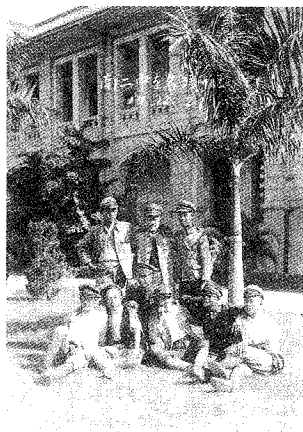
南二中四年級的蘇友鵬。
（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1942年8月31日的蘇友鵬（右二）與同學們。
（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蘇友鵬（前右二）在南二中的軍事教練課。
（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1942年12月28日，蘇友鵬（前左二）與南二中同學，在校園。
（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帝大預科生與協志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殖民地台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南侵的主要根據地。

一九四三年三月，蘇友鵬從南二中畢業，並考取台北帝大預科理科醫組。台北帝大預科成立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分文、理兩科，理科又再分為農、工、醫三組。修業年限原定三年，因為戰爭的影響，後來就改為二年。它和創立於一九二二年四月的台北高等學校，是日據時代台灣兩所專為升大學而設的預備學校。在日台人間不公平的入學制度制约下，通常也只有少數又少數的台灣學生才能夠倖而進入。

蘇友鵬記得，他考取台北帝大預科理科醫組的那年，錄取率非常低；一共錄取四十幾人，其中日本學生就占了三十幾名，台籍學生的名額只有十四、五人。因為競爭實在太激烈了，當時的補習學校於是把這種入學考試稱作「試驗（考試）地獄」。……不過，話說回來，正因為這種不公的考試制度，所以，考進去的台灣學生一定比日本學生優秀！

台北帝大預科的校址位於士林芝山巖。蘇友鵬上台北之



1943年，蘇友鵬考進台北帝大預科理科醫組。 (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後，就在士林街上租房子住。當時，士林當地具有反日思想的台北帝大學生，組織了一個經由日本統治當局批准許可的文化團體「協志會」，經常在士林車站附近的基督教長老教會進行音樂活動。蘇友鵬對音樂很有興趣，中學時期自己摸索學過拉小提琴；因為地利之便，他也常到教會走動，因而認識了何斌、郭琇琮等「協志會」的領導核心及陳泗治牧師。

在蘇友鵬的印象中，何斌是個在文學、哲學和藝術上的教養都很深遠、思想進步的醫學生。另外，他還記得，當時就學於台北帝大醫學部的郭琇琮，每天早上都帶著他就讀第三高女的妹妹，從家裡走到不遠處的士林火車站，等車上學；每當他戴著帝大那頂四角帽，走過士林街上時，都要引起鄰居與路人的側目與誇讚。

陳泗治牧師在生活上很照顧蘇友鵬。有一次，他的房東突然要修房子，要他搬走；陳牧師看他一時之間也不好找房子，就要他搬到教會一個小房間，跟他一起住。他就這樣白天上學，晚上回到小房間，和陳泗治牧師共同生活了大約一年的時間。

後來，蘇友鵬也參加了陳泗治牧師負責組織的、協志會的男女混聲合唱團。合唱團主要練唱各種世界名曲，然後到廣播電台或台北公會堂舉辦演唱會。他和郭琇琮，以及目前人在北京的黃辛潘，唱高音部；胡寶珍唱低音部。當時，郭琇琮家有鋼琴，有時候，合唱團也會在郭琇琮家舉行發表會。



1944年10月30日的台北帝大預科學生蘇友鵬。 (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另外，也因為與陳泗治牧師住在一起的機緣，蘇友鵬後來也認識了善化籍的小提琴家林森池，以及著名的小說家兼聲樂家呂赫若先生。

堅持不改姓名

一九四三年，日軍在東南亞的戰場節節敗退，侵略戰爭的敗象開始呈現；台灣因而被編入日本的絕對國防圈內，進入「決戰期」，同時也開始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兵源供應地。一九四四年一月，台灣總督府公布了鼓勵台灣人民改用日本人姓名的辦法，「皇民化運動」的推展達到極致。

在如此惡劣的時代氣氛下，蘇友鵬始終堅持不改姓名。他之所以堅持不改姓名，主要有兩個理由。首先，他家雖然是沒落地主，卻始終保有堅持儒學氣節的家風。其次，他從小就愛看課外書，書看多了，再驗證日本殖民統治的現實，民族意識自然就覺醒了。

「我記得，」蘇友鵬醫師舉例說。「在南二中求學時，四年級的數學老師神田是一個非常瞧不起漢民族的極端大和民族沙文主義者，他曾經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囂張地說：國家十年之計在於打敗英美帝國主義；國家百年之計在於消滅支那民族。……我想，聽到這類講話的台灣青年，除非不承認自己是漢民族，否則的話，他的民族意識自然就會覺醒的。」

與此同時，因為盟軍飛機經常轟炸台灣各地，人心惶惶。就在這個時候，郭琇琮與台北帝大醫學部同學蔡忠恕，以及台北二中、台北高商等北部地區青年學生，也因為反日的思想學習與組織，受到日警的大檢舉。

在這次事件中，蘇友鵬僥倖沒有受到株連。

郭琇琮被捕的那天下午，放學後，蘇友鵬照例前往協志會；他這才聽說，郭琇琮失蹤了！聽說是因為跟一位祖國來的徐征教授學北京話、讀「三民主義」而被日本憲兵抓走了。

命在旦夕的學徒兵

台北帝大預科的修業年限原定三年，受到戰爭的影響，改為二年；因為這樣，蘇友鵬於一九四五年三月畢業。隨後就像許多優秀的台灣青年一樣，為了現實的就業問題，以學醫為上策，直接升學台北帝大醫學部，從此走上醫者之路。

然而，嚴峻的現實卻讓蘇友鵬的習醫之路無法平順地走下去。

由於戰事吃緊，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二日，台灣殖民當局宣布：「台灣進入戰場狀態」。十月十二日，盟軍飛機千餘架轟炸台灣各地；為因應形勢，十月廿二日，台灣殖民當局設立了所謂「疏散指導部」。十月廿四日，日軍在菲律賓的海戰戰敗。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四日，盟軍飛機數百架又再連續轟炸台灣兩天。一月九日，美軍進入馬尼拉；同一天起，一直持續到十七日止，盟機又再連續轟炸台灣。到了二月底，受到戰爭的破壞影響，台灣民眾開始以甘藷代替食米為主食。三月三日，為了防止美軍登陸台灣，台灣的中學生被編成防衛警備隊，駐守各海岸山坡地。

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才沒多久的蘇友鵬，也被徵調去當學徒兵。當時，他們醫學部低年級的學生被徵召到淡水、八里一帶服役。他們所屬的部隊叫荒川砲兵隊，駐守觀音山。白天，他們都

在山上挖碉堡，以及碉堡之間的聯絡地道；到了晚上，才回砲兵隊，與其他軍人一起生活。有幾次，他奉命到五股領糧，途中都遇到美軍P38、B24與B38型的轟炸機。……

「當時的處境，真的可以說是命在旦夕吧！」蘇友鵬感慨地說。

光復初期的激動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台灣回歸中國。

蘇友鵬終於結束了長達五個月左右的學徒兵生涯，重新回到學校念書。這段時期，他也滿懷熱情地參與了出獄後的郭琇琮所領導的戰後台灣第一個自發性的學生組織——「台灣學生聯盟」，及其主辦的以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為主題的宣傳、演講及教育等活動。

台灣雖然光復了，但日軍還足以控制整個台灣。蘇友鵬追憶光復初期台灣的社會狀況，說，就在那年的十月十日，士林一帶的學生與社會人士集合起來，公開慶祝光復後的第一次國慶。由於這是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以來，台灣同胞第一次能夠公開慶祝國慶，大家都很興奮。在會場上，郭琇琮以一口流利標準的北京話，帶領全體與會者唱〈國歌〉和〈國旗歌〉，恭讀〈國父遺囑〉，最後再高唱〈國父紀念歌〉與〈義勇軍進行曲〉……。

十月十七日，台灣民眾期待了五十年的祖國，終於以國軍第七十軍及部分長官公署官員為代表，分乘四十餘艘美軍艦艇，抵達基隆。「台灣學生聯盟」也與其他人民團體一般，抱著「歡天喜地」的心情，大力動員各校學生，前往基隆碼頭或各個交通要道，熱烈迎接。台北火車站前也

聚集了許多學生隊伍，其中站在最前頭的便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個子矮小的蘇友鵬也擠在擁擠的人群當中，跟著大家，興奮地大聲唱著剛剛學會不久的「歡迎歌」，歡迎祖國軍的到來。當他透過人群的縫隙，看到一個個挑著鍋子、食器，背著雨傘、被褥的國軍，淩凌亂亂地從夾道歡迎的民眾前面走過時，他雖然跟其他在場的民眾一樣，對國軍所展現的這種軍容感到非常失望，可他仍然跟其他青年學生一樣，立刻替祖國來的軍隊辯解說：「經過了八年的辛苦抗戰，祖國當然是窮困的；也因此，祖國的軍隊才會這樣……。」

這時候，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和帝大附屬醫院也已經從疏散地遷回台北原址了。回台北後，醫學部在職的台灣人醫師也以杜聰明為首，組成六人接收小組，共同扛起重整校園、重建學校的責任。十一月十五日，台北帝大的接收工作完成；行政院決定改組台北帝國大學為國立台灣大學，內分文、法、理、工、醫、農六學院。五天後，也就是十一月廿日，行政院第七百廿一次會議決議通過設立台灣大學案；再過五天，也就是十一月廿五日，國立台灣大學正式設立。

蘇友鵬的身分於是也從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學生變為台灣大學醫學部第三屆的學生。與此同時，十一月十七日，陳儀公告了所謂「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學生聯盟也和所有的人民團體一般，不得不停止公開的活動。然後，隨著陳儀接收政權在政治、經濟、財政、社會各方面的種種惡政，台灣民眾的心情也從光復初期的「歡天喜地」逐漸轉為「呼天喚地」了；不滿和怨憤的社會心理四處瀰漫著。

「那時候，」蘇友鵬醫師說。「我急著把國語和中文學好。我心裡想：只要我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寫通順的文章，我就可以對那些欺壓老百姓的貪官污吏，毫不留情地口誅筆伐！」

因此，每天下午四、五點，上完醫學院的課後，蘇友鵬醫師立刻趕去上學校替他們安排的國語課。但是，他的國語還沒有學好，「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

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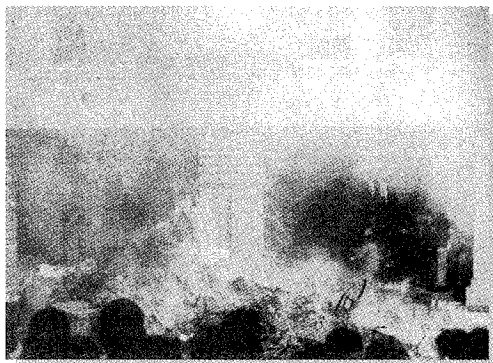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二月，甚至更早已來的「米荒」問題，在台灣各地鬧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搶米風潮；米荒，再加上通貨膨脹、日產接收等等台灣社會潛存的各種問題與矛盾，使得台灣的局面變成媒體所描述的「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地方。這樣，廿七日晚上，台北延平路上緝煙所引發的官民衝突事件，隨即在

全省各大城市發展為全面性的「二二八」蜂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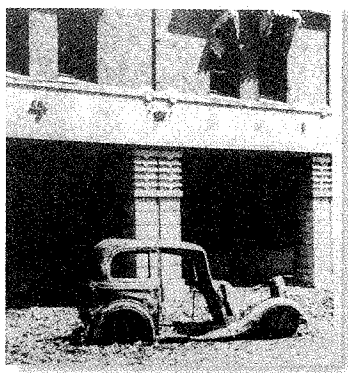
當時，蘇友鵬和小舅陳海國及善化同鄉林耿清住在水源路的宿舍。事件發生的第二天，他要到學校，經過重慶南路一段的專賣分局時，他看到



二二八事件，專賣分局現場之一。



專賣分局現場之二。



專賣分局現場之三。

許多群眾正把專賣分局的香菸和其他物品搬到外面，放火燒燬。火越燒越旺，群眾的情緒也隨著火勢越來越激憤；圍觀的群眾也就越聚越多。他繼續往前走。一路上，他看到有些本省籍民眾一邊追著外省人打，一邊大聲喊：「打阿山仔。」在漢口街附近，他親眼看到有個人被追到無路可逃，於是跳進水溝裡躲藏；結果，還是被拉出來痛打一頓……後來，學校停課了，他就不再隨便外出。

三月一日起，台北的「二二八」鬥爭分別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條戰線是以地方士紳和民意代表為主，部分群眾團體代表參加組成，整天在中山堂開會的「處理委員會」。另一條戰線是看到「處理委員會」的複雜性與妥協性，不能解決問題，而準備武裝鬥爭的群眾。這時候，中共地下黨「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站在群眾中間，擔負起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的任務。

三月四日，地下黨人李中志團結了日據末期因為抗日而坐過牢的學生領袖郭琇琮與陳炳基等人，通過台大校本部、師範學院、台大法商學院和延平大學等各校負責人，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計畫於三月五日凌晨兩點發動武裝進攻。其中，第一大隊由陳炳基領隊，在建中集結；第二大隊由郭琇琮指揮，在師範學院集結；第三大隊由李中志指揮，在台大集結。李中志同時也是這次武裝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則是郭琇琮。

台北學生的武裝計畫是：三月五日凌晨兩點，先由第三大隊會合烏來的泰雅族同胞，攻打戒

備較鬆的景尾軍火庫；然後，再與第二大隊會攻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各隊取得充分的武裝後，再分頭負責攻取市內所有的軍、警、憲武裝據點；拂曉時，各隊總會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院現址）。

當時還是台大醫學院三年級學生的蘇友鵬，也因為他與郭琇琮及學生聯盟的關係，被動員到郭琇琮領導的第二大隊。

三月四日晚上，蘇友鵬和小舅陳海國及善化同鄉林耿清在宿舍接到學生聯盟的集合通知；他們三人就跟著學生聯盟的人，前去集合的地點；他們被帶著換了幾個地方，最後來到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大）的操場。他看到，現場已經有大概四、五百名左右的學生，坐在草地上。天空下著微雨。有的同學蒙著面，有的沒有；其中一個蒙著面的人正在講話。他從那人的身材和講話的手勢，認出是郭琇琮，於是就走向前去，想要跟那人打個招呼；那人一看到蘇友鵬，就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向他看了一眼，表示招呼，然後馬上用手指在嘴巴上比了一個手勢，要他別出聲說話。蘇友鵬看到，那人的腰上佩帶著一把比武士刀要短些的刀，旁邊有好幾個同學正在把竹子削尖，準備當作武器來用；另外有些人兩手都拿著已經削尖的竹子，在一旁安靜地聽那人報告作戰計畫。這些人，蘇友鵬都不認識。

郭琇琮把這些學生分成幾個小隊，然後由各隊分開幾路，準備去劫南機場的彈藥倉庫，解除國軍的武裝。當蘇友鵬接到集合通知的時候，他只知道是要學生集合，並不知道是要去南機場解除國軍的武裝；不過，一旦知道了以後，他也不覺得害怕。他們住在一起的三個人被分為同一組，跟著其他人一起行動。到了深夜十一、二點，天空仍然下著毛毛雨。他們被領著，沿著萬華

到新店的鐵道（今汀州路），前往中正橋下，準備與由萬華方向過來的烏來山胞會合；蘇友鵬聽說，他們身上握有武器。

蘇友鵬跟其他學生們就這樣三、四人一組，一路躲躲藏藏，好不容易地來到會合的地點。結果，他們一直等到凌晨兩、三點，烏來的山胞還是沒有來。

郭琇琮於是就宣布隊伍解散……

「後來，」蘇友鵬說：「我就沒有再接到任何集合的通知了。」

台大醫師的讀書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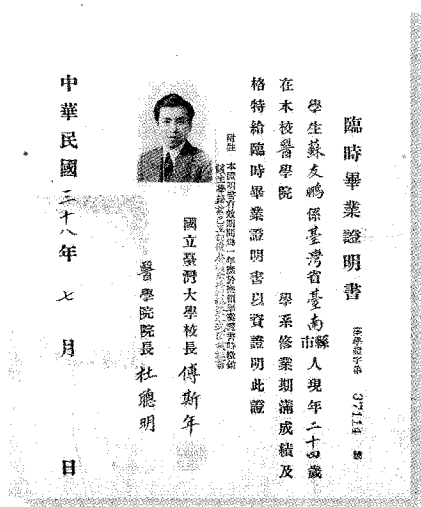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七月，蘇友鵬畢業於台大醫學院，成為光復後台大醫學院第三屆畢業生；然後進入台大醫學院耳鼻喉科，擔任醫師兼助教。

當時，耳鼻喉科有十幾個醫師。廿三歲的蘇友鵬，因為學校一畢業就進來，算是最年輕的了。

那時候，台大醫院的醫師薪水是看缺額而定的。



1949年7月，蘇友鵬（一排右六）畢業紀念照。（葉光毅／提供，藍博洲／翻拍）



1949年7月，蘇友鵬畢業於台大醫學院第三屆；成為台大醫院耳鼻喉科醫師兼助教。（蘇友鵬／提供）

也就是說，如果耳鼻喉科的編制只有五個缺額，實際上卻有七個醫師的話，那麼，這七個醫師只能就先占了名額。因為這樣，蘇友鵬即便已經畢業當醫生了，可他的經濟條件並沒有好到哪裡去。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又很厲害；因為生活條件很艱苦，他只好去開南商工兼課（教幾何學）來維持生活。與此同時，因為台南同鄉王耀勳及妻子陳棗女士為人慷慨，他就常去他們家吃飯；有時候，蘇友鵬生活上碰到困難，王先生也會幫忙他。

王耀勳是台南安定鄉港口村人，日本明治大學肄業，台灣光復後在《新生報》日文版當編輯，因此與該報編輯主任王白淵熟識。《新生報》日文版廢刊以後，他就轉任台北市第六倉庫合作社總務主任。

通過王耀勳，蘇友鵬後來也認識了作家王白淵，並且通過他的介紹，找了一個家庭教師的兼差，這才基本上解決了生活問題。

經歷了一場「二二八事件」後，絕大部分的台灣青年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狀態，他們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後來，大部分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了的進步的台灣青年，於是通過對同時涵蓋大陸與台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略規律的認識，轉而傾向

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

在那樣的大時代裡，台大醫院裡據說以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為主的一部分醫生們，也祕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想把中文學好的年輕醫師蘇友鵬也抱著極大的熱誠，自己研讀著巴金、茅盾、老舍、魯迅等三〇年代的作品。尤其是魯迅的《狂人日記》，儘管他在日據時代已經看過日文版了，還是強烈地吸引著他；他隨身帶著，一有空就拿出來讀。多年以後，他還記得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當時，那些作家的書都已經是不能公開閱讀的禁書了。蘇友鵬醫師是通過王耀勳接觸到這些書的。王耀勳對文學很有興趣，特別喜歡看我國三〇年代的文學作品。因為這樣，蘇友鵬也常向他借這些書來看。

當時，台大醫院耳鼻喉科主任杜詩綿醫師也常向蘇友鵬借這些書來看。因為是禁書，每次，他都悄悄地從蘇友鵬醫師桌上拿走那些書，讀完後，向他道了謝，然後再悄悄地放回他的桌上。

那時候，蘇友鵬是台大醫院的住院醫師，有自己的一個房間。晚上，有時候，許強醫師也會到耳鼻喉室來找他聊天；雖然他會拿一些書給蘇友鵬讀，但是他們之間並沒有正式的思想討論；後來，許強醫師也推薦蘇友鵬參加組織，並且要他寫自傳，但是他實在太忙了……

「如果說，我當時有參加什麼『組織』的話，」蘇友鵬醫師苦笑著說。「大概也就是這個『讀書會』而已。」

台大醫院案

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基隆中學師生逮捕事件為序幕，情治系統針對所謂的「匪諜」或「潛存的反政府組織」，在全省各地同時展開了秘密逮捕的「掃紅」行動。

秋天的某個暗夜，王耀勳突然在家裡被秘密逮捕。因為蘇友鵬常到家裡走動，陳棗擔心他會受到牽連，第二天立刻跑到台大醫院找他，要他趕快逃；可她卻沒能找到蘇醫師本人。

後來，蘇友鵬醫師並沒有因為王耀勳的被捕而跟著被捕。儘管如此，不到一年後，他還是難逃被捕的時代厄運。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特務的魔手終於毫不留情地伸進台大醫院。當天下午，蘇友鵬醫師和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及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同時在台大醫院院長室被捕。

那天下午，大約是一、二點鐘，蘇友鵬醫師正在用鑄錠診療一位鼻咽癌的患者。就在這時候，副院長林天賜先生從院長室撥來電話，要他立刻到院長室去。放下電話後，他有點納悶地想道：究竟是什麼事情，這麼緊急呢？他當時住在醫院四樓的宿舍，常常在晚上練習拉小提琴，所以，他想，會不會是琴聲吵到



蘇友鵬喜歡拉琴自娛。(蘇友鵬/提供，藍博洲/翻拍)

了隔壁的小兒科醫師，他們反映到魏火曜院長那裡去了？可他又想到，他拉小提琴都有裝上滅音機，照理是不會影響到別人才對？不過，不管怎麼想，他還是想不通為什麼院長室要他馬上過去？由於他先前完全沒有聽到任何抓人的風聲，所以，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就這樣被抓。

最後，蘇友鵬醫師還是放下病人，穿著診療時穿的白袍，趕緊過去院長室。一進院長室，他就看見許強醫師臉色凝重地坐在沙發上；他看到蘇友鵬進來，也沒有像平常那樣打聲招呼。許強醫師的兩旁坐著兩個陌生人，蘇友鵬看了他們一眼就認定他們是便衣特務。這時候，他注意到，院長魏火曜忙著跟另外幾名便衣特務說話；偶爾也會神情不安地跟一旁的副院長林天賜交頭接耳。隨後，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也進來了。蘇友鵬醫師平常跟胡鑫麟醫師很熟絡，他們都是台南人，而且都很喜歡音樂；蘇友鵬醫師拉小提琴，胡鑫麟醫師拉大提琴，時常一起合奏。蘇友鵬觀察到，胡鑫麟醫師看到許強醫師坐在那裡，當場就臉色發白。

蘇友鵬醫師回憶說：「我看胡鑫麟的臉色不對，就知道這下慘了，一定是出事了！」

後來，皮膚科醫師胡寶珍也被叫來了。他們四人於是在院長室無言地枯坐著，只見那些特務進進出出，不知在忙些什麼？蘇友鵬後來才聽說，原來他們是在等第一內科主任翁廷俊醫師。但是，翁廷俊醫師剛巧回老家探視生病的母親，不在醫院；後來他獲得台北親戚的通知，逃亡了一段時候，才不得不出來辦「自首」。

等了一個多鐘頭後，蘇友鵬和胡鑫麟，許強和胡寶珍，才又分別被帶上兩部停在外頭的吉普車，駛往延平北路的保密局。

在保密局的押房

蘇友鵬和許強、胡鑫麟、胡寶珍等四位醫師從台大醫院被押送到保密局南所以後，首先是填寫各自的基本資料，然後就把衣服、皮帶、鞋子脫下來，交給衛兵檢查。結果，衛兵竟然從蘇友鵬西裝外套的口袋，搜出一本魯迅的《狂人日記》。

這本《狂人日記》，大概就是後來能夠入蘇友鵬醫師「叛亂罪」的唯一物證了。問題是，他怎麼會把這本禁書帶進去坐牢呢？

原來，蘇友鵬醫師離開院長室之前，林天賜副院長打了電話給耳鼻喉科，要護士把他的西裝外套送來，換掉身上那件白色的醫師工作服；結果，在匆忙之中，護士爲他送來的外套裡，還放著那本《狂人日記》，而他卻完全不知情……。

檢查完後，他們四人就被分開羈押。

蘇友鵬醫師被推進一間擁擠的牢房。他聽到背後響起一聲鐵門用力關上的聲音，立刻陷入一種陌生的驚慌。他緊貼著牢門入口處潮濕的牆壁，用眼睛默默數了數，裡頭一共關了十三個人。忽然，他看見一個人，跛著腳，從狹窄的牢房裡頭，扶著牆，一拐一拐地走出來。他看到，那人的兩條腿已經被打得浮腫瘀血了。就在那人更靠近來時，他看到他那從眼鏡後面逼射出來的一雙炯炯的眼睛。

「啊，郭大哥！」蘇友鵬醫師不由得叫了出來。

蘇友鵬醫師所說的郭大哥不是別人，就是郭琇琮。郭琇琮沒有說什麼，只是以一種堅強而溫暖的眼神安撫他，然後又一拐一拐地走出押房，出去面對嚴酷的偵訊。

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剛進押房的時候，蘇友鵬醫師睡在押房最裡頭的位置。台灣煤炭、金礦業鉅子、原振山事業社老闆劉明先生和郭琇琮依次睡在他的隔壁。因爲擁擠，他們只能像沙丁魚罐頭那樣，一個擠一個才能睡覺。

除了劉明和郭琇琮之外，同房還有幾個讓蘇友鵬醫師印象深刻的難友。其中一個就是「高雄市工作委員會案」案首的劉特慎。據《安全局機密文件》記載，劉特慎是廣東人，一九四七年六月來台，在南部推展農運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被捕。

「在我眼裡，劉特慎是個令人敬佩的硬漢！」蘇友鵬醫師滿懷想念地說。「他經常安慰我。有一次，他看我吃不下飯，就勸我要多吃一點！他開玩笑地說：像我，每餐都盡量吃多一點，這樣，一旦被槍決的時候，我才有力氣把血噴到那些劊子手的身上……。」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劉特慎被槍決，享年三十歲。

在保密局南所期間，蘇友鵬前後只被叫出去問了一次口供。偵訊的內容主要是「在讀書會念了什麼書？有沒有參加組織？是誰吸收的？……」等等一般問題。蘇友鵬始終堅持說，他只有看書而已，沒有參加什麼組織，也沒有人吸收他。也許是涉案不深吧，他並沒有遭到刑求，偵訊就結束了。

不久以後，韓戰爆發。蘇友鵬醫師跟其他同案難友也因爲保密局南所的押房過於擁擠，而被移往台北橋旁原高砂鐵工廠改建的保密局「北所」。

到軍法處結案

一段時間以後，蘇友鵬醫師又與同案難友再被移送台北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等待結案。到軍法處之後，因為台大校長傅斯年的要求，他們這幾個台大醫師的家人才得以送一些東西進來，像是牙刷、牙膏、肥皂、襯衣、罐頭等生活用品，但也是幾次而已。

軍法處的押房一共分成四區，樓下是一區和二區，各有十六間押房；樓上是三區和四區，中間有一個大廳，隔間不同。在等待判決之前，有一段時間，蘇友鵬醫師曾經與許強和胡鑫麟醫師同房。許強和胡鑫麟醫師都曾經是蘇友鵬的老師；許強教的是消化系統的課，胡鑫麟則是他「眼科臨床實習」的老師。那段期間，因為案子已經「結」了，他們幾乎無所不談。有一次，許強醫師要蘇友鵬和胡鑫麟醫師自己診斷一下，在自然狀態下，可能讓自己生命終結的會是什麼疾病。當時，胡鑫麟想了一會兒，說是消化系統疾病。沒想到，一九九八年一月，胡醫師果真因此病而逝世……。

除此之外，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的許強醫師，也用德文向胡鑫麟和蘇友鵬討論了什麼是真理的問題。

當時的醫學術語都用德語，在做學生的時代，蘇友鵬和其他同學就很喜歡學許強醫師那種帶有台灣腔的德語來講醫學術語。許強以他特有的柔和聲音，慢條斯理地娓娓說道，真理是有普遍性、妥當性的，是超越時間的；在真理之前，人人是平等的。他認為，科學是一個個真理和定理累積起來的東西，不是魔術，也不是奇蹟。因此，他很重視科學。

判決

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

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依台灣省保安司令部「(39)安潔字第二二〇四號」判決令，裁定郭琇琮、許強、吳思漢與王耀勳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另外，謝桂林醫師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處死刑。

蘇友鵬醫師認為，他和許強醫師他們的組織，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他研判自己之所以會被抓，主要還是因為王耀勳的關係。……因為在他被捕之前，王耀勳就已被逮捕了；而且從王耀勳平常的言論，他也認為，他可能有參與地下黨的工作；……或許和吳思漢也有關係吧！

吳思漢是蘇友鵬在白河公學校時高一級的學長，本名吳調和；他和蘇友鵬一樣，公學校六年的成績都是第一名；在台南二中，他仍然高蘇友鵬一期，後來又念台北高校、京都帝大醫學部；日據末期自己一個人經朝鮮、越過鴨綠江，前往大陸，尋找祖國的抗戰組織；台灣光復後，他從重慶回來，跟王耀勳一樣在《新生報》工作。

因為這樣的背景，蘇友鵬醫師和吳思漢也有來往。他在台大醫院耳鼻喉科當住院醫師時，吳思漢已經潛入地下了；他曾經提供耳鼻喉科的醫師休息室，讓吳思漢住過一、兩次。那時候，吳

思漢白天都不敢出門，總是在晚上四處找朋友聊天；而且，隨身背著裝著牙刷等日常用品的背囊，隨時都準備跑路。後來，看了判決書後，蘇友鵬醫師才知道，吳思漢地下工作的活動範圍很廣，幾乎台北街頭、支部的所有活動都是他搞的。

「因為王耀勳和吳思漢有組織上的關係，」蘇友鵬醫師說。「所以，我推想我的被捕也是和吳思漢有關的。可是，我在牢裡只見過王耀勳一次，又沒有機會交談，真相究竟如何，也就無從查證了。」

九月廿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這項「判決」，報奉國防部審核；十一月廿五日，國防部以「(39)勤助字第一〇三九號代電」核定軍法處的處決；並擬定死刑執行日期是十二月三日。但是，槍決的執行顯然比預定的日期提前了幾天。

十一月廿九日，《中央日報》在第二版刊載了一則「潛台匪諜十四名昨晨被執行槍決」的新聞，同時也披露了郭琇琮、許強、吳思漢和王耀勳等十四名所謂「潛台匪諜」的名單。

「當我得知敬愛的老師和幾位前輩們已經被槍殺的消息時，有一個多星期，天天以淚洗面。」蘇友鵬醫師哽咽著說。「我心情沉痛地想著，優秀的人才是非常難得的！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殖民地台灣才出現幾個像許強老師、郭琇琮和吳思漢等那麼優秀的人才；可是，光復才五年，一場白色恐怖的政治風暴就輕易地把他們撲殺了。真是可惜啊！」

郭琇琮和許強等人被執行槍決以後，蘇友鵬醫師跟其他同案倖存者也被判決了。蘇友鵬因為「三十八年十月參加叛亂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至於他「顛覆政府」的所謂「事實」，判決書並沒有記載。我們只能在王耀勳的部分看到與蘇友鵬有關的如下記事：王耀勳

「於三十八年七月參加叛亂組織」，「吸收邵水木、蘇友鵬……等人」。

他們被判刑時，不但沒有人旁聽，也沒有律師；既沒有申述，也沒有對質；更沒有什麼上訴的機會。對這樣的判決，蘇友鵬醫師當然不以為然。他認為，其實，在被捕當時，他們就已經決定該怎麼判這些被捕者的刑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什麼審判的程序。……

後來，蘇友鵬醫師聽他妹妹說，當他母親聽到他被判刑十年的消息時，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眼睛都腫起來了……。那時候，他想，幸好，當時他還沒結婚，自己一個人，好處理；不像胡鑫麟和許強老師，他們都已經有妻有子了。

死亡行軍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黃昏，國防部軍人監獄（今喜來登大飯店）服刑政治犯們的晚餐，比平時提前；一種不安的情緒隨即在押房裡頭擴散。到了半夜，一陣尖銳的哨音突然在監獄的甬道急促地響起，獄卒們大聲呵斥著：「趕快收拾身邊的東西，十分鐘內集合。」監獄裡頭立刻起了一陣騷動。不久，這批已經失去自由一年的政治犯們被集中在平常放封的空地上。那些獄卒讓他們兩人一對，手銬手；前後共十對，同時左右兩側沒有上手銬的手，用繩索捆繫串聯起來；這樣，形成每二十個政治犯一隊的方陣。

蘇友鵬醫師又像去年被捕時候一樣，和胡鑫麟醫師銬在一起。

這時候，軍人監獄大門裡外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憲兵，他們個個荷槍實彈，戒備森嚴地將一個

方陣一個方陣的政治犯們押出獄門。

蘇友鵬醫師感到寒意陣陣。

天色朦朧，天邊黯然的星光依稀可見。萬籟俱寂，台北街頭彷彿如死一般寂靜。

「我們要被押去哪裡呢？」蘇友鵬醫師內心不安地想著。「這一去，生死難卜？下一步，我們要面對的又是什麼樣的場面呢？眼前，每一步都是未知的世界？但是，但是……大家的命運卻是相同的。」他安慰自己。然而，他忽然想起「二二八」的情景，一下子就又感到萬念俱灰！

蘇友鵬醫師拖著笨重的雙腿，一步接一步，隨著獄卒們的腳步前行。在恐怖的靜默中，手銬偶爾銀鏗碰撞所發出來的聲音，突然又把他那已經被寒風吹得冷麻的腦殼驚醒。這時，他終於深刻體會到究竟什麼叫「無語問蒼天」，以及「叫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的心情。

就在這時候，蘇友鵬醫師和胡鑫麟醫師的視線無意間相遇了。胡鑫麟看了他一眼，然後像是喃喃自語般地唸著一句德文：「Toten marsch, Toten marsch, einen Toten marsch marsch (death marching) ……」

「死亡行軍」的隊伍走到樺山車站以後，繩索被拿掉了。他們在那裡等待火車，如果要上廁所的話，也得銬在一起的兩個人一起去。接著，他們被推上一輛駛往基隆的貨車。一路上，車廂裡的氣氛都很沉重。到了基隆碼頭，天已經亮了。他們仍然兩個兩個登上一艘二戰時美軍載運坦克的登陸艇（簡稱LST），然後進入長久沒用、充滿鐵鏽味的底艙；一對一對地躺下來。

「那時候，」蘇友鵬醫師說：「我忽然想起電影《賓漢》裡，賓漢被羅馬人囚禁的奴隸船……。」

熬過兩天一夜飢渴不眠、疲憊不堪的「死亡行軍」後，船，終於到了火燒島南寮港灣。下了船，蘇友鵬醫師和其他難友們，又繼續走向名為「綠島新生訓導處」的集中營。

綠島醫生

如果就字面意義來講，「綠島新生訓導處」應該是讓這些政治犯獲得「新生」的地方；然而，它其實卻是針對這些「思想有問題」的政治犯進行「勞動改造」的一所集中營。跟其他難友一樣，蘇友鵬醫師不但要接受那些一點效果也沒有的反共教育，而且也要從事諸如上山砍柴、海邊挑石等各種各樣的體力勞動。

對秀才出身，從來沒有做過粗活的蘇友鵬醫師來說，這種「勞動改造」的生活，當然是不好受的。

「有一次，天下著雨，我們這些政治犯還是被派去上山砍柴；」蘇友鵬醫師說了一段實際的經驗。「儘管天雨路滑，我們還是得把規定數量的柴扛下山；由於路實在很不好走，我跟其他難友只好一路『滾』下來……。」

醫務所成立後，每個星期，蘇友鵬醫師只要二、四、六參與勞動，其他三天就到醫務所值班看診。

「綠島新生訓導處」原來有一間醫務室，但是裡頭既沒有什麼醫藥，更沒有什麼開刀的設備；萬一有人因為盲腸炎而引發腹膜炎的話，也只能躺在那裡等死。由於這一批政治犯裡頭除了蘇友

鵬醫師之外還包括許多醫生，如胡鑫麟（眼科）、胡寶珍（皮膚科）、林恩魁（外科）、王荊樹（婦產科）、呂水閣、高鈺鐘等十位；所以，他們這十位醫師就成立了一個醫療自救會，將每個政治犯家人寄來的醫藥集中在醫務室，由各隊自行保管。後來，新生訓導處終於成立了一個設備克難的醫務所，交由胡鑫麟醫師負責主持，蘇友鵬醫師和其他醫師也輪流值班。這個由政治犯組成的簡陋的醫務所，不但要照顧兩、三千名訓導處官兵和「新生」的健康；到後來，連火燒島的住民，也都由他們負責看診。

未完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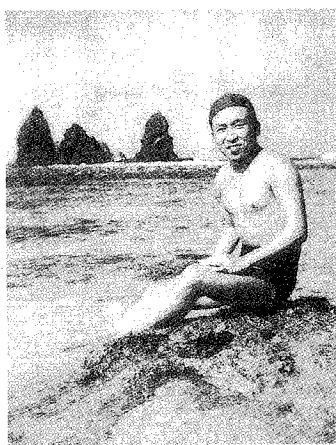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蘇友鵬醫師服滿十年的刑期後，又與胡鑫麟醫師一起，搭船回台灣本島。然後，在高雄永安鄉，跟在衛生所任助產士的母親，過了一段難得的平靜日子。

同年八月，蘇友鵬醫師在台大醫學院的耳鼻喉老師杜詩綿教授做保下，回到台大醫院服務。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卅六歲的蘇友鵬，通過難友劉明和辜顏碧霞的共同做媒，結了婚。他原來打算在台大醫院待個兩三年，就回台南家鄉開業。但是，因為當時鐵路醫院很缺醫生，他於是又在當時在調查局當法醫的前輩蕭道應醫師和杜詩綿教授的共同做保下，進入鐵路醫院耳鼻喉科服務。可他怎麼也沒想到，他這樣一待就是三十幾年，而且還以公務員的身分退休。

出獄以後的蘇友鵬醫師，儘管在學長和老師的幫忙下，得以相對順利地解決了就業的問題；然而，他也像其他出獄的政治犯一般，仍然隨時有再度入獄的危機存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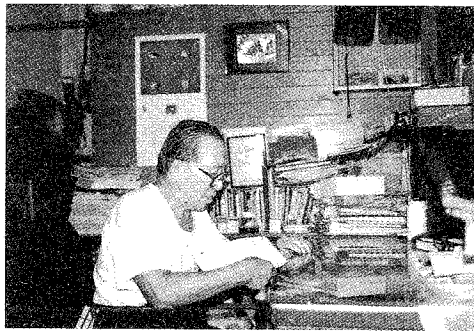
蘇友鵬（中）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克難開刀房，為難友剷除發炎的盲腸。（蘇友鵬／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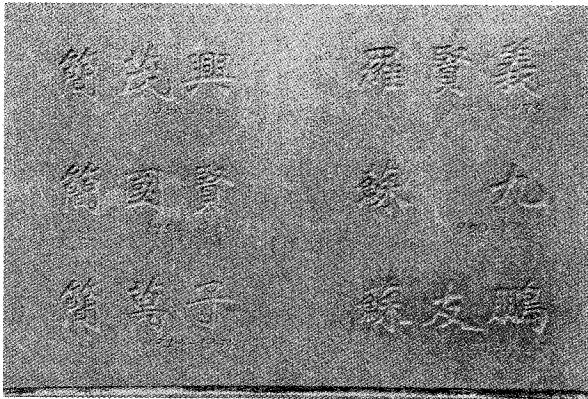
在綠島，利用午休到海邊游泳的蘇友鵬。（蘇友鵬／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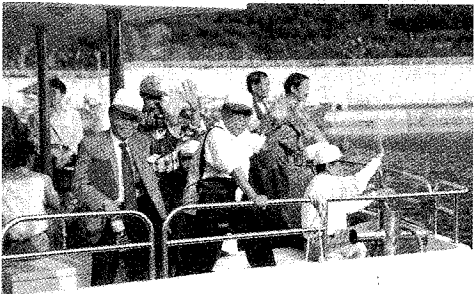
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中秋晚會，蘇友鵬在難友李錦榮的吉他伴奏下，拉小提琴自娛娛人。（蘇友鵬／提供）



1997年8月15日，蘇友鵬在廈門街家裡。（藍博洲／攝）



綠島人權紀念碑上刻著蘇友鵬的名字。（藍博洲／攝）



1997年10月23日，蘇友鵬（前排右）與難友重遊綠島。（藍博洲／攝）

一九七二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第二七五八號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當時，美國的《Time》雜誌做了大篇幅的專題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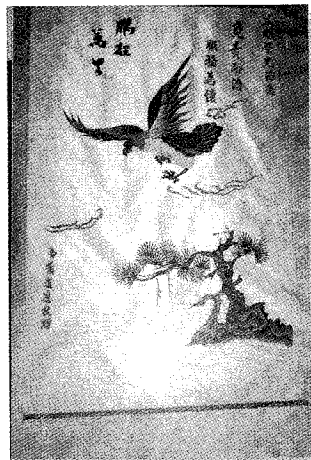
有一天，一個叫黃紀男的台獨派政治犯到公保醫院看病，並且拿了一本報導中共進入聯合國的《Time》雜誌，硬是要留給蘇友鵬醫師看。三個月後的某天早上，八、九點左右，兩名便衣特務突然來到鐵路醫院，把正在看診的蘇醫師強行押到調查局。

蘇友鵬醫師並不知道黃紀男為何被捕？由於有過被秘密逮捕的經驗，所以那些特務要把他帶走的時候，他就匆匆忙忙地請耳鼻喉科的楊主任通知他太太，並且要她通知在調查局當法醫的蕭道應學長，請他幫忙。

蘇友鵬醫師被帶到調查局後隨即展開秘密審問。他們先問蘇友鵬醫師，他與黃紀男的關係？然後又問，黃紀男拿什麼書給他看？蘇醫師對特務的每個問題都據實回答。也許是因為蕭道應醫師的幫忙吧，經過一天的疲勞審問之後，蘇友鵬醫師終於避過第二次牢獄之災，在半夜兩三點的時候被釋放回家。

回家以後，精神上飽受打擊的蘇友鵬醫師，立刻把家裡所有的外國雜誌，所有關於思想、哲學的書以及信件，統統放火燒掉；一直燒到早上七、八點……。

從此以後，蘇友鵬醫師在有人二十四小時監控的鐵路醫院，就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一直要



蘇友鵬出獄後，進入鐵路醫院服務。蕭道應送了一幅書幀誌賀。（藍博洲／攝）

到一九八〇年，他第一次獲准出國，到日本東京參加日本中央鐵道醫院的落成典禮以後，長期籠罩著他的那張看不見的白色恐怖的羅網，也才逐漸隨著歷史的前進而隱逝。

這幾年，退休了的蘇友鵬醫師習慣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聽著古典音樂，讓自己入睡。在悠揚的樂聲中，他總是會想到已經犧牲多年的許強、郭琇琮、吳思漢、王耀勳等等年輕時代的師友。

「每當想到他們的時候，我都曾告訴自己：那美好的仗，他們已經打過了；」蘇友鵬醫師說。「然而，他們沒走完的路，我們一定要繼續向前走……。」

——二〇〇一年一月

我對貧窮的聲音特別敏感！

胡寶珍

醫師

一九二四～



根據有關「郭琇琮案」的官方檔案所載，胡寶珍，一九二四年生，原台大醫院皮膚科醫師，一九五〇年五月被捕，處刑十年。

爲了進一步理解所謂「郭琇琮案」的案情，以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面貌，長久以來，我一直四處尋訪相關「涉案者」的歷史證言。胡寶珍醫師就是其中一人。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藉著林書揚先生返鄉探親之便，我從台北趕到台南麻豆，跟林先生會合；然後在太陽落入遠方的地平線之前，驅車趕往新營。當夜色降臨的時候，我們終於在離新營火車站不遠處的中山路上，找到胡寶珍醫師的那家小診所。當天晚上，在胡寶珍醫師的難友，也是他日據時期州立台南二中學弟林書揚先生的引介下，我終於在胡醫師的診所，就他個人的生命史，做了初步的採訪。

貧窮的聲音

在成長的過程中，每個人總有讓他印象特別深刻的童年往事。在胡寶珍醫師的記憶裡，他一直記得的卻是一種因爲生活的貧窮而發出來的聲音。

因爲父親是嘉義人，胡寶珍醫師的本籍是嘉義，可他的生活卻和嘉義一點關係都沒有；由於母親是台南人，一九二四年，他出生於台南市，並且在台南市長大。

胡寶珍醫師的父親是日據時代地方的基層公務員，可他成天花天酒地，從來不管家裡的事；因爲這樣，家裡的經濟環境十分貧窮。小時候，天要亮未亮的每天清晨，母親就已經起床，淘米

煮稀飯；身爲家裡三兄弟老大的胡寶珍，經常在半睡半醒之間，聽到量米容器碰觸米缸而發出的刮聲；這時，他就不由得感到難過，心想：「家裡又沒有米了！」

長久以來，這種因爲窮而發出來的聲音，一直留給少年胡寶珍強烈而沉痛的記憶。也因此，他後來便對貧窮問題特別敏感。出獄以後，有一天中午，他到學校去接念國民小學的小孩；當時，教室裡的學生都在吃便當，他不經意地看到，一個女孩獨自躲在走廊的一角，一邊用便當蓋遮掩著飯盒裡的菜，一邊站在那裡吃著。因爲自己是貧窮家庭出身的人，目睹那種熟悉的情景，他當場就難過地掉下淚來。後來，他只要跟人家說起這事，還是忍不住就要落下眼淚。

殖民地的知識菁英

公學校畢業後，少年胡寶珍很幸運地考上州立台南二中（第十七屆）。就讀台南二中期間，他親自體會到殖民地教育政策的不平等待遇；同時，常常因爲民族意識的覺醒，而跟就讀南一中的日本學生打群架。儘管如此，胡寶珍當時在校的成績，雖然不是頂好，卻也相當不錯。

當時，一般中等學校規定要修業五年；但是，只要修完四年級，也可以跳級參加台北高等學校和台北帝大預科的人學考試。在日據台灣，這兩所學校是專爲升大學而設的預備學校。

台北高等學校創立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台北帝大預科則於一九四一年四月成立。這兩所學校跟一般學校比較起來，有幾個特殊的地方：第一，學校的設備充實，教師的地位崇高（稱教授及助教授）。第二，注重外國語文的訓練，除了日語、漢文以外，還設有第一和第二外國語。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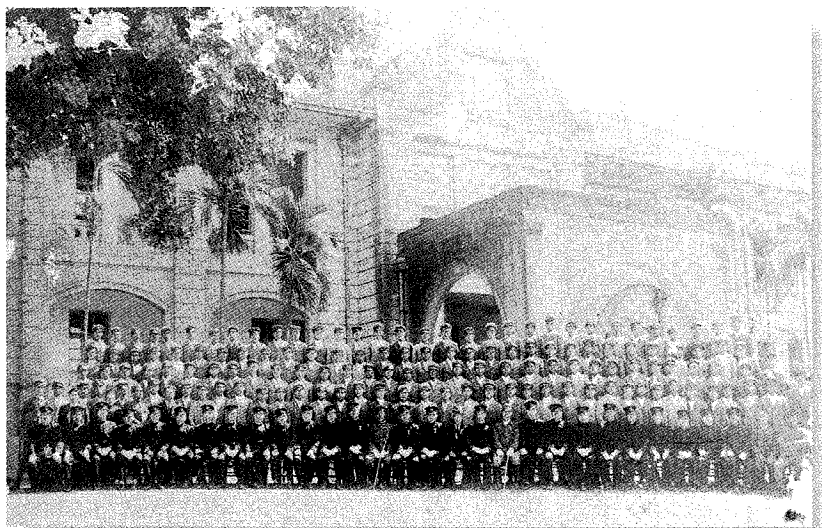
是學校成績並不特別突出的胡寶珍。

出乎大家意料，這個再次為台南鄉親爭光的人，卻是學生當中又有一個學生越級考上台北帝大預科。因此，胡寶珍對吳調和這個名字的印象，也特別深刻。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台南二中第十七屆學生中又有一個學生越級考上台北帝大預科。

一九四一年，台南二中第十六屆學生，有一名台南白河籍的吳調和（後來改名吳思漢），就是在修畢四年級時越級考上台北高等學校，造成轟動。

數又少數的台灣學生才能夠倖而進入。據日本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度的統計，台北高等學校和台北帝大預科的學生，一共是一千一百零三人，其中日本學生九百五十四人，其他五人，台灣學生只有一百四十四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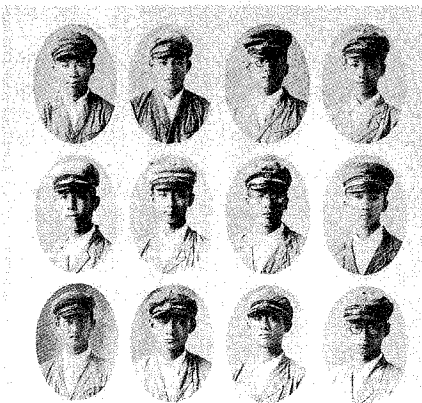
考生事先需經過保送審查的程序，不是高材生，根本就沒有勇氣前往一試；同時，入學考試又極其嚴格；所以，錄取學生的水準相當高。第四，對於錄取名額的規定極為硬性，絕不寬濫。因為這樣，再加上日本帝國民族歧視的教育政策的限制，只有少數又少數的台灣學生才能夠倖而進入。據日本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度的統計，台北高等學校和台北帝大預科的學生，一共是一千一百零三人，其中日本學生九百五十四人，其他五人，台灣學生只有一百四十四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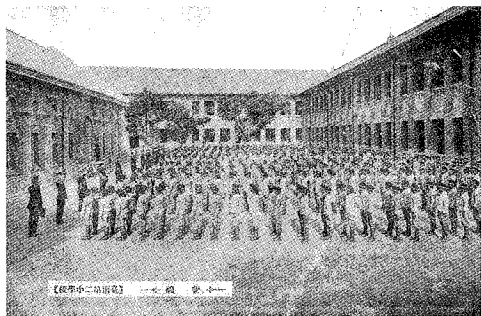
台南二中學生畢業紀念照。1942年，胡寶珍越級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預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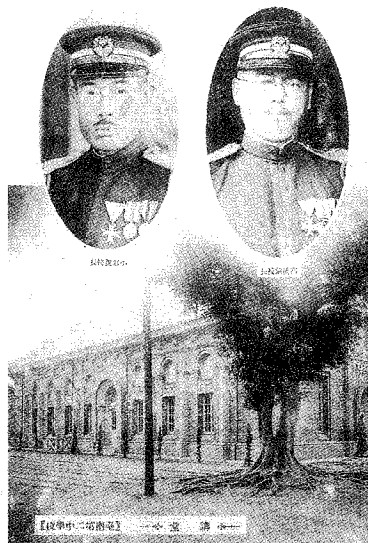
台南二中學生上課情景。



日據台南二中的學生群像及校園情景。



公學校畢業後，胡寶珍考進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今台南一中）。



台南二中第一任校長高橋隆（右），第二任校長小形留吉（左），以及當時的講堂。

台北帝大預科分文、理兩科，理科又再分為農、工、醫三組；修業年限原定三年，因為戰爭的影響，後來就改為二年。因此，青年胡寶珍在帝大預科理科醫組的學習期間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

兩種世界觀

台北帝大預科的校址位於士林芝山巖。胡寶珍上台北之後，在很偶然的情況下，在士林街上有一個教會附近租房子住。當時，士林街上有個叫「協志會」的青年團體，經常在教會搞一些合唱團和讀書會的活動。其中，合唱團由陳泗治牧師指導。因為環境的關係，胡寶珍也常到教會的合唱團走動；這樣，原本對音樂一竅不通的他，唱著唱著，也就和合唱團團員以及陳泗治牧師，彼此熟識起來了。

一九一一年，陳泗治牧師生於士林；一九二三年進入淡水中學就讀，並在音樂上開始受教於「台灣教會音樂之母」吳威廉牧師娘；淡水中學畢業兩年後的一九三〇年，進入台北神學校，並受教於加拿大籍德明利教士，奠定了扎實的鋼琴演奏基礎；一九三四年，神學校畢業後，再赴日本東京神學大學深造，同年暑假，參加了旅日的音樂學生組成的「鄉土訪問音樂團」，巡迴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等七個城市公演。一九三六年，廿五歲的陳泗治於東京神學大學畢業後返台。

胡寶珍並不知道，陳泗治牧師的音樂造詣，在當時可算是台北第一。因為跟陳泗治牧師相處久了，後來，胡寶珍對音樂也愈來愈有興趣，於是就跟著他學彈鋼琴。這樣，在音樂方面，胡寶珍也變得內行起來了。另一方面，因為常常聽陳泗治牧師證道的關係，胡寶珍的思想也受到影響而起了很大的變化。

在思想上，還有一個影響胡寶珍更大的人，那就是協志會會長何斌。

何斌（一九一八～一九八八），也是士林人；一九三二年四月，考入台北二中第十屆，一九三六年三月畢業後，考入台北高等學校第十二屆，理科乙班，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畢業；畢業後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第四屆就讀，一九四二年九月畢業後，進入帝大附屬醫院皮膚科服務。

台灣光復後，胡寶珍會在醫學院畢業後選擇皮膚科，主要就是受到何斌的影響。

起初，胡寶珍參加的協志會讀書會，主要讀的大多是日文的醫學方面的書籍；後來，在何斌的領導下，才慢慢地讀起哲學、唯物辯證法等合法且公開販賣的思想性的書。由於童年以來深刻感受到的貧窮經驗，漸漸地，胡寶珍也對這些探索社會正義的書讀出了興趣；他的思想傾向也自然地由基督教的唯心史觀轉為所謂的唯物史觀。

因為這樣，那時候，胡寶珍幾乎每晚都要和陳泗治牧師辯論基督教教義的問題。最後，陳泗治牧師在無力改變胡寶珍對



胡寶珍在帝大預科求學時認識了音樂家陳泗治牧師。（黃辛潘／提供）

世界認識的情況下，只好無奈地對他說：「我沒辦法讓你信教了！」

儘管，胡寶珍始終沒有信教，可他還是受到基督教義人道關懷的精神影響。因為這樣的胸懷，後來他在台大醫院皮膚科任職醫師時，對病人總是很很有愛心；也因此，那些跟他一起工作的護士們便暱稱他為「基督教患者」。

一九九二年，陳泗治以八十二高齡辭世。在此之前，胡寶珍醫師聽說，陳牧師晚年的思想比較傾向「台獨」，他想，那可能因為他是長老教會的成員，才會讓他有這樣的傾向吧！至少，在當時他是不覺得的。他還記得，一九四六年，台灣光復周年紀念時，陳牧師還特地為一首〈台灣光復紀念歌〉（陳波作詞）譜曲呢！他記得，那首〈台灣光復紀念歌〉的歌詞是說：「張燈結綵喜洋洋，勝利歌兒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莊，台灣光復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國家恩惠情深長，不能忘……」他想，如果陳牧師當時的身分認同果真像人們所說的晚年那樣的話，他就不可能為這樣的歌譜曲的。

因為世界觀的不同，在「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客觀限制下，後來，胡寶珍也就漸漸與陳牧師疏遠了。

在這方面，胡寶珍認為，何斌就與陳泗治完全不同。在胡寶珍的印象中，何斌是一個徹底的大中國思想信仰者；他從來不會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光談台灣人什麼什麼的……。也因為這樣，何斌在二二八事件後的一九四七年夏天，前往大陸，參加劉伯承和鄧小平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事醫務工作。他聽說，何斌後來在擔任西南軍區抗癩總隊副隊長時，收集了大量的數據和資料，為雲南地區克服山嵐瘴氣，控制瘧疾的流行，作出了貢獻；後來，他還擔任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副所長，成為我國著名的流行病學專家。

歡迎祖國軍

一九四四年四月，在戰爭的笳鼓聲中，胡寶珍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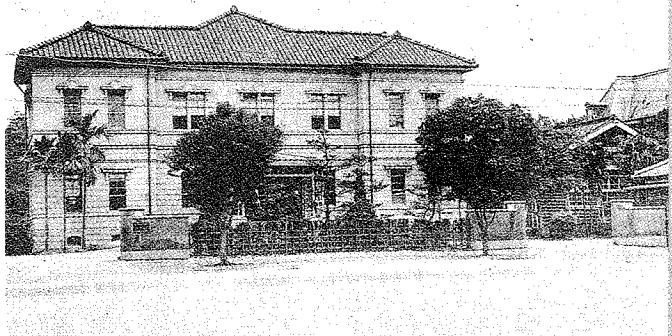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台灣重歸中國。

十月十七日，國軍第七十軍及長官公署官員分乘四十餘



▲1947年夏天，何斌（左）到大陸參加解放軍，一生為軍事醫學科學奮鬥。

▲協志會會長何斌（左二）與家人下棋。



台北帝大醫學部成立時一景。

艘美軍艦艇，抵達基隆。長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欺壓迫害的台灣民眾，對祖國軍隊的到來期待已久，聽到消息後，立刻箆食壺漿，前往各重要路口，夾道迎接。台北火車站前也聚集了許多學生隊伍，其中站在最前頭的便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接著才是高中和初中的學生隊伍。胡寶珍站在台大醫學院學生隊伍的最前頭。這時候，他看到，從基隆開來的火車已經緩緩進入台北車站了；在車站廣場夾道歡迎的民眾，開始大聲唱著剛剛學會不久的〈歡迎歌〉：

台灣今日慶昇平，
仰首青天白日清。
哈哈，到處歡聲；
哈哈，到處歡聲；
六百萬民同快樂，
壺漿箆食表歡迎！

不久，胡寶珍看到前來接收的祖國軍隊了，他們一個個爭先恐後地下了車；然後，人們終於看到一個個挑著鍋子、食器，背著雨傘、被褥的國軍了……。突然之間，歌聲停了下來，一種奇異、失望的沉悶氣氛籠罩在廣場的上空。胡寶珍聽到周遭輕聲的竊竊私語：「他們為什麼都背著一把紙傘呢？他們一個個看起來都那麼面黃肌瘦，可是為什麼還要挑那麼多行李呢？……」顯然，因為心情的反差太大，一時之間，人們還很難接受眼前所見的事實。

目睹這一切，胡寶珍雖然也感到納悶，仍然努力壓抑著自己的質疑，盡力為國軍設想，並努力想要說服其他民眾說：「就是因為經過了八年的辛苦抗戰，祖國的軍隊才會穿得這麼寒酸……。」

白白領了獎學金

台灣光復後，台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大學。這樣，胡寶珍的身分立刻變成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二屆學生。因為改制，他首先要面對註冊費繳交的問題。從前，在台北帝大時期，採取的是先上課後註冊的方式；他雖然沒錢註冊，也可拖欠，而且學校方面也不會向他催討一直拖欠著的註冊費。這樣，他雖然經常沒錢理髮，或鞋子破了時要靠同學接濟，他還勉強可以靠著家裡寄來的生活費生活。可學校改制為國立台灣大學後，註冊方式也同時改為先繳費再上課了。這樣，胡寶珍首先就碰到繳不出註冊費的難題。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胡寶珍聽說，學校有提供獎學金讓學生申請；可與此同時，又有消息傳說，凡是請領獎學金的學生，畢業後要當軍醫。因為這樣，他們班五十個人卻只有兩人申請，其中一人就是他。他當時想，如果我不申請獎學金的話，我就繳不出學費！為了念畢業，就先別管以後當不當軍醫了。他於是勉強自己去申請獎學金。可他沒想到，後來竟然不必去當軍醫，反倒是白白領了獎學金。

由於醫學院的課業很重，上午，從八點開始，一直上課到十二點；中午休息一個鐘頭，下午一點又開始上課，一直要上到下午五點才下課。這段期間，胡寶珍也沒有太多時間閱讀課外讀物，更談不上參與太多課外活動；因此，他對社會上日漸高漲的不滿之聲，也要聽了其他人講之後，才略知一二。

因為這樣，當「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胡寶珍始終都沒怎麼參與。

事件初起時，胡寶珍聽到有些民眾在街頭巷尾亂打外省人的消息，心裡便感到難過。他不認為，所有的外省人都是該打的「貪官污吏」；至少，他在醫學院所接觸的省外教授的言論，大都令他感到欽佩；像是教他衛生學的一位學者就是典型。不過，他們不久就回大陸去了。

後來，士林地區的槍聲不斷。胡寶珍聽說，國軍只要看到年輕男子在路上走動，就會開槍，將他打死。因此，他就在士林圓環何斌家的閣樓上，整整躲了一、兩個禮拜，不敢下樓。這段期間，還好有陳泗治牧師不畏驚險，天天為他送便當。

事件過後，學校恢復上課。

胡寶珍聽說，只要一回學校就會被抓走？他因此有點猶豫。然而，如果不去上課的話，就得先辦休學，否則學籍會被取消。他想，只要辦了休學，那就不言自明地向校方表示：自己「有問題」。因此，幾經考慮，他還是決定趕快回去上課。

皮膚科醫師

一九四八年，胡寶珍終於平安無事地完成學業，成為台大醫學院第二屆畢業生。畢業後，他一方面留校擔任助教，同時也在台大醫院皮膚科當無給職的醫師。當時，台大醫院有輪流值班的制度，而值班醫師供應膳宿；他於是通過每天幫人值班，來解決基本的吃住問題。

由於台大醫院的醫生員額編制有限，所以胡寶珍醫師的待遇問題一直沒有改善。在這樣的困苦狀況下，他只能靠兼差所得來補貼生活。當時，通過朋友的介紹，他分別到馬偕醫院和開南商工兼差；在開南，主要是教初中數學與高中代數。後來，他終於成為台大醫院第一批有給職的住院醫師之一，每個月月薪一百元舊台幣；在當時，這樣的待遇算是相當不錯了。他於是停掉馬偕和開南的兼差。



1949年的台大醫院掛號處。

郭琇琮與吳思漢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平常過去。

大概是一九四九年年底，或是一九五〇年年初吧！有一天，一個曾經擔任台大醫學院助教，叫做郭琇琮的學長，就像平常一般，來找胡寶珍醫師聊聊。

日據末期，胡寶珍在士林參加協志會的活動時就認識郭琇琮了。後來，因為郭琇琮搞反日組織而被關在牢裡頭，所以，胡寶珍跟他並不太熟識。胡寶珍並不知道，郭琇琮究竟是什麼時候參加「協志會」的。他只知道，郭琇琮的家就在教會附近，想來就來，很方便。協志會的人也替他介紹過。光復後，胡寶珍才在協志會的活動經常見到他。當時，胡寶珍念大二，郭琇琮卻已經畢業了。由於郭琇琮比胡寶珍大三、四屆，所以，兩人也沒有什麼密切的來往。他記得，有一次，郭琇琮在新公園音樂台搞一個教唱跳舞的活動，特地找他去彈琴；這算是他們之間唯一一次比較緊密的接觸吧。因為這樣，胡寶珍認為，郭琇琮的言論比較不像何斌那樣引起他的注意，對他的影響也沒那麼大。

那天，郭琇琮來找胡寶珍醫師以後，又突然不見了。在此之前，他也常來找胡寶珍隨便聊聊，所以，胡寶珍也不覺得有什麼異常。但是，幾天後，卻換了一個叫吳思漢的人來找胡寶珍。胡寶珍一見到這個人，馬上就認出他就是以前台南二中的學長吳調和。

在南二中，吳調和高胡寶珍一屆，並且是修完四年的學業就越級考上台北高等學校的資優

生。光復那年，胡寶珍看到《台灣新生報》連載他以〈尋找祖國三千里〉為題的文章，知道他後來到京都帝大念醫學，爲了對祖國的抗日戰爭奉獻一己之力，卻毅然放棄醫學部的學業，改名吳思漢，獨自從日本經朝鮮半島，越過鴨綠江，進入中國大陸，一路尋找到重慶的……。

從南二中時代起，胡寶珍醫師就非常尊敬、崇拜吳思漢。因為這樣，他對吳思漢的來訪，感到特別高興。吳思漢告訴胡寶珍，他是通過郭琇琮牽線才來找他的。但是，吳思漢只和胡寶珍接觸過一、兩次而已；每次見面，也沒有說些什麼，就只是話家常而已！就在胡寶珍醫師期待著吳思漢再來找他的時候，他卻莫名其妙地在台大醫院被捕了。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下午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下午，胡寶珍醫師正在台大皮膚科診療室看病的時候，突然院長室派了人來叫：「胡醫師，院長有事找你！」

「天底下哪有這回事？」胡寶珍醫師覺得莫名其妙。「院長應該知道，這時候，我一定在看診，找我做什麼？不可能的嘛！」儘管如此，他還是把病人處理好，洗了手，衣服也來不及換，就往院長室走去。到了院長室，他看到裡頭已經有十個人左右在那裡等他；其中一個是他台南二中同學、台大醫學院學弟——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另



1950年5月13日，胡寶珍在台大醫院被捕，當時的院長魏火曜。

外，第三內科主任許強副教授和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也在座。其他五、六個，都是他不認識的人。

爲了要等第一內科主任翁廷俊醫師，胡寶珍醫師和另外三名先到的同事，在院長室又再等了一個多鐘頭；可翁廷俊醫師遲遲沒有出現，他們四人於是被押出院長室。胡寶珍醫師和許強副教授，蘇友鵬和胡鑫麟醫師，分別扣在一起，一前一後，然後被押上停在醫院門口的吉普車……。

「我和許強醫師、胡鑫麟醫師及蘇友鵬醫師，一點組織關係都沒有；可是，我們怎麼會一起被抓呢？」胡寶珍醫師一直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爲怎樣的關係被捕的。「照理說，我和郭琇琮比較熟；可那一天，郭琇琮來找我，也沒說什麼特別的話呀！……他也許有人黨？可他找我，並沒有要我入黨，就只是談談話而已！這樣，我只能說是被他牽連的吧！」

在保密局南所

胡寶珍和許強、胡鑫麟、蘇友鵬等四位醫師從台大醫院被押送到今總統府後面的保密局南所以後，四人就被分開羈押。胡寶珍被關在一間原本是單人的牢房，可他進去的時候，數了數，裡頭卻已經關了十三個人；他們只能像沙丁魚罐頭那樣，一個擠一個才能睡覺。後來，他也大致了解了同房難友的身分，他們包括：官拜陸軍中將的原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槍決），台糖案的史國英（處刑十五年），台電總經理劉晉鈺（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槍決），以及新竹市警察局長許振庠、台中縣警察局長何顯與林英傑、吳彬泉、王宇光等五名警界的難友（五人皆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廿一日槍決），另外還有幾個牽連孫立人案的軍官與淳樸的農民、工人。由於每個人都背負著自己不能爲外人道的案情，在判決沒有確定以前，押房裡頭的氣氛非常沉悶，彼此之間，也不太多話。

胡寶珍醫師在保密局南所關了一、兩個月。這段期間，他才接受過一次偵訊，也沒有受到什麼刑求。胡寶珍認爲，這個，一方面是因爲被抓進來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們根本沒有時間一個一個偵訊；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他是被牽連的人，並不是什麼核心人物，所以他們也就不需要特別對他刑求逼供。

鄉愁

胡寶珍醫師然後又被移送到位於台北橋頭附近的高砂鐵工廠，也就是保密局北所。在北所，胡寶珍醫師關押的押房比南所的大，不過，一個房間也關了二、三十個人。這段期間，他的心情也比較穩定了，於是決心開始學習一些東西。從前，他一句國語也不會說，看診時，有時要問病人「痛無痛？」卻因爲他的發音不標準，病人卻往往聽成「通不通？」因此而產生許多不必要的誤解。因爲這樣，他就跟一個原是中學老師的外省籍難友學講國語。後來，他又開始練習用中文寫作，並且寫了一篇〈我的故鄉〉，受到同房難友的稱讚。

「其實，那時候還年輕，」胡寶珍醫師對年輕時候的心境作了客觀的評價。「離家也還不太久，所以，對鄉愁的體會並不深刻；因此，對故鄉也就無法準確描寫。一直要到離開火燒島，回

到故鄉，忍不住流下眼淚時，我才真正體會到故鄉的意義。」

龍蛇雜處的軍法處押房

在保密局北所關押了一段期間以後，胡寶珍醫師又再被移送至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等待判決。

軍法處的押房一樣每間關二、三十人，擠得不得了。然而，有一點不同的就是，這裡的押房可以說是龍蛇雜處——像胡寶珍醫師這樣的政治犯也和殺人犯什麼的關在一起，不再只是政治犯單獨關在一起了。胡寶珍醫師算是在這裡才真正看到殺人犯。在印象中，他總覺得這些人應該長得像是凶神惡煞一般；可事實卻不是這樣。至少，與他同房的那些殺人犯，個個都顯得瘦削，因為不太講話，所以就有點憂鬱的氣質。相反地，那些犯了強姦或偷盜罪的雜犯，反而來得更像凶神惡煞。儘管如此，這些人一碰到思想犯，即便是押房裡頭的流氓頭，都會對他們豎起大拇指，敬重七分。對這些社會邊緣人來說，他們永遠也搞不懂，為什麼這些有學問、人品又好的讀書人，會像他們一樣被抓進來關呢？

這段期間，胡寶珍醫師有機會跟同時被捕的許強醫師，同房一段時日。與此同時，他也得知，郭琇琮就關在隔壁房。這樣，他就不再感到他的囚人生活是那麼孤單、寂寞。

許強曾經安慰胡寶珍說：「上頭只供出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人都沒有供出來！」可胡寶珍認為，上頭的人會「供出」一小部分的名單，其實也是不得已的！他想，「我之所以會被列入其

中，主要也是因為我完全沒有介入他們的組織生活，對他們的組織也都不了解。所以，對我，對組織，或對其他相關的人，影響都不會太大的。」

覺悟

「其實，我並沒有參加他們的組織，只是接受那樣的思想而已！」多年以後，胡寶珍醫師仍然強調：「何況，被抓以後，你要是說你沒有參加什麼組織，他們也不會相信；你又能怎麼樣？再說，社會主義的思想，在當時的台灣社會是很普遍的。就像我南二中的同學葉石濤，在一本小說中所寫的那樣：當時的台灣青年，如果沒有被抓進去的話，就會覺得自己好像不夠進步……。也就是說，追求社會正義的思想就是當時社會的風氣嘛！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也因此，我對自己的牢獄之災並不覺得有什麼遺憾，有什麼怨嘆的！」

韓戰以後，軍法處幾乎每天都有人被叫出去槍決。

按照〈懲治叛亂條例〉的規定，如果被捕者只是承認參加組織而已，「罪」還不至於死；可是，如果你不但參加組織，而且還有吸收他人加入組織的話，那就只能被槍斃掉了。

那時候，只要當天有槍決，大概都是清晨四點半來開門。因此，每天清晨，只要聽到鐵門聲一響，胡寶珍醫師和其他難友就知道：今天，又有人要被槍斃了；然而，是誰？在看守點名之前，就不得而知了。因為這樣，每天清晨，大家總是心情沉重地等待點名時刻。

因為天天目睹著難友們一去無回的事實，這時候，胡寶珍醫師對自己的未來也已經有所覺悟

了；他想，以他的案情來說，如果不是被槍決的話，至少也要關個十年以上吧！因為這樣，單身的他，除了牽掛家裡的老母親之外，也就看開了；他不至於像一些有家累的難友那樣，心情總是反覆不定。

判決

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判決郭琇琮、許強、吳思漢等同案「主犯」共十五人死刑；其他「從犯」卅七人，分別判處十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九月廿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根據鄭有齡的「判決」內容，由書記官石璞擬就「(39)安潔字第二二〇三號判決書」，報奉國防部審核；十一月廿五日，國防部以「(39)勤助字第一〇三九號代電」，核定軍法處的處決。

十一月廿八日清晨，胡寶珍醫師先是看到看守打開自己那房的鐵門，一陣鏗鏗的響聲後，隨即聽到看守喊道：「許強，出來！」胡寶珍含著眼淚，看著許強先生站了起來，走到自己的身邊，用手拍拍他的肩膀，向他說了一聲：「再見！」然後從容地走了出去。

長大以來不會流過淚的胡寶珍醫師，望著許強先生漸行漸遠的背影，眼淚卻汨汨地流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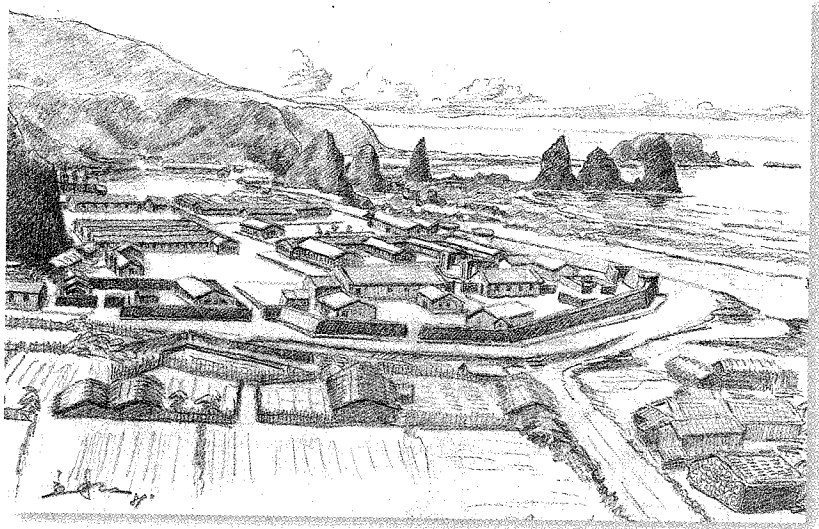
當天下午，胡寶珍醫師連同其他倖免於死的同案，也被帶出去，聆聽「宣判」。儘管保安司令部做出二個「法庭」的形式，可是整個判決過程只是由軍法官按照「判決書」，照稿宣讀而已；

「法庭」上既沒有辯護律師，更沒有任何人旁聽……。胡寶珍醫師聽到，他被指控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七月」，「參加叛亂之組織」；但是，因為「查無其他活動之表現」，而「依法處以較輕之刑」——有期徒刑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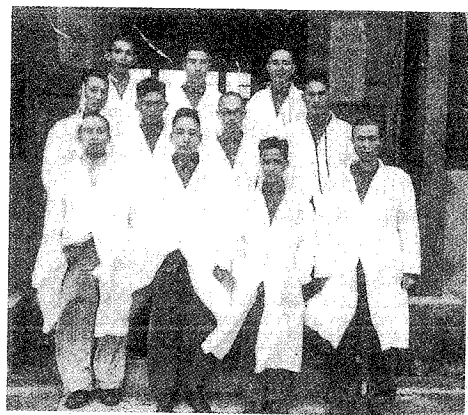
在綠島

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批政治犯被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胡寶珍醫師也跟隨其他難友，一起到了夙有「火燒島」之稱的綠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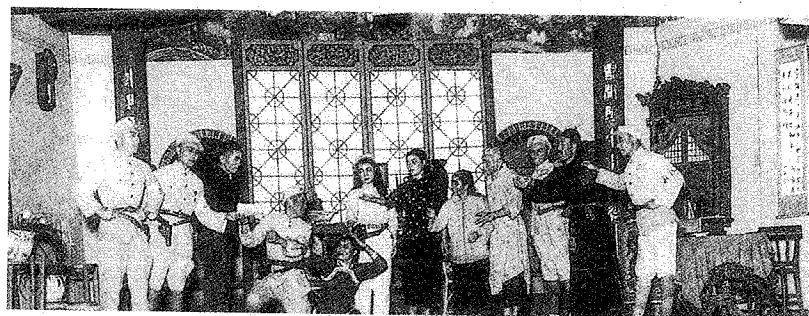
剛到綠島的第一年，醫師出身的胡寶珍便被派到缺乏醫生的醫務所服務；第二年，他才跟其他難友一樣，過著「勞動改造」與「思想改造」的新生生活。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他，跟著其他工人、農民出身的難友，一起勞動，也一起學習。他記得，當時，最受大家歡迎的課是一個叫做洪國式的教官講授的「蘇俄侵華史」。洪國式



1951年5月，處刑十年的胡寶珍醫師跟隨第一批政治犯移監綠島集中營。圖為集中營舊貌。（陳孟和／繪）



1958年1月16日，綠島新生訓導處醫師出身的政治犯——胡寶珍（前排右一）、蘇友鵬（前排左一）及胡鑫麟（二排右二）等——組成醫療隊。（胡寶珍／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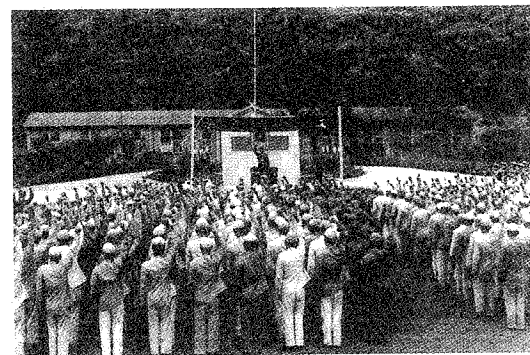
胡寶珍在綠島時，經常參加新生康樂會的活動，在戲劇演出時跑龍套。圖為綠島新生生活劇演出一景。（取自台灣省文獻會編《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



綠島新生訓導處政治犯們組成的克難樂隊；胡寶珍（前左三）充當小喇叭手，蘇友鵬（前左一）則是小提琴手。（曾文華先生／提供，藍博洲／翻拍）



剛到綠島的第一年，胡寶珍被派到醫務所服務。圖為綠島新生訓導處醫務所克難進行開刀手術的情形。（蘇友鵬醫師／提供）



綠島集中營「改造」政治思想犯一景。（陳孟和／提供，藍博洲／翻拍）



綠島新生訓導處在海灘受訓的情景。（取自台灣省文獻會編《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

上課根本不用課本，從頭到尾，侃侃而談；到最後，才應付說些反共八股的口號。按照當局的說法，洪國式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潛台負責人」，被捕以後被派到綠島來「改造」這些「思想犯」。

除了勞動和學習，胡寶珍醫師也經常參與新生康樂會的活動。為人隨和的他，經常被叫去演戲；不管是歌仔戲或是京戲，他都下場跑過龍套。另外，因為看得懂五線譜，他理所當然地也得參加新生組成的合唱團與樂隊……。

時間就這樣既漫漫又快速地過去了。

胡寶珍醫師不知不覺就被整整關了十年。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他終於期滿開釋。

為貧窮的病人服務

從綠島回到台南縣仁德鄉母親當時的住處後，胡寶珍醫師立刻就前往警察局，辦理報到手續。然後，他在當地一家私人外科醫院找到工作。第二年，他跟回來後才認識的、在新營的銀行上班的女友結了婚。然後，他又轉到高雄一家私人外科醫院工作。又一年，胡寶珍醫師終於回到新營，自己開業。

這時候，管區警察又再來找他，要他每個月都要寫一篇報告，交給管區派出所。「胡醫師，」他們客氣地對胡寶珍醫師說：「我們這是奉命行事，請您多多包涵！您就隨便寫寫，應付應付，

只要有您的簽名就好了。……」

胡寶珍醫師就這樣寫了好長一段時間的生活報告。另外，一直要到戒嚴令解除以後，他的戶籍謄本上的政治犯的印記，也才被真正消除。

因為出身貧窮，胡寶珍醫師年輕時候自然會有信仰社會主義的傾向；出獄以後，他並沒有因為一場牢獄之災而改變他對人生的看法。長期受困於貧窮之苦的他，一直懷著感同身受的態度，對待病人，不忍讓他們受苦。也因為這樣，他的診所不但診療費比健保費還要低廉；對待一些窮困的病人，像是一些獨居的外省老兵，他甚至不收他們的診療費。同時，他知道這些遠離家鄉的老兵，心情總是寂寞、苦悶的；因此，他總會在看診的時候主動跟他們聊聊天，讓他們的心情能夠開朗一些。因為這樣，經常會有一些住在鄉下的病人，拿自己種的菜或水果來送他……。



1960年5月13日，胡寶珍刑滿開釋；在新營安靜地當個為病人服務的小鎮醫生。（藍博洲／攝）

總的來說，結婚以後，胡寶珍醫師才能夠開始過著正常的日子。長久以來，他都是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跟太太一起去打網球；吃過早餐後，準時在八點半開始看診。小時候，半睡半醒之間，聽到的貧窮的聲音；長大後，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以及五〇年代親身經歷的白色恐怖；這些人生體會，使得他對現實社會的「名」和「利」，無所追求。

「我只希望，我們這一代人曾經遭遇的歷史悲劇不要重演；」胡寶珍醫師語重心長地說。「至於『平反』或『補償』，我並不覺得是什麼要緊的事。我從小就對貧窮的聲音特別敏感。所以，我認為，要緊的是，能夠繼續發揮所學，為貧窮的病人服務；其他的事，都不是那麼重要的啊！」

注釋：

①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八九、九〇，台灣書店印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增訂再版。



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

許訂強

醫師

一九一三—一九五〇

有一個軍法官模樣的人，高高站在庭上，唸著，「某某人某某人判幾年。你們還有什麼話要說？」我問說，許強現在怎麼樣了。……法官說，「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

——胡鑫麟醫師證言

一九七三年六月，台北醫學院依照學習成績及學生志願，分發醫科七年級學生許達夫，前往三軍總醫院實習。然而，就在該生報到前一星期，三軍總醫院卻通知台北醫學院，拒絕接受該生到院實習。由於事出突然，學校當局無法另作安排，於是通知該生轉往一家私人小醫院實習。

許達夫接到學校通知後當然感到不解，於是趕往學校，向教務處理論。教務處的承辦人員在他強烈要求解釋的情況下，只好一邊出示三總的通知一邊告訴他說：「三總是因為你的身家調查有問題，所以才不讓你去實習的……。」

許達夫帶著一種莫名受辱的委屈，回到家裡，氣呼呼地質問母親：「我們家到底有過什麼不清白的事情？」他生平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家世問題，因此堅決要求母親劉順娣女士向他徹底解釋他所不了解的家族史。

劉順娣並沒有因此生氣，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安靜地走回房間，從保險櫃的角落，拿出一包顯然已經收藏許久而泛黃



1998年12月13日，許強八十五歲誕辰紀念日，許達夫（左）與三姐許須美，在台南市立醫院舉辦第一屆「許強醫師醫學講座」。（藍博洲／攝）

的信封袋，交給許達夫，說：「你自己看吧！」許達夫感到驚訝地隨手抽出信封袋裡頭的一疊資料，首先映入眼睛的竟是一份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的《新生報》；他看到那張發黃的舊報紙上頭醒目的標題寫著：

不法叛逆危害黨國

十四匪諜槍決

許達夫好奇地讀著那則新聞的內文：「朱毛匪幫潛台匪諜郭琇琮、吳思漢、許強……。」許達夫赫然看到父親許強的名字竟然也在裡頭，內心突然感到一股電擊般震撼。

「我的父親是匪諜！這是真的嗎？為什麼媽媽從來都沒有告訴我呢？……」

父親去世時，許達夫才一歲多，正在牙牙學語。對他而言，父親的形象一直是那麼地遙遠而陌生。可他懂事之後卻一直感覺到，父親的影子總是跟著他及他們全家人。因此，他懷著想要認識父親的強烈願望，要求母親向他訴說關於父親許強的歷史……①

佳里風大的農家子弟

許強，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於日據下台南廳北門區佳里街佳里興三三二番地。父親許丑，母親許郭鎮。一九三九年，廿七歲，於台北與劉順娣結婚；一共有有一子四女。

劉順娣：我和許強同年。我是高雄六龜人，在家排行老二，另有一個哥哥、弟弟和妹妹。因為父親早逝，家裡由母親當家。母親是封建社會的女人，重男輕女；她認為，女孩子不必念太多書。所以，我在年輕時候便到廈門當護士。

有一次，病院的三等病房住了一個女病人；這位女病人其實家境很富裕，因為節儉，才住進一般病人住的三等病房。因為職業倦怠的關係，其他護士並沒有對她特別照顧；只有我，對她就跟對其他病人一樣，總是態度親切地關心照顧。因為這樣，她對我的印象很好。有一天，她就主動跟我聊天。聊到後來，她就問我：為什麼不繼續求學？我老實告訴她：家裡窮，兄弟又要念書；所以沒法讓我這個女孩子繼續求學。……她聽了以後就慷慨地表示，她願意資助我繼續念書。我於是在她幫忙下，前往日本東京女子醫專繼續求學。

我很珍惜這難得的求學機會，決心努力學習，取得醫學士學位，日後可為更多窮苦的病人服務。臨行前，胸懷大志的我還給自己另取一名——劉志雲，以表志上雲霄的決心。

就讀東京女子醫專期間的某個假期，因為在早稻田大學就讀的弟弟邱萬順介紹，我認識了當時就讀台北帝大醫學部的許強。弟弟和他是南二中的同學。

那時候，我整天都埋頭苦讀，除了醫學專業以外，什麼都不太知道；生活圈子也很小。我和許強經常通信，討論的也都是有關醫學的種種問題。

許強的爸爸和哥哥（許再添）都是農民。我聽他們說，許強從小就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讀公學校時成績優異，頗受日籍老師的賞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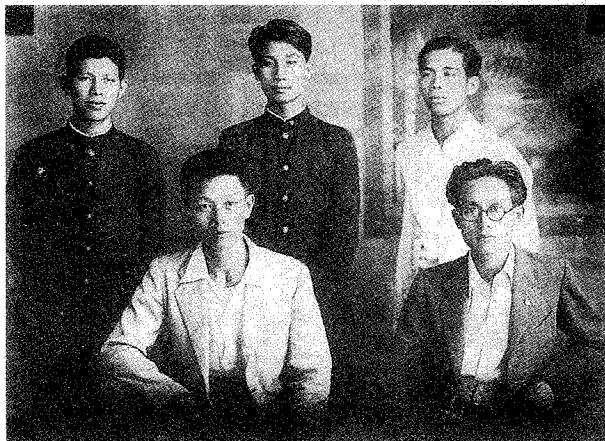
十一歲那年，許強畢業於公學校。許強的爸爸雖然作農，也有望子成龍的願望，卻因無力籌



劉順娣與其母及弟弟邱萬順。（劉順娣／提供）



留學日本東京女子醫專時的劉順娣。（劉順娣／提供）



就讀台北帝大醫學部時，許強（後中）通過南二中同學邱萬順（前左）的介紹，認識了就讀東京女子醫專的劉順娣。（劉順娣／提供）

措教育費用，而不讓許強報考中學校；許強的日籍老師於是親自登門拜訪，想要說服他。

「只要許強考得上，」日籍老師向他承諾說：「那麼，他所需要的一切教育費用都由我來負擔。」許強的父親拗不過日籍老師的熱誠，只好答應了。^②

張漢其：我是許強的外甥。其實，就我的理解，許強家裡並不很窮；他父親雖然務農，卻當過保正（村長）。所以，應該生活得還不錯。我們家就比較窮，都是靠他們家的土地過活。小時候，我經常到他們家，印象中，他們都吃得不錯。

聽我父親說，許強念公學校時，大家還不知道他的頭腦那麼好。畢業那年，他去考台南二中並沒考上，因為是「草地囡仔」嘛！念了一年高等科後，我父親陪他去重考，才考上。許強曾告訴我說，他自考上台南二中以後，就沒有再參加過考試。他後來念高等學校和台北帝大，都是保送的；這在日本時代是很不簡單的。^③

從南一中到台北高校

一九二二年，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新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台共學」制；表

面上，日台學生之間的差別，大致撤除。但是，因為錄取名額限制、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教科書、成績占有相當分量的日語口試大多由日本人校長和教員主持等等原因，本省學生進入中等以上學校的機會還是遠遠不及日本學生。

因此，來自「鹽分地帶」的「草地囡仔」許強，在台南二中第一次入學考試落榜，並不令人意外。為了繼續升學，許強於是進入高等科就讀。

日本殖民當局設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實是有特別的用意的。首先，它要利用「高等」的美名，攏絡台胞，使其不求上進；再者，高等科完全是簡易的職業教育，與上級學校缺少聯絡，極大地限制了有志升學的台灣學童。^④

儘管如此，許強還是不負日籍老師的期望，克服了種種客觀限制，於一年後的一九二九年考取台南二中（第八屆）。^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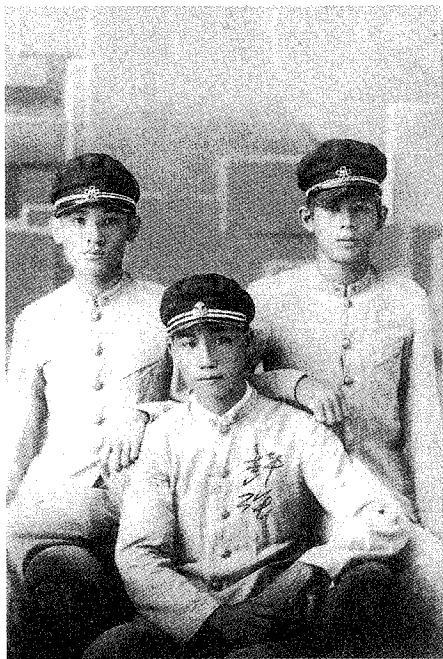
當時，中學校的修業年限是五年。但是，只要有足夠的自信，修完四年課程的學生也可以報考大學預科或台北高等學校。^⑥按規定，許強應於一九三四年三月畢業；然而，一九三三年四月，台南二中才念了四年的許強，就跨級進入台北高等學校第九屆。^⑦

台北高等學校的全稱是「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一九二二年四月創設時，原名「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為大學預備教育機關，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一九二五年繼設高等科，分文、理兩類，修業年限三年；每年只招考新生人數的一半，另外一半則由尋常科畢業生和各中學校長推薦保送。一九二六年起，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正式於古亭町校舍（今和平東路師大）上課。由於台北高等學校及各中學校的校長都是日本人，日本學生進入台北高校的機會，自然遠遠超



許強出身台南佳里農家。
（劉順娣／提供，藍博洲／翻拍）

和許強先生是前後期同學^⑩，然而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接觸。我們都是台南二中的校友^⑪。許強先生雖然年紀比我大二歲，（但）他進入台北高等學校（卻）低我一屆。進入台北高校通常要經過考試。許強先生是被保送進入（的），當時各校只有一、二個保送的名額，可以說並不容易。^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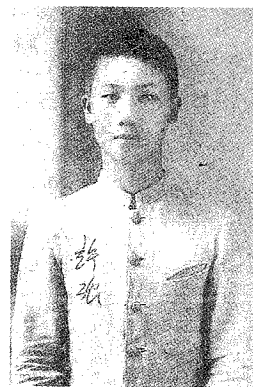
1933年，許強越級考上台北高等學校第九屆理科甲類後，戴上葉葉帽徽的帽子與戴櫻花帽徽的南二中同學留影紀念。（劉順娣／提供，藍博洲／翻拍）

李鎮源：我在台北高等學校時代
 過台灣學生。台灣學生能夠倖而進入的，可以說是少數中的少數。^⑬
 就以許強進入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的一九三三年的統計來看，高等科共計有四三四名學生，其中日本人三二五名，台灣學生只有一〇九人。^⑭
 就南二中而言，許強更是唯一進入台北高校第九屆的學生。
 台北高校生戴的帽子有兩條白線環繞蕉葉帽徽，一般稱為「白線帽」。由於台灣子弟要考進台北高等學校非常不容易，所以，戴「白線帽」的青年便成為當時少女崇拜的對象。儘管如此，在異民族殖民統治下，作為殖民地知識菁英的這些佼佼者，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民族歧視的待遇。許強和幾個民族意識強烈的台灣同學於是通過思想的探索，進而在行動上尋找民族解放的道路。

李鎮源：我在台北高等學校時代
 過台灣學生。台灣學生能夠倖而進入的，可以說是少數中的少數。^⑬
 就以許強進入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的一九三三年的統計來看，高等科共計有四三四名學生，其中日本人三二五名，台灣學生只有一〇九人。^⑭
 就南二中而言，許強更是唯一進入台北高校第九屆的學生。
 台北高校生戴的帽子有兩條白線環繞蕉葉帽徽，一般稱為「白線帽」。由於台灣子弟要考進台北高等學校非常不容易，所以，戴「白線帽」的青年便成為當時少女崇拜的對象。儘管如此，在異民族殖民統治下，作為殖民地知識菁英的這些佼佼者，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民族歧視的待遇。許強和幾個民族意識強烈的台灣同學於是通過思想的探索，進而在行動上尋找民族解放的道路。



許強（右）與台南二中的老師及同學。（劉順娣／提供，藍博洲／翻拍）



1929年，許強考入台南二中第八屆。（劉順娣／提供）



許強離開台南二中時期。（劉順娣／提供）



台北高校生時代，前排右起第一為許強。（劉順娣／提供）

邱林淵：我是嘉義人，畢業於嘉義中學。許強和我是台南州的同鄉。一九三三年，我和他一同考進台北高等學校理科乙類。當時，台北高等學校非常注重外國語文的訓練，除了日語和漢文之外，還設有第一和第二外國語。理科甲類，選讀英語；我們理科乙類將來準備念醫學，所以，大多是研讀德語。那時候，念理科乙類的大多是台灣人，和我一起的還有蕭道應和許強。

當時，日本學生經常欺負我們台灣學生。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因為日本殖民當局不准台灣學生在學校說台灣方言，有一次，有些台灣學生說台灣話被一些日本學生聽到，他們就藉機欺負那些台灣學生。結果，這事被許強和蕭道應等人知道了，他們就毫不退縮地起來反抗那些日本學生。

我一直認為，許強和蕭道應都是非常有志氣的台灣青年，他們面對日本人的壓迫，很敢反抗。這在當時，需要不小的勇氣，因為，如果因此而被退學、趕出學校的話，是很麻煩的。^⑩

蕭道應：許強教授是台南佳里人，我是屏東茄萣人。中學時代，我讀高雄中學，許強讀台南二中；我們兩人都於一九三三年考上台北高等學校理科乙類。

許教授是閩南系，我是客家系。在高校，我們最初遇到的問題便是閩客之間的問題。通過討論以



許強從台北高校到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同學邱林淵(1916-)。(邱林淵/提供)

後，我們發現彼此都同意反封建，我們都認為我們應該反封建。

首先，我們認識到：人本來是動物，而動物都有排外、保己的本能，這是動物所有的最低本能的表現。所以，我們兩人都同意互相排除「排外的動物本能」；也就是互相摒棄狹窄的民族意識。

接著，我們談到反封建的課題。我們認為，封建意識的範疇相當廣泛。迷信，也屬於這個範疇之內；所以，反迷信即為反封建的主要課題之一。

同時，我們也認識到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係：儘管在形式表現上，我們是反迷信；但這是形式。本質上，我們之所以反迷信還是基於反封建意識的認識。另外，我們原則上認為「世上並無命運問題」——人，如果不努力，必不進步，那就一定陷於不好的命運。所以，形式上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本質上我們還是反封建。對家庭的諸多問題，我們也是抱持反對的看法；所以，形式上我們似乎是反家庭者，但本質上我們還是在反對封建意識。

在形式與內容辯證關係的認識基礎上，我們還了解到：人並非造出來的！我們因此不相信日人所謂「天照天皇」的說法。這樣，在形式上我們又變為「反宗教」了。其實，我們之所以「反宗教」，基本上還是基於反對封建意識。

除了反封建，我們也常常談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問題。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認為，台灣土地上的一切事物和人，都是它們所擁有的。基於自衛，我們展開最消極的反抗。

我們都反對一切「改良主義」的手段。我們認為，一切「爭取台灣人權利」的合法鬥爭是沒

有用的，反而有害。如果不能給日帝致命打擊，想要爭取真正的台灣人權益，是不可能的。

我們最消極的態度就是，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準備。

在台灣的日本人認為，台灣是它們的。所以，他們稱自己為「內地人」，台灣人是「本島人」。但是，我們卻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華僑，不是日本人。所以，我們絕不稱呼日本人為「內地人」，一般都稱為「日本人」。為了避免引起身分認同上的麻煩，當我們跟日本人對話，不得不提到日本人時，我們都避稱「日人」或「內地人」，一切稱謂都改用「你們」來稱呼；提到台灣人時，就用「我們」來稱呼。這雖是生活上無關緊要的小節，但整個問題的重點卻是為了使我們自己不要忘了「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

最後，我要說的是，當時，在認識事物的觀念上，我們都認為：觀察世上的一切事物與現象，要採取「運動」的觀點。因為今日之我並非明日之我，今日之友並非明日之友；世界上沒有一概不動、一成不變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都要經歷一個運動過程。

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式和根本屬性，靜止則是物質運動的特殊形態；世界上沒有絕對靜止的東西，任何事物都在變；「變」是絕對的、永恆的、無條件的，而「靜止」則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

這些都是我們日常所談的問題，這樣的思想認識也規定了我們以後必走的正確道路。④

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

在台北高等學校，許強通過學校當局為他申請的「育英會」獎學金，完成了三年的學習；然後直升台北帝國大學新設的醫學部。

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一九二八年，起初只設文政與理農兩學部；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才增設醫學部。據《台灣教育沿革誌》記載：醫學部之所以較遲設立有兩個原因——首先，台灣地跨亞熱及熱帶，對熱帶醫學具有研究者甚難羅致；其次是因為醫學儀器設備的費用甚大，經費方面一時難以應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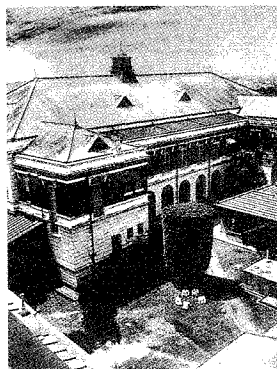
日本當局認為：學文、法科系的台灣學生思想最為不穩，最具危險性。所以，它並不願意讓太多台灣學生進文、法科系，但又不好明令禁止，因此就讓這些學生畢業後不容易找工作，或者只能做低階的工作。為了現實的就業問題，大部分的台灣學生只好選擇走學實科的路，而且以學醫為上策。



許強就讀台北帝大醫學部時的學生照。
(劉順娣/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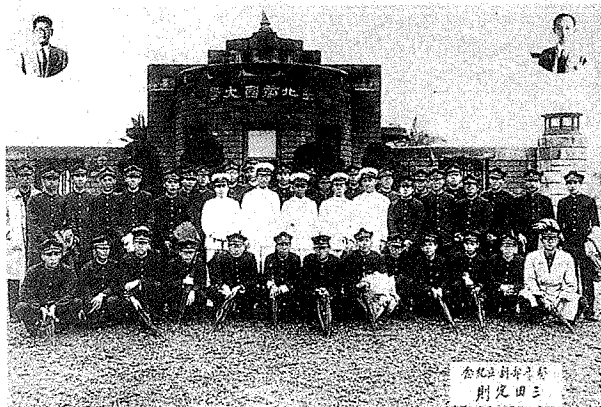
1935年1月19日，許強（右一）與高校同學。(劉順娣/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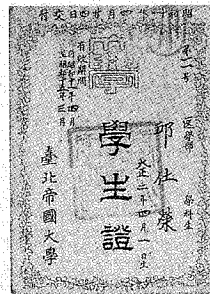
台北帝大醫學部設立時一景。



1936年元旦，台北帝大增設醫學部，部址為原赤十字會支支醫院。



1936年，許強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與同屆師生在校門口留下歷史紀念。



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學生證。
(取自《邱仕榮先生紀念專輯》，蕭開中先生/提供)

因為這樣，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招生時，報考的人數非常踴躍。據前台灣總督府各年統計書及學事年報一覽材料，一九三六年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投考人數是六十七人，入學人數四十人，錄取的百分比是五十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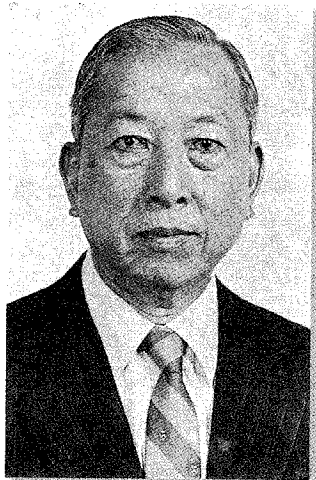
許強和蕭道應、邱林淵及李鎮源等人都是這四十人之一。

邱林淵：我十分敬重許強。他很愛幫助人，學業成績又非常好。基本上，在高等學校，成績比較好的，大多是台灣人。一九三六年三月，高等學校畢業後，我和許強及蕭道應又一起考進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李鎮源：我進大學那年，正好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開始創立。當時（因為是）第一屆，許多人聞風而至，包括許多日本學生、留在台灣的先期前輩，以及應屆畢業的學生，都參加了這次考試。百名以上各地的菁英來爭取四十個名額。而四十個名額中，台灣人只有四成，十六個名額，其他都保留給日本人。名額可說是少之又少，競爭之激烈也可想而知。

我和許強先生成了同班同學。……他在大學時代十分喜歡下棋，偶爾我也和他打乒乓球，在課外活動上，（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對他也沒有特別的注意。

我記得大學時代，日本的教授十分嚴格，雖然考試可以隨時舉行，但是通過並不容易，一旦不能通過則一考再考，直到老師滿意，及格為



李鎮源（1915-2001）是許強南二中和台北高校的學長；但在台北帝大醫學部成為同期同學。

止，稱之為「補考」。就我所知，許強是極少數不曾有過「補考」紀錄而能全部通過的學生。

九州帝大醫學博士

一九四〇年三月，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學生畢業；卅七人被授予醫學士學位，其中，包括許強在內的台籍學生共十四名。^⑭

當時，台北帝大各學部採取「講座制」，規定學生須修畢若干講座才能畢業，通常每個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原則。^⑮

台北帝大醫學部部长三田定則認為，風土病、肺結核及消化系疾病是內科學應該發展的三個主要研究題目，因此在醫學部設有三個內科講座。其中，澤田藤一郎教授擔任第三內科講座主任；研究主題是消化系統疾病。

澤田藤一郎自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之後，即被安排進入該校法醫學科，以生化學的方法研究人體內解毒機轉，獲得博士學位；然後進入小野寺教授主持的第三內科擔任助手。小野寺教授以其獨創的胃曲線及胃部壓點等研究，成為日本聞名的消化系醫學學者。澤田在擔任小野寺教授助手期間，繼續研究人體內解毒機轉，因而在日本的消化系醫學及生化學界成名，之後並升為助教授。他之後又留學法、德、加、美等國兩年半，從法國醫學界吸收了諸如以「bismuth nitrate」治療消化性潰瘍及詳細觀察病人之重要性等許多構想。

一九三九年二月，澤田獲聘為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三內科講座主任。澤田於是延攬九州帝大第



許強（右一）與醫學部同儕聚會。
（取自《邱仕榮先生紀念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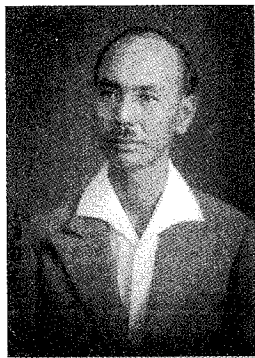
許強（中）與台北帝大醫學部同學。（劉順嫻提供）



1938年，許強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同學修完學科課程，於1940年畢業，取得醫學士學位。（取自《邱仕榮先生紀念專輯》）



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紀念冊。（取自《邱仕榮先生紀念專輯》）



1939年2月獲贈為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三內科講座主任的澤田藤一郎教授曾說：「許強是第一個可能得到諾貝爾醫學獎的台灣人。」
（取自《台大醫院壹百年》）

三內科講師佐藤八郎為助教授，並於同年五月，開辦台北帝大醫學部內科學第三講座。

另外，台北帝大設有大學院，招收大學部畢業生，在教授指導之下從事研究工作二年。研究期滿後，提出博士論文，送請有關學部教授會審查。教授會乃推選部內教授二人負責審查；必要時，得請部外人員審查。論文審竣後，再交教授會討論。開會時，出席教授須在四分之三以上，並須經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准予通過。台北帝大自一九二八年創校起至一九四三年止，一共授予卅二人博士學位，其中理學博士四人，農學博士三人，其餘都是醫學博士。

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之後，許強就進入澤田內科研究室，跟隨澤田藤一郎教授做研究；並於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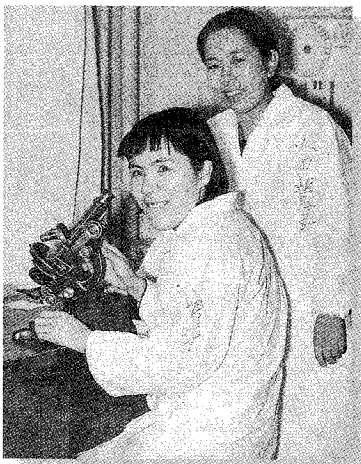
據說，澤田曾經公開斷言：「許強不但是台灣，同時也是亞洲第一個有可能得到諾貝爾醫學獎的人。」

劉順娣：一九三九年，我和許強結婚。婚後，我們又各自回學校，完成最後一年的實習。畢業後，我從東京回到台灣。我們於是在台北大龍峒租了一棟舊房子，作為住家與我的私人診所。許強到台北帝大醫學部澤田（第三）內科上班，每天早出晚歸；人家是下午五點下班，可他總要到晚上九點以後才有回來。

宋瑞樓：許強教授畢業後進入母校附屬醫院的第三內科進修內科學，本人……畢業後也進入第



1939年，許強與劉順娣結婚。（劉順娣／提供）



劉順娣（左）婚後回東京女子醫專完成最後一年實習。（劉順娣／提供）

三內科進修內科學，因此許強教授是本人的學長。我們的教授（主任）是日人澤田藤一郎先生；澤田教授的研究領域是肝臟學、腸胃學與新陳代謝學，第一研究主題是（人體解毒機轉）。（我們）進修一段時期後，如果還會留下，就有機會（跟他）做研究。

人體體內的解毒機轉主要是肝內解毒。因此，我們的研究題目大部分與肝臟解毒機能有關。

當時的台灣，肝病與腳氣病的罹患率非常高。澤田教授認為，糖分新陳代謝步驟的後段是焦性葡萄酸產生，於是要許學長做一個試驗，那就是把糖分中的一種果糖，分別注射到腳氣病與肝病患者的體內，然後檢驗它對病人血液裡頭焦性葡萄酸的影響。許學長的研究發現：果糖液注射（負荷）後，腳氣病與肝病病人血液內的焦性葡萄酸的量都會上升；但是再經維生素B₁注射後，如果是腳氣病患者，那麼，他的血液內的焦性葡萄酸量又會恢復正常。因此，可以用這樣的檢驗來

鑑別診斷腳氣病與肝病。在戰後的日本，有一段時間，醫界還是常用這個方法做檢驗。

後來，澤田教授在台北帝大服務時代的研究成就被母校九州帝國大學（戰後改稱九州大學）醫學部教授會認同，並受邀回去擔任第三內科教授（主任）。澤田教授走了之後，台北帝大便邀請當時擔任台北帝大熱帶醫學研究所營養學主任的柳金太郎教授接任。

柳教授早在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內科時期，就是一個以生化學研究腳氣病有貢獻的學者。柳教授很欣賞許學長的研究，讓學長繼續研究，終於得以完成這份研究論文，並由九州帝大授與醫學博士學位。²⁰

邱林淵：我們第一屆同學拿到醫學博士學位的有：許強、李鎮源、邱仕榮，還有我；謝有福沒有拿到，因為他的博士論文沒有寫完。我們這些人的博士學位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經過教授會議通過的。因此，我們的醫學博士學位，都是台北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

在我們這幾個人當中，我認為，許強的思想是最進步的。至於許強的學術評價，我實事求是地說，如果說他是可以拿到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那麼這個評價是太高了一點。許強的教授是澤田。我也曾在一個日本人寫的材料上看過，他指出許強是有希望的人選；畢竟當時他在研究工作

方面是有成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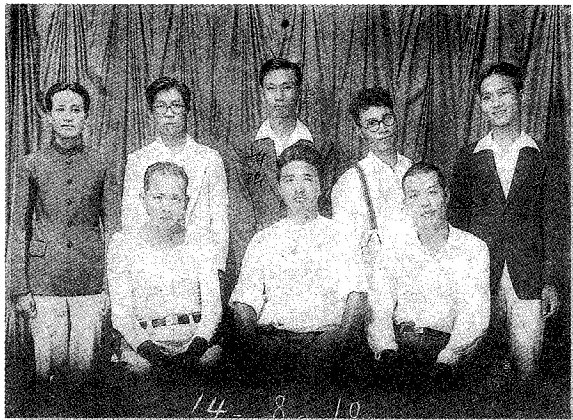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許強當時的研究，在水平上應該還沒有達到領諾貝爾獎的標準。要達到領獎金的目標，還是有一段距離的。……那個時代，許強已經投身於組織的工作，通常晚上都要忙於聯絡，所以，也沒有時間再繼續做研究。

抗日的秘密組織

一九三七年，也就是許強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的第二年，隨著日本法西斯化的不斷深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政策也進入「皇民化」階段。首先是在四月一日宣布禁用漢文，強迫台灣人民學習日語日文；接著，七月七日，日本帝國在大陸發動侵華戰爭。台灣乃於八月十五日進入戰時體制。

這時候，二〇年代以來台灣本土的反日政治運動和團體早已遭到徹底的彈壓。那些政治意識覺醒的台灣青年，於是把反日的戰場轉向祖國大陸。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日本「皇紀紀元二六〇〇年」紀念日，日本殖民當局通過戶口規則的修訂，制定台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規則。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通過這樣的「改姓名運動」，進入最緊張的階段。十一月廿五日，為了鼓勵更多的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台灣精神動員本部公布了〈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綱要〉。此外，日本當局又制定一種獎勵方法，規定說日語的家庭為「國語家庭」，在諸如物資配給等實際生活上，給予和日本人同等的待遇。



1939年8月10日，許強（後排中）與第三內科同仁。（劉順娣／提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因為地理關係而成爲日本南侵的主要根據地；因此，一切經濟政策也完全以對南洋侵略的軍事需要爲主。

一九四四年六月，以醫學部學生蔡忠恕、郭琇琮，台北二中的陳炳基及台北高商的雷燦南等爲主的北部地區青年學生，因爲反日的思想學習與組織，受到日警的大檢舉。

許強雖然沒有受到這次事件的株連，但是，這段時期，他卻參加了一個進步的、祕密的反日組織——「不定期會」。

黃怡珍：我是台北汐止人。一九三七年八月，我跟隨經商的養父，從福州回到台北。因爲中日戰爭爆發，學北京話竟然成爲當時的風尚，很多年輕人都想學。一位同在福州讀過書的人就介紹我到宮前町（今圓山附近），教幾個台北高等學校和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學生「北京話」。

這些學生大部分是客家人，包括從日本回來度暑假的鍾和鳴，以及鍾九河、邱仕榮和蕭道應等，另外還有不是客家人的許強。除了教他們北京話之外，我也教他們唱〈總理紀念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因爲大家年紀差不多，下了課，大家就會談論起中日戰爭的局勢。他們認爲，這次的中日戰爭是關係著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我們與其在台灣這樣活下去，不如回大陸參加抗戰。後來，大家就決議：既然大部分人是學醫的，那麼，乾脆就組個「醫療服務團」吧！

因爲種種原因，這個醫療服務團並沒有組成。後來，鍾和鳴和他的表弟李南鋒及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先到上海探路。一九四〇年三月，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的學生畢業了，蕭道應隨即和我一齊奔赴上海，與他雄中時期的同學鍾和鳴會合，參加抗戰。^②

周青：我出身工人，光復初期曾任《人民導報》和《中外日報》記者；一九四九年，爲了躲避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流亡大陸。「不定期會」也者，乃在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一九三一年台共被破壞之後，爲保持其外圍勢力的存在而結合起來的反日愛國進步組織，但它的集會，爲安全起見，則採取不定期的方式進行。一般利用「角頭」的迎神賽會和宴請的方式集合，研討祖國抗日的最新形勢，有關延安的各種消息，歐洲反法西斯戰線的進展和窺察日軍在侵略戰爭中不斷「轉進」的敗象，向台灣人民進行宣傳。

它的成員包括：徐淵琛、朱點人、廖瑞發、王忠賢（阿忠）、鄭德來、潘金火、李成、周植兄弟、廖阿盛、高添燈、陳君玉、許強和我。這些人包括：知識分子、小公務員、醫生、作家、記者、小商人、木工和泥水匠等。

這個不定期會和謝雪紅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一九三九年謝雪紅保釋出獄後，我們就一直派代表與她聯繫。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八月二十日左右，不定期會派人與謝雪紅聯繫，這時，她已開始籌畫成立「人民協會」；不定期會的成員於是成爲人民協會台北分會籌備會的基礎成員。

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這個不定期會的成員有一大部分先後犧牲，他們包括：徐淵琛、朱點人、廖瑞發、王忠賢和許強。^②

富有氣概的台灣人

隨著戰局的發展，一九四四年，盟軍飛機經常轟炸台灣各地，人心惶惶。六月十八日，總督府當局發表〈稠密都市住民疏散綱要〉，指定台北、基隆、台南和高雄四市為必須疏散地區。八月廿二日，當局又宣布：「台灣進入戰場狀態」。十月十二日，盟軍飛機千餘架又再轟炸台灣各地；十月廿二日，「疏散指導部」設立。同年年底，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會議決議進行學校和醫院疏散計畫，選定台北溪洲和桃園大溪為疏散地。一九四五年三月，台北帝大附屬醫院門診及病房，借大溪公學校的一部分校舍正式運作，施行診療與醫學學生的臨床醫學教育。

這段鄉居期間，因為工作壓力不像在台北時沉重，柳金太郎教授於是有機會在工作之餘，和學生談到與學問無關的話題……。

宋瑞樓：柳教授在來台之前曾經在大陸東北（滿洲）的日本機關，擔任過保健局長。因為在東北待過一段時期，對當地大陸人的一般性格，有他一定的認識與看法。有一次，他和我們談到東北人和台灣人的性格問題。儘管兩地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是，柳教授卻發現台灣人與東北人並不相同。

「哪裡不同？」有人問說。

「缺乏氣概！」柳教授當著台灣學生的面前毫不客氣地表達了看法。

幾個台灣學生對他這樣坦白的看法似乎也無法提出什麼有力的辯駁，只好尷尬地沉默著。

「但是，」柳教授接著說：「你們的許強學長跟其他人不同，他是個富有氣概的人。」

柳教授於是談了許強讓他認為「富有氣概」的幾個實際例子……。

第一，許學長與教授下棋時絕對不讓。

第二，台北帝大附屬醫院有三個內科，輪流擔任初診與星期天急診。有一個星期天，許學長值班時，恰好總督府大官民政局長不舒服，來台大醫院就醫。許學長要給他診察時，追隨來的科長卻要求許學長通知教授，許學長回說先讓他診察後再報告教授；科長聽了之後非常生氣，就直接與院長通電話；院長是第一內科主任，於是親自赴院處理。第二天，院長又以電話告訴柳教授星期天發生的事，並責問值班醫師。柳教授於是問許學長事情的經過。聽了許學長的報告後，柳教授就給院長回電說，他認為值班醫師當天的措施並無不當之處。

當時，台大醫院的日本人醫師，除了教授（主任）與身體檢查不及格的醫師之外，都被召集去服兵役，擔任軍醫。第三內科之助教授佐藤八郎先生，當然也被召集，但是因患嚴重的痔瘡，不久又被送回來。這時候，因為視力太差而身體檢查不及格的講師，剛好擔任醫局長；他平常不用照顧病人，只在研究室繼續研究。柳教授認為這樣不公平，於是就讓他回故鄉，並推薦擔任助手許學長接醫局長。但是，醫學院當局不同意讓許學長擔任醫局長，改由佐藤助教兼任。

柳教授對許學長如此的肯定，證明許學長不但在學術能力上，而且在做人的人格、思想上，都是高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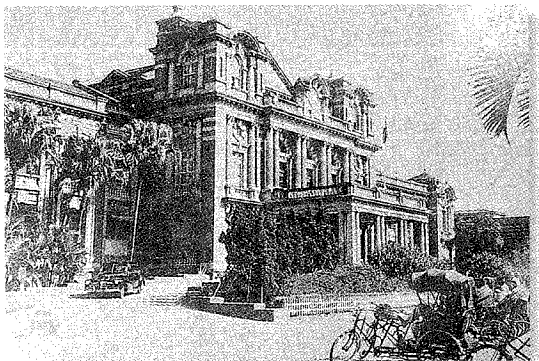
接收委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台灣回歸中國。

十月十三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擬訂具體計畫接管台灣教育，其中，台北帝大改為國立台北大學。^④

十月廿五日，中國戰區台灣區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舉行。

十一月，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聘杜聰明為台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負責接收原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附屬醫院事宜。同月十五日，行政院令設國立台灣大學於台北帝國大學原址，由羅宗洛擔任代理校長。原台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代表校方，將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學專門部及附屬醫院，移交國民政府代表——教育部特派員羅宗洛。接收後，台北帝大醫學部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台北赤十字醫院則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十二月一日，杜聰明任醫學院院長兼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及熱帶



1945年11月15日，台北帝大改制為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帝大醫學部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原台北帝大附屬醫院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醫學研究所所長。^⑤

這段期間，第三內科助教的許強被選為以杜聰明為首的六人接收小組成員。接收小組除了共同扛起重整校園、重建學校的責任之外，並且協助國軍接收分布全島的軍用醫療物品。在接收過程中，許強實際負責醫院營養部的接管工作^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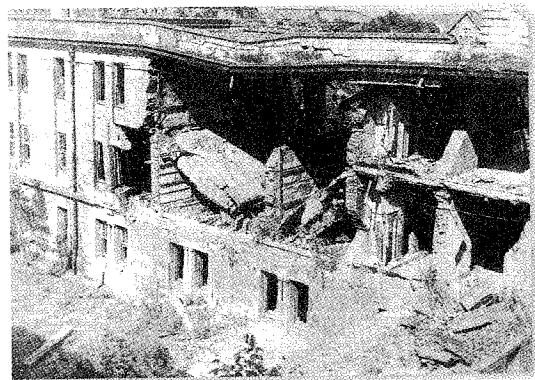
翁廷俊：一九三七年，我畢業於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隨即進入台北醫院（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內科。

由於戰爭關係，台大醫院（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於民國三十四年疏散到大溪公學校，那年八月十五日，我們在大溪聽到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廣播後，就開始遷回台北。各種醫療器（具）由醫師、護士像搬運工人一樣，陸續運回台北，差不多到十月，一切都已就緒。這期間，最興奮、激動的當屬醫學部第一期生，在大溪回台北的車上，可聽見他們議論紛紛，喜悅不已。



1945年11月，行政長官陳儀派任杜聰明（1893-1986）負責接收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附屬醫院。

回台北後，醫學部的日本人組織了「和親會」，互助合作。醫學部在職的台灣人醫師也相應地組織了「台醫同學會」，並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許強、許燦煌（第一屆）、李鎮源、賴肇東（第三屆）和我五位委員，參加杜聰明先生為首的六人小組會議，協助杜聰明先生接收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附屬醫學專門部、台大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及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及支部醫院（今市立中興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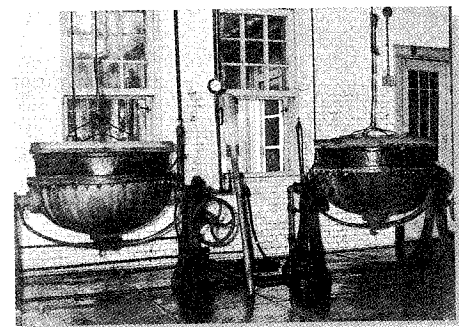
1945年11月，許強獨選為委員之一，協助杜聰明的接收工作；負責接收飽受戰火破壞的台大醫學營養部。

那時候，大家都爲了能脫離被統治的身分而喜悅，那種上下一心的感受，充滿每個人的心田。⁷⁷

宋瑞樓：當時，爲了接收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組成了接收委員會；許學長就是委員之一。⁷⁸

日據時代，營養部由「仁濟團」包辦，並由第三內科的助教授監督。然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卅一日的台北大轟炸中，它已被炸得滿目瘡痍了。許強於是特地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一直要到一九四九年護理部正式成立後，才把工作移交。⁷⁹

李鎮源：光復之後，台



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營養部「煮飯鍋」。

北帝國大學的移交工作展開，他（許強）是杜聰明先生底下接收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的委員之一，工作得十分認真。這時候我開始發現他的個性很正直、很有正義感，是非黑白分明。只要是對的事情，他就極力支持，不對的事情，則反對到底。這和我的個性很相似。由於相同的性情，我們都曾得罪過杜聰明先生。而在初期台大醫學院的教授會中，我們兩人的意見，也特別相近。

良師良醫

根據杜聰明在〈留用日本人教授及起用本省人才來建設醫院〉一文的說法：台北帝大的接收工作完成，改制爲內分文、法、理、工、醫、農六學院的國立台灣大學後，台大醫學院除了各科留用的日籍教授以外，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卒（畢）業生卒業後五、六年，按資歷應是副教授程度，所以各科卒業生就起用爲副教授兼主任。

因此，許強不但主持了台大醫院第三內科，同時也是受到學生歡迎的老師。

宋瑞樓：光復後，……醫學院內科繼續維持三科制，鄭培禮助手擔任副教授，主持第三內科；但是，鄭主任不久就因患病，請病假。第三內科主任於是由升任講師的許學長代理。當時，本人之研究室兼辦公室與許學長同一間，看到他忙於準備上課與出席開會，本人也忙於工作；因此，接觸機會較少，非常可惜。不久，許學長升任副教授。鄭主任去世（一九四七年）以後，許學長就升任主任，搬入主任室。

許學長在課堂的上課，像老師澤田教授簡明而啓發學生了解重點，吸引不少學生，使不少學生畢業後進入第三內科進修內科，給第三內科帶來發展的動力。

施振坤：我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入學台北帝大醫學部，一九四八年七月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二屆），可以說是受胎於台北帝大醫學部，由台灣大學醫學院出世。……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方酣時，念完基礎醫學，大部分同學（便被迫）「投筆從戎」，去當學徒兵。

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時熱情的青年學生，都以激動感激的心情，去參加各種慶祝活動，感到無比的歡樂與興奮。有時候去歡迎八年抗戰勝利的國軍進駐台灣，或者學習國語，研讀三民主義等，（這些）都是年輕人對台灣光復，投入祖國懷抱的感激而自發的行動。街頭巷尾鞭炮的聲音不絕於耳，大家歡天喜地的心情，持續了一段時間，想「改頭換面」，準備「重新」做一個「中國人」。到十月慢慢安靜下來開始上課。

上課以前，我們醫科第一屆、第二屆的同學，集合在中山南路的醫學院大門口，先拆除「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招牌，搖身一變成爲「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學生。^③

翁廷註：回憶當時，我們（台大醫科）第三屆的五十一名日人學生被遣送返國後，只剩下十幾名台籍學生。後來由外地歸隊的醫科學生陸續報到後，才形成六十一名的醫科班。光復初年的台大醫科生都是至優的學生。這群純粹無瑕的年輕人遇千載難逢的光復時機，莫不歡欣鼓舞，如奔騰不羈的野馬般，爲了祖國復興，積極地組織學生聯盟或學生自治會，並頻辦文化體育及學術討論交換意見等活動。……學生自治會的活動到了二二八事件後也自動地解散了。^④

顏世鴻：我是台南人，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據下台南二中第二十屆畢業。一九四六年，我進入台大醫學院就讀，算是光復後的第五屆學生；當時也是五年制的最後一屆（後來的兩屆改成六年制，從第八屆開始才改成七年制）。我曾經擔任台大醫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一九五〇年六月，因牽連所謂「學委案」被捕，處刑十二年。

許強先生是我南二中和台大醫學院的學長。

我個人認爲，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的學長，可以說都是當時的頂尖人物，如許強先生、李鎮源先生、邱仕榮先生、謝有福先生和陳登科先生；再加上醫專時代的菁英，如徐千田先生、董大成先生、徐傍興先生；還有留下來的幾位日籍教授，如解剖學的金關丈夫先生、生理學的細谷先生、組織學的森於菟先生、外科的河石教授和寄生蟲的森下教授（也留下一段時間）；再加上由大陸來的、留日的病理學教授葉曙（千葉大學畢業）和細菌學的嚴智鐘教授（東京帝大）；這些人勉強支撐了光復初期台大醫學院的教學。^⑤

蘇友鵬：我是台大醫學院第二屆畢業生。許強醫師是台大醫學院第一、二、三、四屆的老師，所以，我給他教過。他講授消化系統，上課非常準時；當時的醫學術語都用德語，我們這些學生都很喜歡學他講那種帶有台灣腔的、德語的醫學術語；他講話的聲音柔和、慢條斯理、娓娓道來，不像他的名字「強」那麼有力。許強老師很喜歡中文，他自己說過，他覺得，他的姓名用中文發音要比用台語或日語發音來得好聽。^⑥

顏世鴻：二年級的時候，我和另兩個同學都還留著和尚頭。在那個時代還留這樣髮型的人，有的是爲了乾淨起見，而我卻是爲了省錢；因爲留和尚頭，只要我母親用剃頭刀隨便刮一刮就可以了啊！當時，宿舍裡的伙食有分量限制，可我正處於發育期，很會吃，經常要到外面吃切仔麵，因此零用錢比較不夠用。在台大福利社理髮雖然比外面便宜三倍，我還是把剃頭的錢省下來了。台灣人一般在生產時對和尚頭是有忌諱的！因爲我們四年級時要到婦產科實習，所以，許強先生就勸我們別再留和尚頭了。我於是把頭髮留起來。

許強先生當時也是第三內科主任，主科是胃腸科。我曾經因爲胃痛去給他看過病。許強先生了解我沒錢，也就沒有勉強我去照X光。結果，他診斷出我有十二指腸潰瘍，勸我利用暑假開刀。

後來，我並沒有遵照許強先生的囑咐去開刀，而長年的胃病也始終沒有治好；一直到許強先生爲我診斷的卅九年後，我因爲第十一次（最後一次）胃出血去照X光，這才發現自己的確有潰瘍的毛病。這也證實許強先生當年的診斷是確切的。

謝呈周：我是台北人，一九二五年，我從台北工業應用化學科畢業以後，進入公賣局製酒科當雇員，光復後繼續留任升爲技正，與台大農學院教授王西華先生合作，在台灣各酒廠研究生產酒類之技術。

我與許強醫師認識是因爲給他看病的關係。

我有胃病，長年治不好。台大醫院魏火曜院長就介紹我去找許醫師。結果，許醫師診斷出我有嚴重胃下垂；他同時告訴我，治療胃下垂有二種方法：一是開刀，二是藥物和食物治療。因爲當時的開刀手術不很進步，所以我選擇藥物和食物治療。許醫師的問診態度親切，首先就讓我對他有信心。他給我開了胃藥，並指導我用牛油攪飯以增加腹部肌肉的食物療法。我照他的指示服藥與食療，經過三個月後，我就感到很舒服；治療一年就痊癒了。

許強醫師的醫術高明，治好了我的胃病，讓我能活到八、九十歲，我對他非常感激。^④

罷診事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台大當局在接收完成後給七十名有新職員發了證書；同時，杜聰明院長也安慰其他無薪職員說：「近將補充定員之職員，而定員外之無俸之職員亦將發給證書，此

事業已受羅代理校長核准。」

爲了儘快穩定醫學院的人事問題，讓同仁安心工作，杜聰明院長於是向校方提了一份〈編制內補缺及擬聘無薪助理醫師〉的名冊。

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台大代理校長羅宗洛赴渝（重慶）述職，由教務長陳建功代行校務。二月十三日，校長室周祕書到職。杜聰明院長提交的人事建議案卻一直被擱置，沒有處理；經多次交涉，周祕書答覆說：「職員登錄問題皆屬於校長，現在校長不在，且無有任何指示，須要俟校長歸任，始能解決。」針對這樣不負責任的答覆，台大醫院的無薪助理醫師們非常不以爲然；他們認爲：爲什麼其他學院還在繼續登取新職員，獨獨醫學院卻置之度外！三月十九日正午，他們在醫學院各科「有俸職員」援助下，以要執行正當業務，須有合法行爲起見，全體聯名，向校長室周祕書提出要求書，要求以廿一日下午五點爲限，發給「委任狀」；否則對以後發生的任何現象，不負其責。

三月廿一日，台大當局針對上述的要求答稱：「無有證書之職員，原來不是職員，故無要求之權利；有證書之職員，已有證書，無再要求之必要。」因此拒絕醫師們的要求。

會商決裂了，醫學院的醫師們與台大當局的正面衝突，似乎已經無法避免了。

杜聰明院長「鑑於情形重大」，於是在當天下午四點聚集全體職員，在附屬醫院講堂舉行會議；他表示，爲了避免此一「危機」，希望把期限延到廿二日上午九點。醫院的職員們答應了杜院長的要求，但主張強硬地說，「我國爲法治國，當應合法執行業務爲妥，倘若至期限『仍』無發給證書，醫院將停其醫務，社會亦影響不小。」

然而，一直到期限規定的第二天（廿二日）上午九點，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圓滿解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全體醫員於是發動罷診抗議。

台大第一附屬醫院的院門口隨即張貼了三張休診告示：

- 一、本日起休止門診。
- 二、革除學內專制，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大學。
- 三、我們這次的罷診，對於一般來診病人，實在太對不起，我們這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沒有一定的身分保障，我們是做不到的。

三月廿四日，《台灣新生報》首先刊載了一篇題為〈要求發給正式證書——台大醫學院職員罷診〉的報導。

三月廿五日，早晨，台大周主任秘書接見杜聰明院長，要他代為傳達學校當局的處理意見：

- 一、追究將此項問題發表於各報之責任者。
- 二、急速恢復應診，照常服務，當局將於二日後考慮適當之策。

對此，第一附屬醫院的醫員代表向採訪記者表示：在民主政治時代，他們的正當要求毫無置諸秘密之必要，所謂「追究責任者」，實屬滑稽矛盾；至於恢復服務一節，仍以大學當局應先發給委任證件為先決條件，故難遵照辦理。

與此同時，台大第二附屬醫院院長陳禮節鑑於事態重大，為了避免波及第二附屬醫院，乃於上午十點，召集該院全體職員於會議室，宣稱：「日前余曾攜君等之陳情至本部接洽，據答：第二醫院因未如第一醫院之妄行罷診，不久即將發給正式辭令。周主任秘書並謂對第一醫院罷診全



1946年3月26日，《新生報》有關台大醫院罷診事件的報導。

體職員，將予嚴懲，縱使醫學院或附屬醫院終行封鎖，亦決採取強硬態度，君等萬不可輕舉妄動。」然而，陳禮節的這一番話不但不能安撫該院員工的心，反而引起該院職員之「痛憤」，第二附屬醫院的全體職員於是決定起而響應罷診。

罷診的風潮迅速擴大到醫學院各方面。因為附屬醫院罷診，使得這些學生不能繼續實習，他們於是懇求台大當局之善處，不料卻遭到「缺乏誠意之高壓態度」，因此決定以「罷課」來支持附屬醫院的罷診。據聞，其他各學院的學生也「聞風繼起，呼應醫學院之學潮，決為打破學園之官僚化，爭求大學之民主化而共同邁進。」

三月廿六日，《台灣新生報》頭版刊登了一則署名「國立台灣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第二附屬醫院醫員一同」的〈對來診病人道歉聲明〉：

我們這次的罷診。對於一般來診病人。實在太對不起。然而我們這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沒有一定的身分保障我們的服務是做不到的。因為責任的限度究竟到那裡，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不相信大學最高當局沒有解決的辦法。如果打算解決的話。我們認為大學裡是決不可有專制和欺騙的。這是不合於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的。故此我們的要求不僅是為了一部分人的委任

與不委任。這點熱誠和苦衷還希望社會人士了解與原諒。在罷診期間中急症病人照常診療。特此道歉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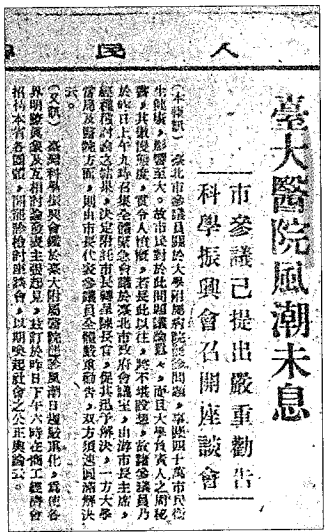
三月廿七日，第二附屬醫院醫員也加入了罷診的行列。這時候，台大代理校長陳建功除了電請人在重慶的羅宗洛校長指示之外，並「迭囑」杜聰明院長負責勸導。請願人員於是委請杜院長代為轉達兩項新的要求：

- 一、限大學於廿八日發出委任狀。
- 二、大學當局應改正其官僚態度。

杜聰明院長於是聲明：「調解無效」。事態更加擴大。^⑧因為這樣，這場台灣史無前例的醫師罷診事件，終於引起國民政府中央的注意。

四月九日，羅宗洛校長由上海飛返台北，他在機場向中央社記者表示：「蔣（介石）主席對台大甚為關懷，……教育部已將台大預算，全部通過，刻呈行政院審核可望照准。……關於醫學院附屬醫院怠診風潮，當徵詢各方意見，可望於一二日內解決。」^⑨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日，羅宗洛校長會見了醫師代表，了解罷診的原因，並答應改進「大



1946年3月31日，《人民專報》有關罷診事件的報導。

學民主化」的問題，同時先發給「無薪助理醫師」聘書。

四月十一日，附屬醫院的全體醫員於是向市民發表一份〈復診聲明書〉，結束了長達半月的罷診行動。^⑩

翁廷俊：光復後，台大醫院除了各科留用一位日人教授之外，其他編制為副教授、講師、助教（頂多三人）、有薪助理醫師三人，其他都是無薪助理醫師。校方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根據日本的移交清冊，先發一批聘書給當時的有薪人員，並同意將陸續對編制內補缺者發聘書，並對編制外的醫師發給無薪助理醫師聘書，使這群留在台大醫院的中堅分子有合法身分。無薪助理醫師對疏散物品的搬回，清理被空襲破壞的院舍、醫院接收等工作，以及醫院的診療業務，與有薪的職員一樣盡職負責。事實上，當時如無這些無薪助理醫師，既不足應付門診及住院病人的診療，更談不上教學與學術研究。^⑪

魏火曜：日據時代，醫師算文官制度的一部分，教授也是任官的，職等較高，都拿高薪。醫院中的助手是判任官，級數最低。大半醫師都是日本人，戰時日本人當兵去了，才由台灣人遞補遺缺。……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剛回台灣，台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就要我進台大醫學院任教，當小兒科教授，那時候校長是羅宗洛。因為中國大學制度與日本不同，所以光復之初，台大非常亂，醫院中有不少無給醫師或助教。……^⑫

當時的物質條件太差，整個大學未上軌道，醫院的行政管理也很糟，院內到處是破、爛和髒，那時一般社會有一種變相的「民主作風」，校內也難免有此風氣，院內此風更盛。附屬醫院醫師們和台大當局惹起衝突（記得原因是人事問題），而醫師們的空前絕後的罷診事件就在此時發

生。^④

邱林淵：在日據時代，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的體制上，副手分「有月給」和「無月給」兩種；另外，還有一種助手，說好聽些叫「助教」。不過，光復後，國民黨來接收，卻不承認那批畢業後留在醫院工作的學弟們，並且不給他們任何職務，這當然就侵犯了他們的工作權啊！這一點是很不合理的。

許強於是就起來帶頭，領導他們向國民黨提出要求。

我們是第一屆畢業生，資格上算是最老的，他們是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等；問題出在有的人打算畢業後，在醫院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出國深造，結果，因為沒有證書，就沒有機會了。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要求一定要給聘書，只要給個職務，讓我們有飯吃，也可以看病，要求不高嘛！可是，學校當局就是不願承認啊！吃飯權沒有了，聘書也不給你，我們向學校校長提出要求，他當然不同意；所以，大家生氣了，就開始罷診。

罷診事件是許強推動的。當時，許強一方面領導醫師罷診，一方面製造社會輿論。那時候，許強已經認識蘇新（佳里人）了，蘇新是《人民導報》的總編輯，宋斐如是社長（教育處副處長），他們都支持罷診的行動。

翁廷俊：直到四月九日，羅校長返台，於台北機場發表談話表示：蔣總統甚為關切台大問題，指示儘速辦理。羅校長即於次日召見醫師代表，問明罷診的原由。林天賜先生、林天祐先生和我回答說，我們自己教出來的畢業生，得不到臨床訓練機會，不要薪水而只要求一張憑證而不可得。羅校長當場答應我們的要求，問題迅速解決。於是四月十一日恢復門診，一星期後，不僅各

科編制內缺額的聘書發出，原先只要求無薪助理醫師聘書的人也接到有薪助理醫師之聘書，整個罷診風波於此告一段落。^⑤

楊思標：時隔四十年，如今回憶這宗不幸事件，好比兩個兄弟從小在不同文化教育制度，不同語言習慣環境下成長五十年後，再聚時，未經充分的溝通及互相諒解下，所引起的摩擦，或許是免不了的小插曲，經過充分溝通應該可以避免或化解的。^⑥

讀書活動

台大醫院罷診風波，終於成功落幕了。然而，只要社會潛存的基本矛盾沒有得到解決，歷史的「悲劇」就不到落幕的時刻。

不到一年之後的一九四七年二月底，一場比這場罷診事件更大的風暴，就因為延平路上的緝煙「摩擦」，點燃了全島民眾抗暴的「二二八」烽火。經歷了一場「二二八事變」後，絕大部分的台灣青年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狀態，他們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

事實是，大部分進步的台灣青年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了；他們後來便通過對同時涵蓋大陸與台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略規律的認識，轉而傾向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

在那樣的大時代裡，台大醫院裡據說以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為主的部分醫生們，也祕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

李鎮源：光復之初，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我們心裡都感到無比興奮，甚至寫了標語歡迎國軍到來。然而目睹了來接收的文武官員腐敗的行為，慢慢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特別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台灣菁英，或者被殺、或者失蹤。一般民心，受到這事件影響，紛紛背離。而共產黨藉著宣傳優勢，獲得民心支持，迫使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來。因此當時（的）共產黨，不管是形象或者是民心，都比國民黨還要好，許多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受了這樣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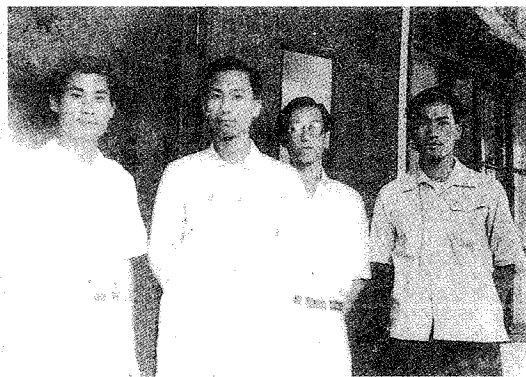
劉順娣：婚後，我們陸續續地生了五個孩子。許強處處為公不為私，從來不管家務事；即使是颱風天，他仍然忙著照顧病人，也不管那四、五個小孩。我自己是個除了醫學專業之外，什麼也不懂的人；沒什麼思想。他從來也沒跟我談過什麼思想問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思想？更不知道，他以後會走上那條路。

顏世鴻：許強先生究竟是如何走到這一條路上來的呢？對此，我一無所知。我向來不問他人的私事，尤其不敢問胡鑫麟先生。我對胡先生的脾氣很清楚，問了，他也不會談的，說不定還會遭到一陣罵，況且可能連胡先生也不會知道。如果許先生不自己說，胡先生也不會去問人家私事。胡先生與我一樣，除了自然知道的，或可以由前後推理的，一向不去管人家的私事。何況，這種事，知道愈少愈好。

事實上，許強他們一開始所認同的祖國是蔣介石領導的祖國，為什麼像他們這樣優秀的青年會對蔣介石政府失望？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二二八事變」讓他們思考到必須在「紅色祖國」和「白色祖國」中選擇，最後，當然是選擇了前者。其實，這說起來也是很簡單的；因為在日據時期，年輕人讀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書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到處都可以買到這些書。日本人在思



1947年，許強升任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劉順娣／提供，藍博洲／翻拍）



台大第三內科主任時期的許強（左二）。（劉順娣／提供）



1948年11月24日，許強臨床教學。（洪祖培教授／提供）



1948年11月24日，許強臨床教學。（洪祖培教授／提供）

想上是不干涉的，他們在乎的是行動。

胡鑫麟：我是一九一九年出生於台南，……在台北高等學校讀完四年的尋常科和三年的高等科，我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算起來是第四屆的學子。……二二八事件後，目睹屠殺和逮捕，那種恐懼實在無以名之。隨著時間的流逝，恐懼也漸漸忘懷，又敢出來做一些自以為應該做的事了。……世界思潮所致，學生時代我們多少讀過社會主義的著作。日本殖民統治雖然控制人民思想，卻不限制知識分子讀什麼書，馬克思主義的書，四處都買得到，不會像後來的國民黨重重限制，這本書也不能讀、那本書也不能看。以前日本京都大學有位名學者（河上肇）講共產主義經濟的，許多人受他影響。我也讀過孫文日文版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④，我很贊成新民主主義的說法……不過我讀得最多的是中國三〇年代的小說。^⑤

蘇友鵬：一九四九年，我畢業於台大醫學院；然後就進入台大醫院耳鼻喉科，擔任醫師兼助教，直到被國民黨的特務組織逮捕為止。

在台大醫院時，我們搞了一個讀書會，但是規模並不大，主要是讀一些三〇年代的書籍；像是巴金、茅盾、老舍、魯迅的作品。……我們當時的組織就是這個讀書會而已。

我和許強他們的組織，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許強當時在福利社的福利委員會工作，為員工的福利投入不少心力。儘管我和許強沒有正式的思想討論，但是與他長年相處下來，福利委員會有些日文書進來時，他都會拿給我看。當時他也推薦我參加組織，並且要我寫自傳，但是我太忙了；有時候，晚上，他會到耳鼻喉室來找我聊天。^⑥

邱林淵：我記得，在高等學校時期，許強向我們這些同級、較要好的朋友介紹過河上肇的思

想。所以，我們在日據時代已經看過河上肇的《貧乏物語》了。這本書有很特殊的基本知識在裡面，對當時的我們，影響很大。

在帝大醫學部時期，我並沒有和許強他們有太多思想上的接觸。蕭道應醫學部沒有讀畢業，好像是念到要實習的那一年，就去大陸抗戰了。至於許強，他的思想就比較進步，這是有原因的。其一是受了教我們幾個學生普通話的徐征的影響，他是台大文學院的老師，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了。

一九四六年，有一陣子，許強不見了。他當時只對我說：「有事要到上海。」可是，我無法確定，他究竟去了沒有？後來，再見到他時，我才知道，他真的到過上海，而且找到李偉光（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和地下黨的組織發生了聯繫。回到台灣後，他就比以前要更加活躍了。

我和許強、蕭道應等人，原來就交情不錯。許強一向很關心我們這些朋友，也很希望我們的思想能夠進步，看問題的眼光可以更遠大。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而國民黨報紙的資料又都是假的；所以，他會拿一些解放區的材料給我們看。另外，他還叫我們聽來自張家口解放區介紹解放戰爭情況的日語廣播。可以這麼說，我們那幾個同學，對於解放區的知識，大多是從許強那裡獲得的。

看了許強給我們的關於解放區的資料以後，我感到他們共產黨人真的是在為中國奮鬥，比較有前途，而且，中國將來就應該有這樣進步的社會才對。所以，我覺得，為中國的革命工作，要比我去做一些無足輕重的事業，來得有意義。從那之後，我開始想離開台灣，到大陸解放區去。

一九四八年底，我們一起出來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吳萬耀，嘉義朴子人，高等學校同期的

學生，醫校晚我一期；另一個是王慶壽，艱艱人。我們先到香港，再進大陸。我當時也不想回來台灣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討厭國民黨，不滿它的專橫無理。

當我決定要離開台灣的時候，曾向幾個人說過這事；第一個是蕭道應，第二個是許強，第三個是胡鑫麟，第四個是翁廷俊；我就只跟他們四個人說。當時，我有找許強一起走；不過，他說，他暫時還離不開，大概要再一年後，他才可能過去。可是，不到一年，他就被抓走了。

地下組織

《安全局機密文件》祕載：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派台灣彰化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同年九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同年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洽調來台幹部。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嘉義新港籍幹部張志忠等，分批到上海，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同年四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七月，蔡孝乾潛台，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本人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機構工作。張志忠則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⁴⁰

國民黨特務機構所掌握的情報進一步指稱，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至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在香港祕密舉行「台灣工作幹部會議」期間，「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北區建立的組織包括：

「台北市工作委員會」，下轄九個支部；「台北市學生工作委員會」，下轄三個支部；「郵電職工總支部」，下轄兩個支部；一共有黨員一百六十三名，占了全省黨員人數的五分之二。⁴¹

關於「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的成立過程與內容，《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的相關檔案指稱：

一九四七年六月，台大醫學院助教郭琇琮參加地下黨組織。同年秋天，「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十月，郭琇琮充任該委員會委員。一九四八年二月，許強由郭琇琮親自吸收，加入地下黨。同年春天，「台大醫學院支部」成立。五月，郭琇琮前往香港，參加「台灣工作幹部會議」；六月底返台，代理「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不久，郭琇琮正式擔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負責人許強）。⁴²

《安全局機密文件》另載，蕭道應於「三十七（一九四八）年春，擔任台大醫學院匪黨支部書記」。⁴³

如果官方檔案確屬事實的話，那麼，所謂「台大醫學院支部書記」究竟是蕭道應還是許強呢？

林書揚：我是麻豆人。許強是我南二中的學長。一九五〇年五月卅一日，我在家裡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實際監禁三十四年七個月。

蔡孝乾這個人的名字，我在日據時代就會經聽我的表兄莊孟侯提過。當時，他並不是特別提出蔡孝乾來介紹，而是談到一些流亡大陸的、早期台灣社會運動的領導者的人名時，也提到蔡孝乾這個名字。

光復以後，我又聽到一個從大陸回來的親戚提到他。我的親戚說：「聽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派

一個台灣出身的幹部，叫做蔡前的，回來台灣進行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的組織工作。」

他所說的「蔡前」，其實就是蔡孝乾。當時，儘管我的親戚並沒特別交代，我們也知道這個消息的敏感性，所以，聽了以後，除了和一些同時在看左派書籍的朋友提過之外，也沒有擴大，到處去說。當然，我和那些同時在看左派書籍的朋友多少有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我們的看法是：「這個人累積了那麼多的運動經驗，又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一定是一個相當有領導力、相當強的人。這個蔡孝乾如果真的回來台灣，恐怕就是下一個階段的台灣政治的主導人物。」當時，我們的確是有那樣的暗中的期待心理。只是，我們都沒有想到以後會是什麼樣的變局？而蔡孝乾又有怎麼樣的下落？^⑤

胡鑫麟：我被捕，是因為蔡孝乾的關係。

其實當年蔡孝乾初來台灣時，省政府馬上就知道了。杜聰明先生時任參政員，後來是省府委員，在省政府開會，有什麼消息，回到台大醫院，有時會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告訴我們說，共產黨那邊派個「姓蔡的人」來了，我們要提防國民黨，也要提防共產黨。……

我覺得很奇怪，中共派人來，係屬極機密，為什麼國民黨會得悉。

我之所以會加入組織，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和自己的處境。經過戰爭的慘烈轟炸，台大醫院的建築也被炸，我們一直在半毀的醫院，事倍功半地工作。屢次向學校反映，學校都說，要做什麼研究，用什麼儀器，你寫來吧。於是我們寫了，交上去，沒有回音，寫一次，再寫一次，再寫一次，還是沒有回音，簡直每天都在寫申請表。在那種情況下，根本沒辦法研究。什麼都沒有，無從研究起。大家都不滿，都很憤慨。

你說日本政府很差，但研究經費從來沒問題，國民政府來了以後，什麼都有問題了。久而久之，大家認為不能再如此這般地繼續下去，主張想個辦法，以便脫離困境，改善情形。最重要的是，個人的力量有限，應該有個組織，大家一起做事。這種想法，漸漸成爲大家的共識了。

一方面，國民黨在大陸已遭到人民唾棄，二二八事件以後在台灣，更是完全失信於民。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當然是主張民主改革的共產黨了。當時的潮流就是這樣。全中國標榜公正進步的報刊，幾乎都響應中共，學潮所示，青年知識分子都心向共黨，連外國，包括美國，也看好中共。台灣的情形也差不多，想做官發財的，就投靠國民黨，想爲重建台灣盡一點力，就要借重中共。……

我不記得蔡孝乾是什麼時候來找我的。那時中國內戰方熾，一直到蔣介石撤退來台，國民黨才開始大舉捉「匪諜」。蔡孝乾透過朋友的介紹，到醫院來找我，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試探。後來我之所以答應，是爲了台灣。當時我的想法是，爲了台灣好，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蔡孝乾來找我時，一直用化名，所以我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來歷和身分。雖然杜聰明先生曾告訴我，共產黨那邊有一個姓蔡的人要來，我並沒有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加入組織後，照規矩是他直接和我聯絡，我再和其他人聯絡，這種單線聯絡，使我對組織的情況無法很清楚。

蔡孝乾從來沒有提到「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一直到我被捉進保密局，偵訊中，才第一次聽到這些名詞。先前我只知道他負責一個地下組織，有豐富經驗，又有力量，到入獄後，我才知道蔡孝乾這個名字。^⑥

蕭道應：二二八後，我經由高雄電台台長莊孟倫介紹，認識了張志忠；然後便由張志忠吸收入

黨。……那時候，我在台大法醫研究室服務。雖然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是黨員，可我沒有介紹過任何一個人入黨。有一天，張志忠叫我去主持一個小組會議；他說，有一個支部，你什麼時候去主持開會。我於是在他所說的時間，前往南昌街謝桂林醫師家，進去一看，在座的都是些醫生，包括：許強、郭琇琮、謝桂林、翁廷俊在內。……我們沒有講什麼名義，更不用說什麼「支部書記」或其他什麼，只是分工。現在看來，它可能是「台北市委」下面所屬的醫師組織，但不是台大醫學院方面的支部。那時候，調來調去的，有危險就馬上調離。開完會後，我又被調走；它就由張志忠直接領導。後來，張志忠就把我和他們隔開來了。^⑤

邱林淵：那時候，許強還在新公園旁開了一家診所；一個叫邱魏根的桃園人，在他樓下賣水果，樓上則是診所。聽說，許強的診所，事實上就是他做地下工作的地點；開診所只是一個掩護。

許強的活動是很隱祕的，連我是他的好朋友都無從得知，我還是到了八〇年代，在日本見到胡鑫麟，聽他說了以後才知道的。我知道許強是地下黨員（其實用猜也可以猜得到），他搞了個診所，其實就是在做聯繫的工作。他曾經跟我說過：「我搞診所不是因為貪錢，是爲了做一點功德。」可是，他沒有說，這間診所是做爲組織聯繫用的。我們完全是由他平日一直追求進步、正派、樂於助人的表現去了解：的確，他這家診所並不是一般的診所。其實，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像兄弟一樣，許強有很多事情都會跟我說；雖然那個時候我的思想還不是很進步。不過，牽涉到組織祕密的事，他就不會講了。

顏世鴻：我要強調的是，台大醫學院第一個在外面開業看病的就是許強。這在當時很不得台大少數同仁的諒解，連學生都罵他愛錢；畢竟那時候的醫生都還富有理想性。不過，據我後來在獄中所知，許強並不是爲了錢而出來開業的。其實，這是蔡孝乾要他這麼做的；因爲蔡孝乾當時欠缺活動經費嘛！許強先生賺的錢都讓老蔡拿走了（許強應該直屬蔡孝乾）。爲了澄清一些人心內的誤會，我認爲有必要把這一點提出來。

許扶美：我是許強醫師的二女兒。記得，小時候，爸爸在台大醫院工作，又在新公園門口對面診所兼差，每逢周六，我和大姊就坐三輪車去台大醫院看爸爸，我們常在台大醫院又寬又長的走廊跑來跑去，新公園也是常玩之地。……爸爸非常疼我們，常常帶我去日本料理店吃飯，因爲他知道，我最愛吃碎肉白菜卷……^⑥

在台大醫院院長室被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在國共內戰中全面潰敗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大陸，由廣州播遷台北。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蔣介石復職；三月十二日，陳誠內閣就任；台北國府的時代正式展開。三月廿二日，爲了政治安全的重建，在國防部設立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把大陸時期不同系統的特務機構加以一元化的集中加強，準備以恐怖手段來推行其在台的軍法統治。

事實上，更早之前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基隆中學師生逮捕事件爲序幕的、情治系統的祕密逮捕行動，早已在全省各地同時展開；各情治機構的監牢也已人滿爲患。

一九四九年十月間，郭琇琮將台灣省地圖及「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工作報告書，交給一位名

叫林秋興的同志，帶往香港；但是，啓程前，林秋興卻在基隆被捕。郭琇琮的身分暴露。情治機構於是展開嚴密偵查，並於一九五〇年一月起陸續逮捕與郭琇琮有關的「潛伏之匪諜」。

特務的魔爪終於也毫不留情地伸進台大醫院了。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和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在院長辦公室當場被捕。

胡寶珍：一九四八年，我畢業於台大醫學院，進入台大醫院皮膚科服務。被捕的時候，我正在醫院看病，有人來說：「院長有事找你！」我覺得莫名其妙，天底下哪裡有這回事？我在看診，院長找我做什麼？不可能的嘛！可我还是去了。到了院長室，我看到已經有十個人左右坐在那裡等我。

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我究竟是因為怎樣的關係被捕的？照理說，我是和郭琇琮關係比較近才是；可跟我一起被捕的許強、胡鑫麟和蘇友鵬，卻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真是覺得莫名其妙。其實，我也沒有人黨，就只是和郭琇琮談話而已。

胡鑫麟：當時台大校長是傅斯年，傅斯年有些分量，情治人員不敢太得罪他，不太敢逕行逮捕台大醫生，於是他們先去找傅斯年校長，要他點頭。

傅斯年說，這些人是我們台大的重要人士，要捉人，證據先拿出來，否則我不能交人。……

那時，保密局交不出證據來，雙方交涉後，傅斯年提出幾個條件，第一，不能用逮捕的方式，只能以傳訊的方式處理。傳訊進去後，如果有問題，立刻問明白，沒問題，立刻放人出來。如果要拘留，必須允諾家屬送東西進去。傅斯年說，「這些條件統統答應，我才交人。」

凡此種種，都是出獄後我才知道的。……

保密局答應傅斯年的條件，馬上就來台大醫院捉人。那時我們正要開主任會議，他們先是找魏火曜（院長）談，談完，直接就把許強和我從會議室帶走了。

蘇友鵬：我和許強醫師是同一天被捕的。被捕時，我在台大醫院耳鼻喉科擔任萬年的值班醫師。因為案情爆發，凡是有參加組織的，或是與組織有聯繫的，全被列為可疑分子，逮捕起來。在逮捕前，我們完全沒有聽到任何抓人的風聲。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大約是下午一、二點鐘，當時我正用鑷鉗診療一位鼻咽癌的患者。就在這時候，副院長林天賜先生從院長室撥來電話，要我立刻到院長室去。

一進院長室，我就看見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坐在沙發上，兩旁坐著兩個特務「保護」著。隨後，當時的眼科主任胡鑫麟也被找來。平常，我與胡鑫麟醫師很熟絡。我們都是台南人，而且都很喜歡音樂；我拉小提琴，他拉大提琴，時常一起合奏。他一見許強坐在那裡，心知不妙，當場臉色就發白。我看胡鑫麟的臉色不對，就知道慘了，一定是出事了。後來，胡寶珍也來了。他們把人一個一個叫到院長室來。

我們在那裡坐了一個多鐘頭，爲的是要等第一內科主任翁廷俊。不過，他沒有來。我後來才聽說，他事先獲得親戚通知，知道要逮捕他，所以溜掉了。結果，我和胡鑫麟、許強和胡寶珍，分別被帶上兩部停在外頭的吉普車。

在保密局南所

許強、胡鑫麟、蘇友鵬及胡寶珍等幾位醫師，隨即被帶離台大醫院院長辦公室，押往小南門附近，位於延平南路上的保密局總部，然後分別關在仿如人間地獄一般的保密局南所狹窄陰濕的不同押房，接受秘密偵訊。

胡寶珍：我們從院長室被押到醫院外頭，上了吉普車，隨即被送到現在總統府後面的保密局軍人監獄。在保密局，我們就被分別關在不同的押房裡。我那一間小小的押房一共關了十三個人。

胡鑫麟：保密局的牢房，我那間約兩、三坪大，關二、三十人，平均一坪住十人。那麼狹小的空間，晚上睡覺時，根本沒辦法同時躺下同時睡，要分班次，一部分人睡，一部分人站著，睡一會兒後，再換另一班次的人睡，另一班次的人站。輪到睡覺的人，躺在地上，一個挨著一個，緊緊地，間不容髮，密不通風。

牢房壁角有個小洞，牢飯從小洞送進來。從那裡偷偷往外看，可以看見走廊的動靜……。

吳澍培：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星期六，晚上十一點左右，我在宿舍被捕。當時，我才十七歲，還是台中一中高二的學生。被捕以後，我先關在台中火車站倉庫；半夜兩點左右，我連同八、九個陸續被抓來的不認識的人，一起被推上夜行的貨車車廂；天快亮時，火車駛抵台北。下車以後，我們又被推上一輛卡車，然後蒙上眼睛，把我們載到一個地方。進了牢房以後，那些先來的難友才告訴我們，我們被關的地方就是仿如人間地獄一般的保密局南所。我後來知道，那裡

就是保密局總部，在延平南路靠近小南門的地方，也就是後來的警備總部（現在的海巡部）後方。

我進去的時候，那個押房已經關了五、六個人。那段期間，每天都有人調進調出的。有一天，大概是一個星期後，許強醫師也進來了。起初，剛進牢房的人，因為互相不認識，所以彼此就不太講話。因此，我並不知道他是誰？然而，既然大家都關在一個押房，整天都生活在一起，還是要說些話的。最起碼，彼此總該知道互相怎麼稱呼吧！這樣，一、兩天後，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許強了；但究竟許強是個怎麼樣的人？我還是不清楚，也不方便問。

胡寶珍：在那裡關了一年之後，我才被叫去偵訊。這段期間，我也沒有受到什麼刑求。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被抓的人太多了，他們根本沒有時間一個一個偵訊，也沒有時間一個一個刑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上頭的人都已經供了，他們也就不需要訊問我了。

吳澍培：我和許強先生在那個押房一起關了三個月左右。我記得，許強進去一個多月以後才被調出去偵訊，時間很短就回來了，也沒有受到什麼刑求；一直到七、八月左右，我調離那個押房時，他也沒被再調去問過。至於我離開以後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

胡鑫麟：關進去保密局，在那裡，根本無所謂偵查和判刑。有的人犯被叫去問一問，有的連問都不曾被問過。保密局為什麼捉人捉個不停，為什麼要捉那麼多人？捉進來，為什麼又愛問不問，可問可不問的？關久了，謎底方才揭曉。

當時在「肅清共匪」的首要目標下，保密局每捉一個人，有兩萬元的獎金——我在台大當醫生的月薪才幾百元。辦案人員拚老命地捉人，但是問案的人沒有獎金，當然就懶得問。於是捉的

人很忙，問的人很閒，被捉的人，只能呆坐黑牢了。……沒問案，怎麼判刑呢？簡單得很，一旦被抓進保密局，就是有罪，而量刑就看軍法處。^②

吳澍培：那時候，除了被調出去偵訊，也沒什麼事情。我們關在押房裡頭，沒有任何書報可看，互相之間也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因此，平常就只有下下棋了。同房一個比我先進去的竹崎來的醫生——林立^③，年紀比我大很多，很會下棋。因為我是押房裡頭最年輕的人吧！他就常常找我不下。我不太會下棋，他讓我車、馬、包，我還是下輸他。有一天，林立跟我下棋的時候，許強先生也在一邊觀棋。結果，我輸了。許強就說，他的棋下得還可以，他也要跟林立下一盤。他和林立於是就誰也不讓誰，公平下。結果，許強的棋力差了一點，輸了那盤棋。

自從下過那盤棋以後，許強先生後來就經常找我下棋。當時，保密局的氣氛非常肅殺，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戒心理！儘管已經一起下過幾盤棋了，下棋時，我們彼此仍然不太說話，只是偶爾簡單寒暄一些無關案情的話題。漸漸地，他知道我還是個中學生，怎麼進來的；我也知道他不是台大醫學院的教授，而且還是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

一般來講，保密局是一個秘密的機構，外界不太可能知道我們被關在那裡。但是，許強卻跟我們不一樣，他的家人還能夠送些吃的或穿的日用品給他。許強的性格很開朗大方，每次，他一定平均分配給同押房的人一起吃；包括其中兩、三個可能是進來監視我們的人。有一次，我正和許強先生下棋的時候，又有人送東西進來給他。我沒問他，他卻主動告訴我，保密局裡頭，有個上校還是什麼官的太太，以前是他的患者，常常去給他看病，跟他很熟，所以他太太就託他帶東西進來。

胡鑫麟：事實上，整個保密局的人犯裡，能有家屬送東西進去的，只有我們這些巨大的人。其他的人，連保密局在什麼地方，都是高度機密，秘密被捉，形同秘密失蹤，完全與外界隔離。後來我當然明白了，保密局根本是個「進得去、出不來」，又有進無出的地方。……那地方說要送東西進去，沒人敢送，也沒法子送。我們幾個台大的醫生，竟然有家人送毯子送魚鬆送肉鬆來，別人簡直不敢想像。^④

吳澍培：一直到現在，我還印象深刻地記得許強先生跟我說過的一番話。那是我調離南所前不久的事。那天，我們在下棋的時候，他一邊下，一邊談了很多他過去的經歷。我想，他是含蓄地向我表白，他是如何走到革命這條路的吧！

「年輕人啊！」我記得，最後，他語重心長地鼓勵我說：「總是要在動盪的時代裡頭才能成長！才能認清是非！才能找出一條自己應該走的路。你還年輕，是不是能出去還不曉得？但我想應該是可以的。出去以後，只要能夠把自己的人生觀跟時代聯繫起來，走自己的路，前途還是明亮的！……」

我那時候還年輕，所以沒有聽懂他這此話。其實，他也是向我暗示：他已經覺悟自己是不能出去的了。

移監高砂鐵工廠

在保密局南所關押一段時間之後，許強等人又被移送由高砂鐵工廠改建的保密局北所監獄。

高砂鐵工廠位於台北橋旁，所有人辜顏碧霞因牽連呂赫若的關係被捕，她所擁有的鐵工廠也被沒收。因為所屬的看守所已經關不下一天一天抓來的所謂「匪諜」，保密局於是將高砂鐵工廠改建為保密局的臨時看守所，一般稱之為「北所」。工廠原有人辜顏碧霞，也和許強醫師等無以數計不分性別的受難者，一起被關在水泥都還沒有乾的押房裡頭。

胡鑫麟：我們總共在保密局（南所）關了多久，無法詳細計算。牢中無歲月，白天黑夜在意識模糊中流逝。記得大約是韓戰開始時，保密局捉了太多人，牢房再也擠不下去，就把大橋旁的（高砂）鐵工廠，當做臨時的看守所（北所），把我們移監到那裡去。……那陣子突然飛機聲音很多，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聽看守的人說韓戰爆發了。以此推算，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以後，麥克阿瑟的飛機來來去去的聲音。

韓戰爆發，對我們的判決很有影響。本來死刑、無期，或十五年的，案情輕重其實差不多，局勢如果緊張，他們就往死刑判，局勢和緩，就往十五年判。

高明柏：我是台北人，在台北市稅捐處當雇員。一九五〇年，我才十九歲；五月十三日，凌晨兩、三點，我在睡夢中被特務抓到保密局南所。關了一個月後，我被送到高砂鐵工廠，與我同房的都是醫生。我進牢房時，他們正在擦地板，其中有位醫生看我沒內衣褲可換洗，就拿一套給我。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許強醫師。

林賜安：我是高雄人，一九五〇年五月廿九日被捕。當時，我在高雄市政府稅捐處工作。我這個案子屬於「台北學委案」，一共槍決了十六個人。

我被捕後，先在高雄警察局關了將近一個星期；六月初才被送到台北北所（高砂鐵工廠）。那

段期間，同房關的、比較有印象的難友有：許強、林立、江漢津、蕭坤裕和王白淵。同樣是醫生的原因吧！林立和許強兩人似乎很熟。

許強經常和江漢津下圍棋。我帶進去的一件毯子就常常給他們鋪在地上，下棋用；結果，毯子有毛變沒毛。棋盤，是另外用畫的；當時，台大校長會送東西來給許強，他們就拿一塊紙板來畫。棋子，則是用飯粒揉一些棉被裡的棉絮（這樣比較不容易裂）做成的。通常，較不會走的拿黑棋，先手；江漢津的棋藝略高一些，所以，江漢津拿白棋，許強拿黑棋。

江漢津：我是台中豐原人，一九一四年出生；被捕前，是鄉村的小學老師。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下午，我在課堂上被帶走；二十五年又三個月後才回到家。

大約是六月，我記得，韓戰還沒發生的時候，我從台北市警局所屬的「南署」拘留所，移送由高砂鐵工廠改建的保密局北所。我到北所的時候，押房裡頭的水泥還沒有乾，隨手搖一搖，磚上的水泥便紛紛脫落。可以想見，施工的時候一定是偷工減料的。

不久，台北案的許強醫生，也從保密局南所移來北所，並且前後和我同房有一個月之久。許強和我同年。同房難友中還有一位竹崎的醫生林立，以及文學家王白淵，我們四個都是差不多年齡的人。許強話不多，在押房裡更不輕易談自己的思想、案情。有一段時期，我們兩人同「桌」（同一個餐盤、六人一盤）吃飯。

在北所，我們一天有兩餐飯可吃。早餐，是稀飯配水煮花生。稀飯，隨便我們吃；一個人通常要吃五、六碗（大碗）才會飽，也有食量大者都吃七、八碗。花生，一個人平均分不到十粒；另外，花生湯有點鹹，我們都用來攪稀飯。晚餐，吃米飯（通常是發霉的，帶雜質的米），鹹菜，

從來沒有魚或肉，再加上冬瓜湯。長期下來，大家都面黃肌瘦。

我和許強等難友就是在這種困苦歲月中相處的。在那裡，要看書也沒有書；聊天，重要的事不能談，生活上的瑣事談來談去就是那麼一回事，大家也覺得沒趣。後來，大家就想到以下圍棋來消磨時間。經過一番捉對廝殺之後，我和許強兩人算是棋逢敵手，因此就常和他下棋。我們用飯粒揉上棉絮來做棋子，棋盤就在地上用畫的。我的棋藝稍高，一直到分手時，還讓他兩子。因為下棋，就更不需要費心交談來打發時間了！⁸⁸

林賜安：我在那裡感覺到，許強確實是一個人格者。怎麼說？當時，我聽說他是胃腸科的專家，一點醫藥常識都沒有的我就問他：「什麼胃腸藥比較好？」結果，他說：「最要緊的是生活正常！不能光靠藥物。」

有一次，我們「學委案」的一個難友（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被叫出去問話；他走著出去卻被抬著回來。他的大腿腫得連褲子都脫不下來，許強就把台大校長送進來的罐頭，磨成刀片，然後把他的褲子割破。許強告訴我，褲子這樣繃著，那個難友會很難受。那時候，押房裡頭根本沒有藥可以治療，許強就幫他輕輕按摩。靠著同房難友輪流按摩，那個難友才逐漸恢復過來。

江漢津：許強被捕的時候，是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我聽說，他正在做一項有關胃腸內科非常重要的研究，但我不懂醫學，不知道他的研究在醫學學術上所有的重要性。我還聽說，許強除了在台大醫院上班之外，也在新公園附近開了一個私人診所；而地下黨領導人之一張志忠（化名楊春霖）也住在附近。兩人住得這麼近，我不知道許強是否認識他？與他又有什麼組織上的關係？

許強是台南縣佳里的鄉下人，農民子弟。北門地區是鹽分地帶，只有麻豆一帶的土地才可以耕種；一般說來，經濟條件都比較差。在這種環境下，許強能考上台南二中，可以說非常簡單。我想，許強出身貧窮鄉村的農家，在成長過程中，對城鄉差距、階級差別，自然會特別敏感，也就會有一定的階級意識；再加上受到佳里地區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前輩如蘇新、吳新榮等的影響，自然會有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產生。

林賜安：我看得出來，許強是重要的角色。在牢裡那樣的地方，他們那些屬於重要人物的人，心情自然較沉重，考慮的事當然也較多。我當時才二十歲左右，說起來也還不大成熟。許強算是前輩，他的心情多少……，所以我也不會去找他說話，怕影響他的心情。再說，在那種調查機關，情勢比較緊張，大家也不會講什麼。他雖然講話不多，但說出來的都很中肯；他曾對我說，他在加入共產黨時，就已經覺悟到會有今天！

江漢津：我記得，有一次，下棋的時候，許強突兀地向我輕聲評價同房的難友說：「老江，少年的不提，我們這一房四個年紀較大的人，據我的觀察，林立話不多，也不太與人來往，是一個真正的實踐者！至於王白淵，只知道嘴巴講講理論而已，談不上什麼實踐的能力……。」後來，王白淵無罪釋放；林立刑死馬場町。

林賜安：較早進來的人睡較後面，是押房自來的規矩。當時，林立睡最後面，再來是許強、江漢津；他們三個年紀也差不多，平常比較有話聊。七月初，一個空軍被關進來，我們才知道韓戰爆發。對這個變化，他們幾個重要人物私底下作了討論。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拿出來公開談，所以，原則上，我不應該也不方便打聽，究竟他們談了些什麼？

我和許強一起關同房有二、三個月，調房後，就沒有再看過他。直到送往軍法處後，我才間接聽到他已被槍決了！

再移軍法處看守所

保密局的偵訊告一段落後，台大醫院的醫師們又被移送台北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等待命運的最後宣判。這段期間，許強被關押在軍法處看守所一區第十五號房。

吳澍培：我再見到許強先生是調到青島東路軍法處的時候。軍法處的押房一共分成四區，樓下是一區和二區，有十六間押房；樓上是三區和四區，中間有一個大廳，隔間不同。當時，我在一區三號房；許強先生比我晚到，也在一區，第十五號房。我們雖然不同房，但他放封時會經過我的押房。

顏世鴻：我被捕以後，一直沒有碰見過許強先生，因為當時實在是人大擠了，一直要到九月二日移送軍法處看守所後，我才有機會見到他。有一天，許先生到我們的房外看病。當然是當病人，不是當醫師。當他看到我時，特意將手往脖子上一抹，微微一笑。大概他已經知道這一關是難逃了。

胡寶珍：我在高砂鐵工廠關了將近一年後，又被被送到軍法處等待判決。到了軍法處，就是龍蛇雜處了，也和殺人犯什麼的關在一起；我印象中還有十多個警察局長，和幾個孫立人屬下的軍官也被關在那裡。

許強被槍斃前的一段時期和我同房。當時，我們這間牢房關了二、三十人，擠得不得了，睡覺都要輪流，一個躺、一個就要用坐的。他曾對我說：「上頭只供出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人都沒有供出來。」……我其實並沒有參加組織，只是接受那樣的思想而已。在當時，相信這樣的思想，算是普遍的風氣；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我並不覺得有什麼遺憾，或什麼怨嘆！

蘇友鵬：在軍法處坐牢期間，我和許強老師同過房。那段期間，因為案子已經「結」了，我們幾乎無所不談。許強老師常用德文向我們闡述真理，他認為真理是有普遍性、妥當性的，是超越時間的；在真理之前，人人是平等的。他很重視科學，認為科學是一個個真理和定理累積起來的東西，不是魔術，也不是奇蹟。

判決

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

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裁定：許強與郭琇琮、吳思漢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另外，謝桂林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處死刑。

根據該判決書，許強「顛覆政府」的所謂「事實」是：「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參加叛亂組織後吸收胡鑫麟翁廷俊組成支部充任書記每兩週開會一次」。

接著，該判決書羅列了種種「理由」。其中屬於許強個人部分的是：

一、供稱「郭琇琮指示我和胡翁兩人合組一個支部」等語，罪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二、「於參加叛亂組織後擔任支部書記」，並「於叛徒中處於領導地位迭據分別供認不諱」。

三、與郭琇琮等十名同案「係台北市叛亂組織之首腦及主要匪幹策畫叛亂行動指使匪徒實施煽誘動搖分子擴展非法組織實達意圖破壞國體顛覆政府之程度依法均應處以極刑褫奪公權終身以昭炯戒」。

蘇友鵬：我們被判刑時，沒有人旁聽，沒有律師，沒有申述，沒有對質；其實，我們在被捕時就已經被判刑了，根本就不需要審判的程序，也沒有上訴的機會。

胡鑫麟：軍法處判刑約略有個方式：不識字的判五年，識字的、確實沒活動的，判十年，略略有些活動的，判十二至十五年，再上去就是無期徒刑，若有職銜的，比方說是書記或什麼委員，一律死刑。

所謂的職銜，（並）不是你真正的職銜，而是他們想像的職銜。……他心情不好時，封你是支部書記或小組長，一律死刑。他心情好時，判你無期，心情不好，就大筆一勾，判你死刑。……反正有個蔡孝乾在他們手中，隨便他做人事組織表，任由他封官。保密局就是封神台。……

許強被保密封神台封為支部書記。許、翁、我三個人構成的所謂「台大支部」的書記。（其實不只三個人，還多著呢。）^⑩

李鎮源：我並不知道許強先生是否參加共產黨。在他的判決書上並沒有說明。只說他是「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就事論事，我知道他們小組所討論的主要內容是改革，根本沒有過推翻政府的想法。這樣的判決是不公平的。至於他是否為共產黨員，或者參加共黨的組織，

我自己已不清楚，我想這有待歷史的考證與論斷。

邱林淵：當時，地下黨台大醫學院的支部書記是許強。據說，參加活動的有五個人：胡鑫麟、許強、翁廷俊、謝有福；還有一個人的名字，我不記得了。謝有福過世時，胡鑫麟曾經很感傷地說：「現在，就剩下我一個人了！」由這句話可見：謝有福是漏網之魚，他在組織裡的活動，並沒有暴露出來。不過，這也是到一九八〇年代才弄清楚的事情，我主要是從胡鑫麟處獲知的。

蘇友鵬：實際上，許強和胡鑫麟是直接和組織有關，這是胡鑫麟醫師自己說的，他的案子主要是和蔡孝乾有牽連；是不是和郭琇琮有關？就不清楚了。也就是因為這樣，蔡孝乾被破獲後，一切和他有關聯的人都被抓了。

當時台大醫院讀書的人就我們幾個，其他有興趣的人有多少？我並不知道。而且，當時的台大醫院也看不出來有什麼活動。我曾聽胡鑫麟醫師說，台大醫院裡和組織有關聯的，不只他們這些人，只是許強他們沒有供出來，所以案情才沒有再擴散……。

援救

九月廿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所謂「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39）安潔字第二二〇四號」判決書，呈報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最後定奪。^⑪

許強和郭琇琮等幾位台大醫師及其他涉案者的最終命運，於是就在蔣經國的一念之間。

許強的一位病人和台大醫院的同事，於是展開援救行動；他們分別找上傅斯年校長，甚至設法透過關係，拜託蔣經國……。

劉順娣：許強被捕之前，曾經有個刑警到家裡來，東看西看的。他下班後，我把情況告訴他，並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我也不知道！」然後就沒再說什麼了。

許強是個老實人，人很好。我認為他不可能在外頭亂搞什麼。

後來，我還是因為台大醫院派人來通知，才知道他被抓了。但是，我送東西去，卻找不到人。後來，還是因為他一個患者，跟裡頭的人認識，在那個患者的安排下，我才背著兩歲大的兒子，和他見了一面。他瘦了很多，也沒跟我多說什麼，只說：「孩子顧好，要認命！」

謝呈周：有一天，許太太倉皇來找我；她告訴我，許醫師被軍法處帶走，請我幫忙。我立刻去找台灣大學傅斯年校長，請他幫忙。傅斯年校長告訴我，他底下許多位醫師都出了問題，他可能也會受到處分，無法幫忙。他然後拿出許強醫師的自白書給我看，其中有一條說：有一位郭醫師帶資料到研究室找他，向他介紹蘇聯的醫學制度；他認為蘇聯的醫學制度非常好，但他對蘇聯醫學制度的興趣完全是學術上的研究，並沒有參加其他的政治活動……

許強醫師只是對蘇聯的醫學制度做學術研究，並沒有參與政治，這樣就被捕；真是令人心寒。我認為，許強醫師是一位很優秀的醫師，他被捕的原因不嚴重，大概很快就會被放出來，政府若放他出來，他一定會用他的醫術照顧很多患者，可以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

李鎮源：當時我們大家透過杜聰明院長，以及郭松根教務主任，請傅斯年校長是否能以各種方式或管道保釋許強先生。最初，傅斯年校長告知我們許強先生被關一陣子應該就會沒事。我們也想辦法透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校友拜託蔣經國先生幫忙，然而都無法挽回。三、四個月之後，當我們再去找傅斯年校長時，他無奈地表示蔣介石已經下令，只要是組織首領，不論組織大小、情節輕重，一概槍斃處死，絕無轉圜的餘地了。

拒絕悔過

對於「匪諜」，蔣經國認為「絕不能客氣，絕不能講人道，要幹就幹得徹底，使他絕無存在的機會」。因此，向來主張採取古人所說「除惡務盡」的處理態度。^①

那麼，除非許強願意「悔過自新」，否則的話，蔣經國又怎麼會在乎許強一家人的「痛哭啼叫」呢？

問題是，在日籍老師眼裡是個絕無僅有「富有氣概」的台灣人的許強，面對那樣難堪的生死抉擇的考驗時，他會願意以個人政治信仰的「轉向」，換得「自新」的待遇而苟存於世嗎？

胡鑫麟：我們剛被抓進去時，保密局就叫許強寫「感想」。許強果真寫了，寫一些台大醫院裡面的問題和改善方式。移往軍法處時，就不是這樣了，要他寫「悔過書」，意思是說，如果寫悔過書，可免一死。許強不肯，說，「我沒做錯什麼事，為什麼要寫悔過書？再說，如果台灣人走上這條路，也是你們政府逼的。假使政府不是如此惡質，台灣人怎會起反感。」

軍法處堅持許強寫悔過書，許強始終拒絕寫。他們就叫他太太和小孩來勸他。他太太哭著對他說，「許強，寫一張，寫一張，只要你寫一張，眼睛閉上地寫，至少保住一條性命。」

我和許強不同房，這些事情是聽別人說的。後來許強到底有沒有寫悔過書，我不知道，據了解是抵不過妻兒的苦求哭喊而寫了。但是事後證實，拒絕寫悔過書，是死路一條，寫悔過書，也是死路一條。只要被封做書記，就逃不過槍斃的命運。

謝呈周：台灣大學傅斯年校長不肯幫忙，我就盡量再想辦法。我想到，以前在里鄰大會時，認識一位警備司令部政治科的吳科長，我就帶許太太去找吳科長。我向吳科長說，許強醫師是一位良醫，我很感激他治好我的胃病，請吳科長幫忙想辦法救許醫師。吳科長接受我的拜託，當場寫了一張介紹信。

第二天，我和許太太就帶著吳科長的介紹信，到軍法處的監獄（台北喜來登大飯店之舊址）。我們遞出介紹信後，在軍法處外面等了很久，等到後來，心裡就開始緊張、害怕，想說為什麼要這麼久呢？說不定等會兒連我也要抓進去？我們等了一個多鐘頭，才有人來招手帶我們進去一個房間內等。不久，我們看見穿著紅色短褲的許醫師，從一個如同狗洞一般的牆洞鑽出來。

會面時間只有三分鐘。許醫師和他太太談話，內容都是家內事，我不便加入。過了二分鐘，軍法處的人開始催我們離開。我急忙向許醫師說：「你立刻寫三封悔過書，寄給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軍法處及警備司令部，你就有機會被放出來。」許醫師對我說，他不願寫悔過書。當時我已經沒有時間可以勸他，急得大聲叫：「你不要囉唆，照我的話去做就對了！」

三天後，許太太來找我，向我說許醫師「注死」了，我認為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但是，許醫師執意不肯寫悔過書，我也沒辦法。

可我不死心，十月十日，我又寫了一封信勸他：

強博士吾兄勛鑒：謹啓者，前月因蒙司令部特別恩典與兄接見以來經已二旬，諒必玉體康安為慰。惟吾兄過去一時純被不良分子欺騙，致入迷途，實感遺憾。此次，弟深望吾兄迅速放棄過去思想，改過自新者，必得政府多予原諒與同情。弟因深知吾兄抱有優秀醫術，早日能得身體自由而貢獻社會人士者，係屬無上痛快事。茲為救護同胞之一念而勸勉也。希望接信之際立刻悔悟，自書呈文，致軍法處長包（啓黃），轉呈國防部，表白為要，是所至禱。

秋安

弟 謝呈周拜

強博士吾兄勛鑒：謹啓者前月因蒙司令部特別恩典與兄接見以來經已二旬諒必玉體康安為慰惟吾兄過去一時純被不良分子欺騙致入迷途實感遺憾此次弟深望吾兄迅速放棄過去思想改過自新者必得政府多予原諒與同情弟因深知吾兄抱有優秀醫術早日能得身體自由而貢獻社會人士者係屬無上痛快事茲為救護同胞之一念而勸勉也希望接信之際立刻悔悟自書呈文致軍法處長包轉呈國防部表白為要是所至禱
秋安
弟 謝呈周拜

1950年10月10日，謝呈周勸許強「改過自新」的信。



許強的病人謝呈周（右）及其子。（藍博洲／攝）

邱林淵：許強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一直要求進步，而且是一個正派的人，樂於幫助人，醫德也非常好。他被捕時，身分雖然暴露了，不過，他並沒有揭露任何一個人，就他自己一個人承擔。後來，傅斯年校長極力要保他。可是，國民黨所提出來的條件太苛刻了，當然他不幹啊！關於這個，我是從別的地方聽來的；就是說，要許強在蔣介石的照片前下跪、認罪。

顏世鴻：我覺得，政治，說起來是很無情的！當時，雖然也有投機分子；但是，這些信仰社會主義的理想者，卻明知走這條路要用性命去賭，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下去。其實，許強當時是台灣消化系統疾病的最高權威，有很多名人都給他看過診，如果他有意求生，或許做得到。我聽說，他的家人屢次要他寫「白白書」，他後來倒是寫了。不過是照他自己的意思表達，而不是能使審查的法官接受的形式。我想，他大概不堪在那麼多人走了以後，自己留下來吧！

遺書

許強被捕以後一直不曾寫信回家。可是，就在他槍決前不久，劉順娣卻收到一封他寄來的家書。

逕啓者：

十八日的來信，二十日接到了。林君送東西來，真是一個好意。但我也顧及她的薪水生活，老早謝絕了。請你放心吧！

家內事情一切有你，我已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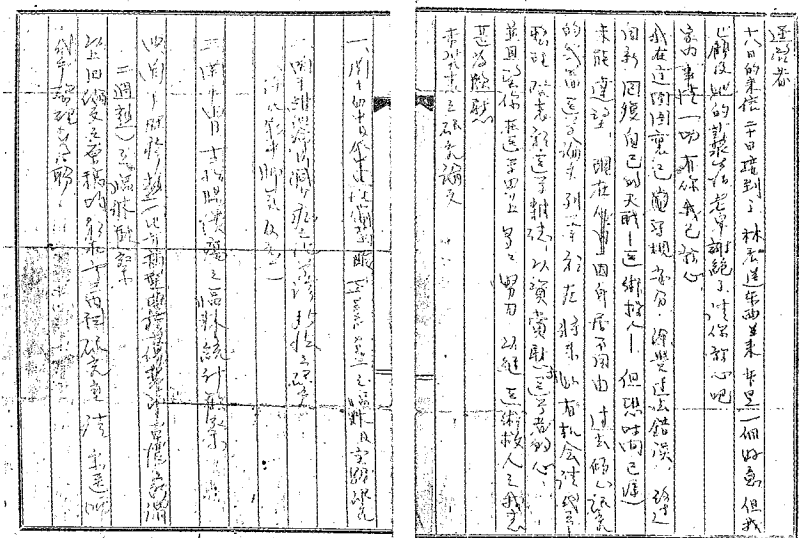
我在這囹圄裡已守規安分，深覺過去錯誤，改過自新，回復自己的天職——醫術救人——但恐時間已遲，未能達望。現在因身居不自由，過去傾心研究的幾篇醫學論文列舉於左，將來如有機會請代予整理，發表於醫學雜誌，以資賞慰我醫學者的心；並且望你在醫學界上多多努力，以繼醫術救人之我志，甚為欣慰。

未發表之研究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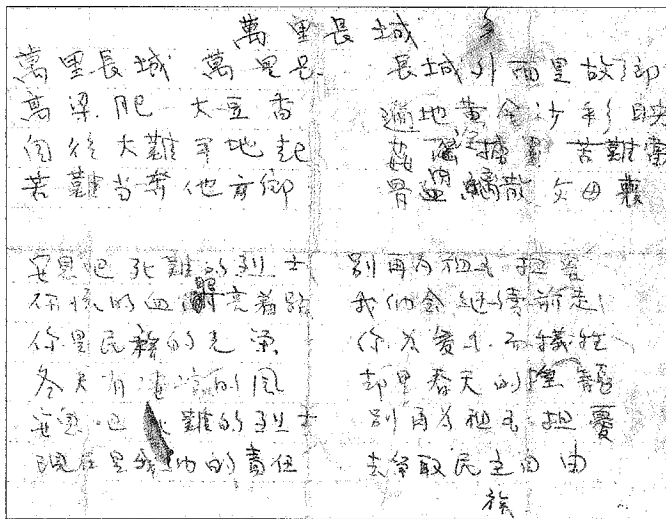
- 一、關於血中及尿中焦性葡萄酸 (Pyruvic acid) 之臨床及實驗研究
 - 二、關於維他命B₁減少症之化學診斷法之研究 (許氏尿中腳氣反應)
 - 三、關於胃、十二指腸潰瘍之臨床統計觀察
 - 四、關於斑疹熱 (地方病型斑疹傷寒中台灣之所謂二周熱) 之臨床觀察
- 以上四論文之原稿均放在第三內科研究室，請宋醫師代予整理為盼。

除了這封交代如何處理「未發表之研究論文」的信，家書裡頭還夾著一張許強在獄中手抄〈萬里長城〉和〈安息歌〉的歌詞。多年以後，許強的獨子許達夫才通過這份手稿的內容，清楚了解到：原來，他們敬愛的父親，那個「滿腔熱血、心向祖國」的父親，當時已經「準備為祖國犧牲，為爭取民主自由而成爲烈士」了。^①

當時，劉順娣女士卻怎麼也沒有想到，那封語氣冷靜的信竟然會是許強向她交代後事的遺書。接到許強的來信之後，人在病中的她無法即刻回信；當時正就讀小學四年級的長女許惠美，



許強的遺書。(劉順娣/提供)



許強獄中手跡。(許運夫/提供)

於是高興地寫了一封回信給父親許強。

我親愛的爸爸：

今天接到爸爸的信，我很高興，媽媽昨天，再去大學校（台大），回來，再（在）吐血，剛才很苦，不能寫信（。）爸爸要的東西，明天叫漢其寄去（。）內褲大（，）二條長褲，已經送去了。爸爸身體保重，一切不免煩老（勞，）這個話（，）媽媽說的。

可是媽媽的病不快要好，爸爸也不快回來，我就很可憐（憐）。

爸爸快快回來，弟弟很大了，我們三個人上學，弟弟和素美一同玩，我們的運動會快到了，今天練習運動會，須美跑一等。爸爸再見。

十一月一日 晚上十點

四年級 許惠美

槍決與收屍

然而，小學四年級的許惠美期待「快快回來」的親愛的爸爸，卻永遠也不能回來了！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五日，國防部以「勤助字第〇三九號」代電核定所謂「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判決，並擬定死刑執行日期為十二月三日。

但是，十一月廿九日，《中央日報》及各大報紙卻刊載了一則許強等十四名「潛台匪諜」昨

晨被執行槍決的新聞。

胡寶珍：那時候，如果當天有槍決，大概都是一早五點鐘就來開門，只要鐵門聲一響，我們就知道有人要被槍斃，是誰？就不得而知。當天下午，同案的倖存者就會被叫出去宣判；其實，他們只是要做做「審判」的形式罷了。

胡鑫麟：我們從保密局移往大橋邊的倉庫，再移送軍法處。從軍法處再送新店拘留所，那是一間舊戲院改成的牢房。忘了是哪一天，關太久了，已經沒有時間觀念，有一天下午，他們載我們回軍法處，叫我們排成一列，有一個軍法官模樣的人，高高站在庭上，唸著，「某某人某某人判幾年。你們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問說，許強現在怎麼樣了？因為我們沒有關在一起，不知道他的現況。法官說，「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

原來當天清晨，許強已被槍斃了。^⑤

吳澍培：一九五〇年七、八月開始，大概每隔一、兩天都會有難友被叫出去槍決。那天，天要亮的時候，他們又來點名。這次，一共點了十幾個人，點到名的都是「台北案」的難友，我那一房有一個叫劉永福的難友，也在名單之中；他被捕以前是士林官邸招待所的廚師。我聽到許強先生的名字也被點到了。

點完名後，他們才進來押房，按照房號次序，把人一個個帶出去；帶到大門以後再回來開另一間押房。通常，那些就要赴義的難友，早已經有了心理準備，點完名後，他們就跟同房難友握手道別；有些人會唱歌，有些人則喊口號……；每一房的情況不太一樣。

路統信：我是河南人，一九五〇年七月廿八日，在台大學生宿舍睡午覺時被捕，當時我是台大哲學系的學生。被捕以後，我先是被送到環河北路七十七號的調查局，接受冗長的疲勞審問；然後又被移送到大龍峒的一處民宅臨時看守所；兩個月後，又被移送到軍法處看守所。

那段時間，軍法處幾乎每天凌晨都有人被叫出去槍決；我現在還深刻地記得，大概都是在凌晨四點左右。尤其是台大醫院的許強和郭琇琮醫師那批，人數相當多，都是國家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個個都唱著〈國際歌〉、高呼口號，堅強地走出去；大夥兒都擠到押房前頭，目視他們致敬送別。那種場面，對同是台大的人，有不同於別人的感受。現在想起來，心情還是會激動。^⑥

胡寶珍：那天早上，鏗鏗的開鐵門響聲自我們牢房發出，隨後就喊：「許強，出來！」許強用手拍拍我，用台灣話向我說了一聲：再見！就走了。我不會流過眼淚，但是聽了他這句告別的話，當場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吳澍培：後來，我看到許強先生被兩名憲兵各夾一手，從我的押房前面走過，一個開門的看守拿著一串鑰匙走在後面；他們把許強先生帶到一區門口時，給許強先生上了腳鐐手銬。然後，我們就聽到許強和其他同時犧牲的難友們一路高喊的口號聲……。

早上十點左右，早餐開飯前，我們先為當天清晨犧牲的難友默哀，然後唱〈安息歌〉……。

蘇友鵬：當我得知敬愛的許強老師和幾位前輩們已經被槍殺了，有一個多星期，我天天以淚洗面……。

顏世鴻：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起，秋決開始。首先是林書揚他們的「麻豆案」宣判，結果判了三個死刑，八、九個無期徒刑，連那種不識字的六十多歲老翁也被判無期徒刑。

在「台北案」的判決書中，許強排名第三；結果，光是他們這個案件就被槍斃了十四個人。就我自己的見解，這是蔣介石下的令，而且和韓戰的情勢有關。因為韓戰爆發後，美軍準備攻進鴨綠江，但十月廿五日中共加入戰局，整個局勢就改變了。

當時載運赴死者的每一部卡車，派四個憲兵押兩個被捕者。我聽說，許強他們在綁赴刑場時，就在卡車上沿街唱起〈國際歌〉和喊口號。他們這個案件算是非常特別。怎麼說呢？據說，他們十四個人被槍斃後還被留在現場示眾，不准家屬收屍；第二天，我們「學委案」的十一個人去的時候，他們十四具屍體還留在那裡。

張漢真：許強槍決的那天，許太太沒有接到通知，所以並沒有到場。清晨，天剛亮。我聽到消息後，立刻和一個同學，趕去馬場町刑場。

我們沿著重慶南路一路走去。當我們走到距離中正橋頭約一百五十公尺的堤防上時，我們看到行刑的車隊正要進入刑場。我聽到他們在車內還一路高喊著口號！

我覺得，他們這些思想犯很不簡單，他們被槍決前，並沒有「要哭要啼」的！也不像那些被判死刑的黑道，臉色會變；他們就是大大聲地喊著。許強的家庭並不窮，可他會走到共產主義路線去，我以為，像他這樣的人的思想才確實徹底。

當時的堤防還是石頭路，不像現在用水泥蓋得那樣高；堤防再過去才有水。刑場就在堤防邊的河岸邊上，距離我們站的地方大概不到一公里。我看到他們被推下車後，一跪地，隨即就「砰」下去了。很快，才幾分鐘的時間；等我趕到那裡時，許強已經過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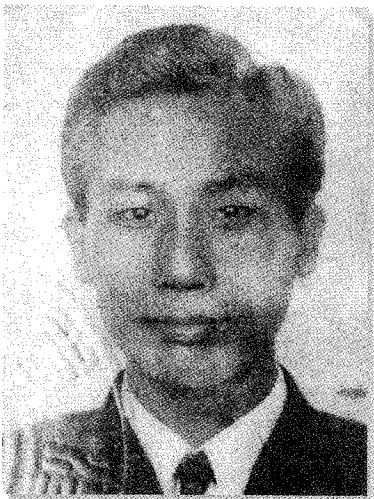
那時候，被槍決者的屍體是不能在現場領的。他們先把屍體送到殯儀館，然後要家屬到軍法處辦好收屍手續後，才給領回。我於是趕緊跑去通知許太太。

謝呈周：許醫師被執行槍殺時並沒有通知他的家人。許醫師有一位姪子常常去探聽消息，有一天，他通知許太太說，許醫師和一批人已經被送去刑場了。我和許太太就趕緊到刑場。那時，當日的槍殺已執行完畢，工人們正在運送屍體；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許醫師的屍體。有個工人就告訴我們，之前已經送出一批屍體。我們於是又趕到收屍體的所在。

在那個所在，我看到有一個個六呎深的水泥桶裡面堆放著一仙仙的屍體。我就一個個去找。在一個桶內，我翻了一仙又一仙，當我翻到第三仙時才猛然看到被壓在第二仙屍體之下的許醫師；我看到他的胸口有綻開的彈孔。當時，我悲從中來，一下子就淚流滿面。天呀！這麼優秀的醫師居然會被人無情地槍殺。

許扶美：爸爸走的時候，我才七歲，太小，沒辦法了解媽媽內心的悲情，她也不能告訴我們爸爸所遭受到的恐怖。有一天，一位長輩告訴我，你爸爸死了，我仍不信；直到在殯儀館看到爸爸躺在那裡。第二天，火化了，媽媽帶我去撿骨；大火爐一開，只見白骨灰燼，我一根一根撿，一邊跟著哭，只見媽媽臉對著牆壁痛哭。……^⑦

許須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八日，卅七歲的父親遭到「槍決」，我年僅五歲，對逝父之痛懵懂不



許強臨終前最後遺照。(劉順娣／提供)

知，但我卻清晰記得：事後，有一天，母親帶著兩個姊姊和我，走入一間好大好大的大廳，那裡停放著一個個用簾子遮掩的東西。母親帶我們走進其中之一，掀開簾子，突然看見父親躺在一木箱內。看著母親和姊姊們在痛哭，我只覺得很奇怪；我完全不知，睡在那裡的父親，與我們已是生離死別。

父親火葬的鏡頭，深深烙印在稚齡的我的心中。記得，當時只有隔壁鄰居一位太太牽著我的小手，跟著母親、姊姊們移動；我看到一個好大好大的火爐，爐門忽地打開，棺木送入，隨即熔於熊熊火燄。我想，這個可怕的鏡頭一定對我的心靈衝擊很大。至今，即使有親朋過世，我都不願再去親睹這樣的場景。

母親說，由於父親是以政治犯被槍決，即使是生前同窗同事好友都不敢來探訪遺屬，就是一血緣之兄弟親人，也都無人出現在已是非常簡單的葬禮。

哀哉！父親悲壯的犧牲，卻是如此淒涼。

惜哉許強！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三日，劉順娣把許強火化後的骨灰存放在仁愛路一段的東和寺。一直要到一九七八年八月，因為經濟條件比較好了，她才在八里山上的墓地，修了一個墳，讓許強永眠地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許強醫師犧牲四十一年後，爲了紀念許強的人格，更爲了「能見到他耿直的精神在這個紛亂的時代重生」，以李鎮源醫師爲首的一群醫界人士，終於在戒嚴體制解除後，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許強醫師紀念會。

李鎮源：我對許強先生最佩服的一點是他堅毅的精神與骨氣。雖然台大被捕的人有許強先生、胡鑫麟先生、蘇友鵬先生、胡寶珍先生等人，事實上，這件事情，還有可能株連許多台大的人。然而在許強先生被捕期間，儘管他們用各種方式要他招供其他的成員，但是他都不肯再牽連其他的人。由於許強先生的堅忍，使得這個歷史的悲劇得以不再擴大殃及更多無辜的人。

蘇友鵬：優秀的人才是非常難得的！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殖民地台灣才出現幾個像許強老師那麼優秀的人才；可是光復後五年，一場白色恐怖的政治風暴輕易就把他撲殺了。真是可惜啊！

宋瑞樓：許學長（不但）是秀才，而（且）運動健強，個性剛正，富有正義感，具有原則，具有行動力。……愛國心強，經日本教育變成更強，因爲愛國、愛台灣、愛社會，……結果被（國民）政府認爲是「叛國」，而被處死。

如果許學長有機會繼續在台大醫院服務，相信他就是我們的一位領導人物，對台大醫學院，對醫界與社會，一定會提供重大的貢獻，非常可惜。

謝呈周：我覺得做人應該有正義感、勇敢，社會才會進步；而真正的實踐者卻是少數，並且得不到社會的同情。

許強醫師身後留下許太太和五個小孩，十歲、七歲、五歲、三歲和兩歲，最小的只有兩歲。許太太非常賢慧，但是一個人養著五個幼兒實在真辛苦，因此，我在事後也時常去拜訪他們，給他們安慰和鼓勵。



1998年12月的劉順娣女士。
(藍博洲／攝)



1961年，許強犧牲十年後的許劉順娣。
(劉順娣／提供)



劉順娣女士獨立把四女一男撫養長大。(劉順娣／提供)

許扶美：沒有了爸爸，媽媽就到比較熱鬧的台北橋附近租房子開業，我們仍住在大龍峒。那時候，媽媽當婦產科醫生，也兼眼科，並當校醫；白天辛苦了一整天，半夜又經常出外，為人接生。我們雖有傭人照顧，一歲多的小弟弟卻經常半夜哭著要媽媽，十歲的大姊幾乎天天背著他，哄他入睡。媽媽也經常忙到天亮沒睡覺……

許須美：小時候，我最怕有人問我：「妳爸爸呢？」「你爸爸怎麼死的？」我的回答總是「病死的」或「意外死的」；不善說謊的我，最怕別人繼續追問。雖然我羨慕別人有「爸爸」可以叫，但在母親的愛心呵護下，我卻毫無失怙之感。只是，在整個社會視白色恐怖為禁忌下，我們從小時候一直到成家立業，一直對父親的死，噤若寒蟬，而且也遵照母親的叮嚀，不參加任何與政治有關的活動……

劉順娣：許強被槍決後，我心裡想，日後要設法在台大醫院那裡，給他立個紀念碑。但是，一方面是為了生活忙碌，一方面也因為長期受到列管，也就沒能實現這個心願。現在，我惟一能夠安慰許強的是，我不但把五個小孩拉拔長大，而且都讓他們受完大學教育；算是對得起他了！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八日初稿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八日二稿

——二〇〇三年四月七日三稿

——二〇〇三年五月廿三日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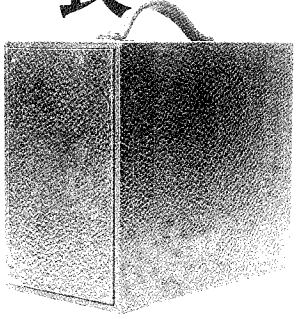
注釋：

- ① 許達夫〈我的父親許強〉，收錄於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 ② 〈劉順娣證言〉，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台北市。以下劉順娣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③ 〈張漢其證言〉，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台北市。以下張漢其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④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台北市：台灣書店，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增訂再版），頁四二、四三。
- ⑤ 南一中校友會編《省立台南第一高級中學（原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校友錄》（一九七九年），頁一五。
- ⑥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八九。
- ⑦ 吳建堂編《台高會名錄》（台北市：台高會，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頁一三。
- ⑧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八九、九〇。
- ⑨ 台灣總督府各年統計書及學事年報一覽材料；轉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一五八。
- ⑩ 李鎮源是台北高等學校第八屆理科乙類，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畢業；前引吳建堂編《台高會名錄》，頁一二。
- ⑪ 李鎮源是台南二中第七屆，一九三三年三月畢業；前引《省立台南第一高級中學（原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校友錄》，頁一三、一四。
- ⑫ 李鎮源口述、侯文詠整理〈我與許強醫師〉，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自立晚報》副刊。以下李鎮源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⑬ 〈邱林淵證言〉，一九九三年十月十日，廈門。以下邱林淵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⑭ 蕭道應致筆者信函，題為〈我所了解的許強教授〉，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 ⑮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一六二、一六〇、一五五。
- ⑯ 八木俊一《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同窗會——東寧會會員名簿》（東京：一九七三年十月卅一日），頁二〇～二三。
- ⑰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一五〇。
- ⑱ 宋瑞樓〈第三內科簡史〉，收錄於《台大醫院壹百年》，頁四四～五〇。
- ⑲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一五一。
- ⑳ 宋瑞樓：〈懷念一位傑出的學長——許強教授〉，未刊稿，許須美提供；以下宋瑞樓證言未另注出處者皆同。
- ㉑ 〈黃怡珍證言〉，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台北市。
- ㉒ 〈周青證言〉，一九九〇年四月，北京。另見周青〈「歷史造像論」的實踐——評陳芳明著《謝雷紅評傳》〉，台北《海峽評論》，一九九四年一月。周青〈「不定期會」與謝雪紅〉，台北《遠望》雜誌，一九九五年三月。
- ㉓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台灣醫療關係者徵用令〉公布。
- ㉔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大公報》；轉引薛化元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一九四五～一九六五）》（台北市：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初版），頁五。
- ㉕ 〈台大醫院重要大事記〉，前引《台大醫院壹百年》，頁一三。
- ㉖ 邱仕榮〈光復前後的台大醫院〉，原載《青杏》第十八期；轉引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國立台灣大

- 學醫學院台大景福基金會，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八日），頁五〇。
- ②⑦ 〈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一九八五年三月卅日，台大景福館，主持人楊思標）；轉引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四九、五〇。
- ②⑧ 前引宋瑞樓〈懷念一位傑出的學長——許強教授〉。
- ②⑨ 前引〈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五七。
- ③⑩ 施振坤〈建校前後瑣憶〉；前引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三五六。
- ③⑪ 翁廷詮〈光復初年的台大醫學院學生生活與台大外科面面觀〉；前引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三五九。
- ③② 〈顏世鴻證言〉，一九九一年九月卅日，台南顏宅；以下顏世鴻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③③ 〈蘇友鵬證言〉，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台北，許強醫師追思會。
- ③④ 〈謝呈周證言〉，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台北，許強醫師追思會；以下謝呈周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③⑤ 〈要求發給正式證書——台大醫學院職員罷診〉，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四日，《台灣新生報》。
- ③⑥ 〈台大醫院風潮擴大——一院罷診後二院繼之其他學院亦有響應趨勢〉，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六日，《台灣新生報》三版。
- ③⑦ 前引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六日，《台灣新生報》三版報導。
- ③⑧ 〈台灣大學附屬醫院罷診事態演變經過〉，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台灣新生報》三版。
- ③⑨ 〈蔣主席關懷台大〉，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台灣新生報》三版與《人民導報》二版。
- ④⑩ 〈台大醫院復診——醫員聯合發表復診聲明書〉，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台灣新生報》二版。
- ④① 前引〈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五〇、五一。
- ④② 熊秉真、江東亮〈魏火曜先生訪問錄〉（中研院口述歷史叢書〈廿四〉，一九九〇年六月），頁三〇。
- ④③ 魏火曜〈台大醫學院十六年〉，《傳記文學》第一卷第七期，頁三五。
- ④④ 前引〈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五一。
- ④⑤ 前引〈盤古開天——楓城軼事座談會〉，楊思標編《楓城四十年》，頁五一。
- ④⑥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於延安《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文中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的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
- ④⑦ 胡鑫麟口述、胡慧玲整理〈醫者之路〉（一）（三），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二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
- ④⑧ 〈蘇友鵬證言〉，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台北蘇宅；以下蘇友鵬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④⑨ 《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李敖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卅一日初版），頁一二。
- ⑤⑩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附錄伍，中共特務對台工作》（香港：阿爾泰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頁三三一。
- ⑤⑪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一四〇二二。
- ⑤⑫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二〇八。
- ⑤⑬ 〈林書揚證言〉，一九九五年三月廿四日，麻豆林家故居。

- ⑤4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二、三)，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一、廿二日。
- ⑤5 〈蕭道應證言〉，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台北蕭宅。
- ⑤6 許扶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我們敬愛的媽媽〉，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八二～一八三。
- ⑤7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一四、一五。
- ⑤8 〈胡寶珍證言〉，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台南新營；以下胡寶珍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⑤9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 ⑥0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 ⑥1 〈吳澍培證言〉，一九九一年九月廿七日，台北；以下吳澍培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⑥2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五)，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 ⑥3 林立，四十八歲，台北醫專畢業，自設道生醫院，一九五〇年因「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案」被捕。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七六。
- ⑥4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 ⑥5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七、八)，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六、廿七日。
- ⑥6 〈高明柏證言〉，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台北。
- ⑥7 〈林賜安證言〉，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台北；以下林賜安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⑥8 〈江漢津證言〉，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后里泰安；以下江漢津證言皆同，不另作注。
- ⑥9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五、八)，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四、廿七日。
- ⑦0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二二。
- ⑦1 蔣經國《勝利之路——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正中書局，一九八八年二月初版三印)，頁一一九。
- ⑦2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八)，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 ⑦3 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九六。
- ⑦4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二二。
- ⑦5 前引胡鑫麟〈醫者之路〉(八)，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 ⑦6 〈路統信證言〉，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九日，台大。
- ⑦7 許扶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我們敬愛的媽媽〉，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八三。
- ⑦8 許須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我們敬愛的母親〉，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八七、一八八。
- ⑦9 黃芳彥〈為什麼我們要舉辦許強醫師紀念會〉，《自立晚報》本土副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
- ⑧0 許扶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我們敬愛的媽媽〉，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八四。
- ⑧1 許須美〈追思父親並獻給我們敬愛的母親〉，前引許達夫編《許強醫師紀念專輯》，頁一九一。

大事年表



一九三〇—一九五〇

一九一三年 十二月十三日，許強生於台南州北門區佳里興農家。

一九一八年 十一月廿八日，郭琇琮生於台北士林士紳家庭。

一九一九年 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教育令〉，確定公學校修業年限六年；並得設二年制的高等科，加強職業教育。

一九二二年 台灣總督府公布〈新台灣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台共學」制。

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創立。

四月，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創設，為大學預備教育機關，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

一九二四年 十月廿五日，胡寶珍生於台南市公務員家庭。

一九二五年 許強公學校畢業。

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繼設高等科，分文、理兩類，修業年限三年。畢業後可以直升

台北帝國大學或日本國內各大學。

一九二六年 台北高等學校學生正式於古亭町校舍（今和平東路師大）上課。

蘇友鵬生於台南沒落的前清舉人之家。

一九二八年 許強公學校高等科畢業。

台北帝國大學創立，起初只設文政與理農兩學部。

一九二九年 許強考入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第八屆。

一九三〇年 元旦，彰化銀行板橋支店設立，郭琇琮父親郭坤木擔任板橋支店長。

一九三三年 許強跨級進入台北高等學校第九屆理科乙類。

一九三六年 一月一日，台北帝國大學增設醫學部。

三月，許強台北高等學校畢業，進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

四月一日，台灣總督府禁用漢文，強迫台灣人民學習日語日文。

七月七日，日本帝國在大陸發動中日戰爭。

八月十五日，台灣進入戰時體制。

許強與客籍同學蕭道應、邱仕榮和其他幾人，在宮前町（今圓山附近），跟隨從福州歸台的女學生黃素貞學「北京話」。

蘇友鵬代表善化公學校，參加台南州公學校六年級兒童即席演講比賽，獲得第一名。

一九三八年 三月十七日，蘇友鵬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畢業善化公學校，並獲得台南州知事頒發的「宮殿下賞」。

四月，蘇友鵬、胡寶珍同時考進台南二中第十七屆。

郭琇琮考入台北高等學校第十四屆理科甲類。

許強與南二中同學邱萬順就讀東京女子醫專的姊姊劉順娣結婚。

一九三九年 二月，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三內科助教澤田藤一郎獲聘為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三內科講座主任，延攬九州帝大第三內科講師佐藤八郎為助教授，並於同年五月開辦台北帝大醫學部內科學第三講座。

一九四〇年

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日本「皇紀紀元二六〇〇年」紀念日，日本殖民當局通過戶口規則的修訂，制定台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規則。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通過這樣的「改姓名運動」，進入最緊張的階段。

一九四一年

三月，許強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被授予醫學士學位；並擔任第三內科講座助手，跟隨澤田藤一郎教授做研究。

三月十日，郭琇琮台北高校畢業後，懷抱「科學救國」決心，考上東京工業大學；因為父親反對，經濟困難，只念了一個月就回台，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第六屆）就讀。

四月，台北帝大預科成立，修業年限原定三年（因為戰爭影響，後來改為二年）。它和台北高等學校是日據時代台灣兩所專為升大學而設的預備學校。

六月，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各地成立皇民奉公會分會，全面推動皇民化運動。

暑假，郭琇琮學了北京話和中文之後，渡海到對岸的祖國旅行考察。

士林青年何斌團結台北帝大醫學部同班同學蔡滋涇和張鈺，組織一個推動「地方文化啓蒙活動」的青年團體——士林協志會。

八月廿三日至廿五日，士林協志會借用士林公學校校舍，舉辦士林文化展。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一九四二年

二月一日，〈台灣醫療關係者徵用令〉公布。

胡寶珍越級考上台北帝大預理科醫組。

一九四三年

三月，蘇友鵬台南二中畢業，並考取台北帝大預理科醫組。

日軍在東南亞戰場節節敗退，台灣因而被編入日本的絕對國防圈內，進入「決戰期」，同時也開始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兵源供應地。

一九四四年

一月，台灣總督府公布鼓勵台灣人民改用日本人姓名的辦法，皇民化運動達到極致。

四月，胡寶珍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

四月十五日起，憲兵隊以「研讀漢文、習國語、抗日」的名義，在北部一帶校園，針對台北帝大醫學部學生蔡忠恕、郭琇琮，台北二中及台北高商等校爲主的台北地區反日青年學生，展開連續三天的檢舉行動。

六月十八日，因盟軍飛機經常轟炸台灣各地，人心惶惶，總督府當局發表〈稠密都市住民疏散綱要〉，指定台北、基隆、台南和高雄四市爲必須疏散地區。

八月廿二日，當局宣布：「台灣進入戰場狀態」。

十月十二日，盟軍飛機千餘架轟炸台灣各地。

十月廿二日，「疏散指導部」設立。

同年年底，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會議決議進行學校和醫院疏散計畫，選定台北溪洲和桃園大溪爲疏散地。

一九四五年

三月，台北帝大附屬醫院門診及病房，借大溪公學校的一部分校舍正式運作，施行診療與醫學學生的臨床醫學教育。

三月，蘇友鵬台北帝大預科畢業；四月，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隨後便被徵調到駐守觀音山的荒川砲兵隊，當學徒兵。

五月卅一日，盟軍飛機空襲台北。

八月，日本投降前，九州帝大授與許強醫學博士學位。

中共中央派蔡孝乾（彰化花壇人）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九月三日，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將軍（台北蘆洲人）特派副總隊長張克敏，攜帶「中華民國國旗」一面，飛抵台灣；並親往台北監獄，把學生領袖郭琇琮等人接出牢房。

九月四日，台灣光復後的第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在當今的台北賓館，冉冉升起。

九月，郭琇琮通過補考，成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七屆畢業生。畢業後，先到台大醫院第一外科服務，然後到衛生局防疫課任職。

九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

十月初，戰後台灣第一個自發性的學生組織——「台灣學生聯盟」，以郭琇琮及同時繫獄的幾個學生為中心，在台北市公會堂正式成立。

十月十日，郭琇琮與士林協志會成員公開慶祝台灣光復後的第一次國慶。

十月十三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擬訂具體計畫接管台灣教育；台北帝大改為國立台北大學。

十月十七日，國軍第七十軍及部分長官公署官員分乘四十餘艘美軍艦艇，抵達基隆。

隆。

十月廿五日，中國戰區台灣區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

十一月，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聘杜聰明為台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負責接收原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附屬醫院事宜。

醫學部在職的台灣人醫師組織「台醫同學會」，並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許強、許燦煌、李鎮源、賴肇東和翁廷俊等五位委員，參加杜聰明先生為首的六人接收小組，協助杜聰明先生。

許強負責接收營養部，特地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管理。

十一月十五日，行政院令設國立台灣大學於台北帝國大學原址，由羅宗洛擔任代理校長。原台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代表校方，將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學專門部及附屬醫院，移交國民政府代表教育部特派員羅宗洛。台北帝大醫學部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台北赤十字醫院則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十二月一日，杜聰明任醫學院院長兼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台大當局發給七十名有新職員證書。

十二月十二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通令：本省各地公會堂改為中山堂。

十二月，蔡孝乾抵江蘇淮安，向「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洽調來台幹部。

十二月底，衛生局完成全省衛生機構的接收工作，負責推動全省的衛生行政工作。

一九四六年

二月八日，台大代理校長羅宗洛赴渝（重慶）述職，由教務長陳建功代行校務。
二月廿五日，郭琇琮與十幾名本省青年，在台北市中山堂召開一場文化問題懇談會，決議發行啓蒙本省青年男女的青年文化雜誌——《夏風》。

二月，蔡孝乾率幹部張志忠（嘉義新港人）等，分批到上海，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

三月廿二日，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全體醫員，因為要求發給無薪助理醫師正式證書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圓滿解決，於是發動罷診抗議。
許強醫師一方面在幕後領導醫師罷診，一方面製造社會輿論。

三月廿五日，醫學院學生決定以「罷課」來支持附屬醫院的罷診。其他各學院的學生也「聞風繼起，呼應醫學院之學潮，決為打破學園之官僚化，爭求大學之民主化而共同邁進」。

三月廿七日，第二附屬醫院醫員加入罷診行列。台大代理校長陳建功因事態更加擴大，於是電請人在重慶的羅宗洛校長指示。這場台灣史無前例的醫師罷診事件，終於引起國民政府中央的注意。

四月九日，台大校長羅宗洛由上海飛返台北，並在機場向中央社記者表示：「蔣（介石）主席對台大甚為關懷，……教育部已將台大預算，全部通過，刻呈行政院審核可望照准。……關於醫學院附屬醫院怠診風潮，當徵詢各方意見，可望於一二日內解決。」

四月十日，羅宗洛校長會見醫師代表，了解罷診原因，並答應改進「大學民主化」問題，同時先發給「無薪助理醫師」聘書。

四月十一日，附屬醫院的全體醫員向市民擬寫一份〈復診聲明書〉，結束長達半月的罷診行動。

四月十五日，《台灣新生報》以〈民族純血的脈動〉為題，揭露「蔡忠恕事件」真相。

四月廿六日，霍亂菌入侵台南市灣裡。

四月，中共黨員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由上海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

五月三日統計，台南地區已有十八人因霍亂死亡。

六月五日，台南地區的霍亂患者已達一百一十二人。

七月七日，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在醫學院大講堂，舉行蔡忠恕紀念追悼會；郭琇琮主持。

七月一日，台南市灣裡村又再出現霍亂；並以台南為根據地，向南部一帶蔓延。

七月十二日統計，南部地區因霍亂流行已有三百多人死亡。

七月，「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潛台，正式成立組織。

八月廿五日（中元節），台南縣警察局以避免傳染霍亂之由，禁止新營民眾開演廟戲，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事件。

八月，許強升任台大醫學院第三內科副教授；代理第三內科主任。

許強到上海，找到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和地下黨的組織發生聯繫。

十一月一、三日，郭琇琮在《台灣新生報》發表〈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相〉。

十月十五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長嚴家淦令派林獻堂為彰化商業銀行籌備處主任，並飭自同月十六日起，接收原有彰化銀行，照常營業。

十月十九日，彰化商業銀行奉行政長官公署西條署財字第三四八一三號訓令，派郭坤木等人為籌備處委員，輔助該處主任辦理籌備事宜。

一九四七年
二月廿七日晚上，台北延平路上緝菸所引發的官民衝突，隨即在全省各大城市發展為全面性的「二二八事件」。

二月廿八日，下午二時半，彰化商業銀行創立股東大會於台中市總行會議廳召開，郭坤木與林獻堂同被選為六名商股董事之一；接著，郭坤木又被第一屆董事會指定為三名常務董事之一。

三月一日，上午九時，彰化商業銀行在總行會議廳舉開成立典禮。台中市民也在銀行附近的台中戲院舉開「二二八事件」市民大會。

三月一日，上午十時，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台籍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在中山堂召開大會，組成「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

三月二日，上午十時，台大、延平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各中等學校的高年級生，大約數千人，在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

三月五日，郭琇琮擔任台北學生武裝計畫的副總指揮，並領導第二大隊。

三月九日凌晨，憲兵第廿一團一營從基隆開抵台北。早上六點，陳儀宣布台北戒嚴，隨後通令全省，「搜捕奸暴」；並特設「別動隊」，以林頂立為隊長，執行任務。

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鄭培禮去世，許強升任主任。

五月六日，郭琇琮的父親郭坤木病逝。按照民間習俗，郭琇琮在百日內與林雪嬌結婚。

六月，郭琇琮經由當時的中共「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廖瑞發吸收，參加地下黨組織。

七月，郭琇琮親自吸收京都帝大醫學部出身的吳思漢，加入組織。

秋，「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十月，郭琇琮充任委員；直接領導包括李登輝在內的外圍青年團體「新民主同志會」。

十二月十四日，台北市電影戲劇促進會在第一酒家舉行成立大會，林秋興被選為理事。

一九四八年

二月，郭琇琮親自吸收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加入地下黨。

春，「台大醫學院支部」成立；許強兼「台大醫院支部負責人」。

五月，郭琇琮應上級之召，前往香港，與蔡孝乾及張志忠等島內重要幹部共十一人，參加六月召開的「台灣幹部會議」。

六月底，郭琇琮返台，代理「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不久即正式擔任書記，直

接領導「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

七月，郭琇琮親自吸收其妻林雪嬌加入組織。（《安全局機密文件》）

七月，胡寶珍台大醫學院第二屆畢業，任職台大醫院皮膚科醫師兼助教。

十月中旬，「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將吳克泰、孫萬枝及徐淵琛三位《自由報》同仁組成直屬的「新聞記者小組」，並由徐淵琛擔任小組長。

三月，鄉土藝術團在台北市長游彌堅鼓勵之下成立，設有音樂、戲劇、舞蹈、美術、文藝和總務等六部，由台北市第二屆臨時市參議員徐淵琛擔任團長。

三月卅一日，台灣省教育廳發給鄉土藝術團第一六六號劇團登記證。

七月，鄉土藝術團領有省教育廳發給歌劇《白蛇傳》上演登記證第八六號；並於七月廿二、廿三日兩晚七時半，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首次公演。

七月，蘇友鵬台大醫學院第三屆畢業，任職台大醫院耳鼻喉科醫師兼助教。

八月，許強升任台大醫學院第三內科教授。

八月，郭琇琮親自吸收胡寶珍醫師加入組織。（《安全局機密文件》）

九月，基隆中學師生陸續被捕，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拉開序幕。郭琇琮從士林搬到台北市長安東路的林雪嬌娘家。

十月，郭琇琮將台灣省地圖及「台北市工委會」工作報告書，交林秋興帶往香港；林秋興啓程前被查覺，於基隆被捕。保密局隨即循供，嚴密偵查郭琇琮等。

十月中旬，某晚，郭琇琮第一次被圍捕；僥倖脫出後，與林雪嬌轉入地下。

一九五〇年

冬季，郭琇琮領導的「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已在台北市郊建立十一個支部、一個小組，並發展了個別黨員五十餘人。

十二月七日，在內戰中全面潰敗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大陸，由廣州播遷台北。

年底，吳思漢匿居阿里山吳鳳鄉樂野村「蕃社」，並將「潛伏黨員」，組為「逃亡幹部支部」，繼續進行活動。

一月廿九日，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住處第一次被捕後脫逃。

一月，保密局特務逮捕吳思漢直接領導的「和尚洲支部黨員」——台北市城中區公所戶籍員張秀伯，然後「據供，窮追線索，擴大偵查」。（《安全局機密文件》）

二月廿七日，蔡孝乾在嘉義糞箕湖再次被捕。

三月一日，蔣介石復職；十二日，陳誠內閣就任；台北國府的時代正式展開。

三月廿二日，國防部設立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集中加強大陸時期不同系統的特務機構，準備以恐怖手段推行軍法統治。

四月，郭琇琮從蘭陽地區轉至嘉義，以雜貨商為掩護，潛伏活動。

五月二日，郭琇琮與林雪嬌在嘉義被捕。

五月十三日，許強與台大醫院眼科主任胡鑫麟、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和皮膚科醫師

胡寶珍，在院長辦公室被捕。

五月卅一日晚上，「台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對本省同胞發表「懺悔」廣播，並號召其他在逃「黨員」，立刻出來「自首」。

六月十三日，蔣介石頒布實施〈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以高額の獎金鼓勵民眾告密檢舉「匪諜」，情治單位逮捕的對象與範圍不斷擴大。

九月七日，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裁定許強與郭琇琮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

九月廿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所謂「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39)安潔字第二二〇四號」判決書，呈報國防部。

十一月廿五日，國防部以「勁助字第〇三九號」代電核定所謂「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叛亂案」判決，死刑執行日期為十二月三日。

十一月廿九日，《中央日報》及各大報刊載郭琇琮、許強等十四名所謂「潛台匪諜」昨晨被執行槍決的新聞。

後記

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非典」(SARS)肆虐。就在一般民眾對台灣醫界的表現普遍感到失望的這段期間，我一直在僻居的鄉村「自我隔離」，整理幾個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國家暴力剝奪了生命存在或自由的受難醫師的生命史。

歷史往往是充滿諷刺的。一方面是爲了勞苦大眾的幸福、追求社會正義而犧牲的日據以來台灣第一代醫師的良心，另一方面則是在資本主義醫療體制下爲了私利而喪失醫師良心的現實的醫界。

今昔對照，感慨良深！

一個醫界政治受難人曾經向我表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給台灣社會造成的最大損失，並不在於多少知識菁英遭到殺害，而在於它消滅了整個世代的社會良心……。

恰恰通過這樣的歷史對照，我終於深刻體會到老醫師這種感慨的意義了。

醫界的現實如此讓人失望，政界的現實更是好不到哪裡。

爲了重現台灣曾經有過的理想主義的社會良心，從一九八七年春天開始，十幾年來，我一直在孤獨中長期持續地挖掘那段被湮滅的台灣民眾史的工作。然而，現實的政治亂象卻讓我對台灣的未來感到更加悲觀！這樣的悲觀也使得步入中年的我，再也沒有年輕時候初探這段「聽不到，也不能講」的民眾史時那種激昂澎湃的熱情了！

在說不出什麼「多餘的話」的心境下，請允許我就以當年寫第一篇報導時的「後記」，權充這本書的前言吧！畢竟，後來的歷史發展和眼前的政治現實充分說明：當年，年僅廿七歲的我，對「某種力量」扭曲歷史的批判，還是對的。

在歷史上，法西斯主義不就是利用「把謊言轉化爲真理」的方法來製造歷史，進而取得人們對某種「濟世救人」的謊言的信仰，並強制鎮壓任何異端思想嗎？

無論是郭琇琮醫師（一九一八～一九五〇年）或是許強醫師（一九一三～一九五〇年），他們的一生，恰恰是人類社會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進而走到以美蘇爲首，資本主義體制與社會主義體制對立的冷戰結構的歷史階段。這樣的世界史背景反映到中國，它的表現就是國共兩黨的內戰漩渦，同時也在一九五〇年的朝鮮戰爭之後，通過出賣民族主體性而被併入美國反共戰略體系之一環。也就在這樣的國際冷戰與國內戰的雙戰構造下，無數個像郭琇琮和許強那樣優秀的醫師的生命，在馬場町刑場走到了盡頭。

日據以來所養成的一整個世代的台灣醫界的良心，也隨著這樣的政治肅清而消失了。

這本書，書名原本題爲《台灣醫界的良心》。可在交稿彼時（二〇〇三年六月）的社會氛圍

下，再沒有比這樣的書名更加讓人感到反諷了。

幾經考慮之後，決定易名為《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

謹以此書，向郭琇琮和許強醫師為代表的「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致最高的敬禮。更希望它能對年輕一代的醫學生，起到一定的歷史召喚的作用。同時，更獻給這一代的所有讀者。

——二〇〇三年六月初稿於五湖山村

——二〇〇五年四月定稿於五湖山村

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

作者 藍博洲
總編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陳思妤
美術編輯 許秋山
校對 吳美滿 陳思妤 藍博洲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 ink.book@msa.hinet.net

法律顧問
漢全國際法律事務所
林春金律師

總經銷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3-3589000
訂購傳真：03-3581688
<http://www.sudu.cc>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地址 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4號1樓
門市電話 02-23631407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5年5月初版

ISBN 986-7420-39-X

定價 280元

Copyright © 2005 by Po-chou Lan
Published by **IN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藍博洲 著。
-- 初版。-- 臺北縣中和市：INK印刻，
2005（民94）面；公分（文學叢書；88）
ISBN 986-7420-39-X（平裝）
857.85 9400573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